

# 韩丁与中国

李昌钊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WILLIAM HINTON AND C

(京):新登字 096 号

书 名	韩丁与中国
作 者	李昌钊
出 版	中国 国际 广 播 出 版 社
发 行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视部内)
	邮 政 编 码:100866
印 刷	长 治 市 彩 印 厂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开 本	787×1092 850×1168 1/32
字 数	160 千 字
印 张	6.5
版 次	1995 年 5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印 次	1995 年 5 月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78—1072—011·54
定 价	9.80 元

55  
18

## 目 录

(序言) 历史不会忘记 .....	王金红(1)
波士顿畅想曲 .....	(1)
重庆岁月 .....	(10)
拓荒者 .....	(25)
难眠之夜 .....	(38)
伟大的实践 .....	(46)
革命的洗礼 .....	(70)
为新中国奠基 .....	(86)
十年磨一书 .....	(95)
圆梦 .....	(104)
张庄——第二故乡 .....	(115)
风雨情真 .....	(123)
耕云播雨 .....	(141)
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思考 .....	(154)
魂系彩虹 .....	(178)
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 .....	(196)
踏着韩丁的路 .....	(231)
(后记)人生的支点 .....	(249)

# 波士顿畅想曲

少年负壮气，奋烈会有时。  
唐《李白集·少年行二首》

美国东海岸，马萨诸塞州一个古老的港口城市——波士顿。

波士顿的现代文明始于 1845 年的爱尔兰土豆大歉收，五年内，估计有一百万爱尔兰人活活饿死，另外一百六十万人背井离乡，许多人来到新英格兰，尤其是马萨诸塞州安家落户。到 1860 年，波士顿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外国移民，从 19 世纪起，大量的意大利人、波兰人、葡萄牙人也开始追随爱尔兰人而来。

18 世纪末，海上航行实行风险联合承担，促使波士顿大规模保险业兴起，其纺织工业也由于取得了英国纺织技术而迅速发展，美国第一个重要的思想运动——先验论在这里兴起，这里也是在美国国旗下首先废除奴隶制的地方。

到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世人的心目中，波士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种是作为历史古迹，一座几乎是欧洲式的招人喜爱的城市，经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更新而成为美国最适宜居住的令人兴奋的地方，它是许多年轻专业人员的圣地，他们在这里寻找激动人心的事业和讲究的生活方式。另一种形象也是真实的，那就是始终存在着族裔和种族之间的分歧，濒临破产的财权问题，公立学校和服务工作衰败以及政治上的僵局。

韩丁的人生之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据说，他的祖上是乘“五月花号”到达这里的。他刚满四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Miscarmelifa Hinton)带领他

和妹妹从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镇来到波士顿。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危机带来的大恐慌，像大多数美国家庭一样，韩丁一家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的跋涉，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罩上了一层阴影。当回忆起这段生活时，他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我对未来的忧虑，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艰难的日子就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灵魂，阴影紧紧地跟随着我，无论如何也洗刷不掉。”

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母亲表现出她无畏的奋斗精神和乐观主义情怀，她无愧为移民之母——移民家庭的支柱。

起初，母亲在一家小学任教，收入十分低微，以至于为填饱她的几个子女的肚子，她不得不跑遍集市去寻找价格最低的排骨，购买回来精心煮汤。

韩丁回忆起母亲，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和怀念，目光里闪动着一束深切的光。他说：“母亲是个永远不会为困难所征服的人，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也保持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每当假日，我和妹妹还在梦中，就听到了母亲的喊声：快起，快起，我们今天去纽约旅行。于是，我们一个个高兴地跳起来，帮助母亲做准备工作，给马备鞍，装好帐篷，灶具，带上现有的食品和水。随后，一家四口迎着初升的太阳上路了。

“从波士顿到纽约要走一个多星期，一路上，母亲有讲不完的故事，每到傍晚，我们寻到一处人家，向主人问候之后，在主人的房屋附近支起帐篷，支起随身携带的灶具，大家一起动手做饭，然后是围着篝火进餐，在月光下

游戏，每到这时，母亲会快活地像我们一样，跟我们追逐、跳跃、欢笑，一直到深夜。”

1936年，母亲决定要自己办一所中学，一所男女学生同读的寄宿中学。在当时，这样的学校在美国还很少。母亲的设想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一个学校的主人以极低的租金把校舍交给母亲使用，政府方面表示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免税。

母亲是个十分要强的人，她说：“要办就办成一流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经济萧条带来的艰难岁月使大批知识分子无所事事，母亲很容易地从他们中间聘请了一批优秀人才，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然而，经济萧条也使人们对教育冷漠，孩子们的读书热情不高，生源不足，为了招收良好的学生，母亲四处奔波，在几个州的范围内选择学生。

中学(Pufney School)终于开课了。

母亲是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追随者，崇尚他的理论“Learn by doing”即注重实践在教育中的地位。

她说：“我们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让他们具有生存能力，不单是传授知识。”她在教学日程中安排有一定的劳动课程，学校的菜地、果园等劳动都由学生参加，教室里的桌椅修理，门窗油漆等均由学生完成。

母亲的这一教学思想在美国引起反响，报名入学的学生越来越多。

母亲分外喜欢大自然，每当早晨，她拉开窗帘，发现

阳光灿烂，万里晴空，会突然走进学生宿舍，伸开双臂高声说：“孩子们，今天不上课，我们去领略大自然！”

于是，在母亲的带领下，学生们走进田野，爬上山坡，穿越森林，跨过河流，度过一个愉快的日子。

艰难的岁月使年幼的韩丁感悟到生活的严峻，同时也从母亲身上接受了爱好幻想，勤于思考的品德。

也许是先辈们那种探险拓荒精神的遗传，韩丁自幼神往外面的世界，他常常坐在海滩上遥望远方，落日的余辉洒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金波碧澜瑰丽多姿，一艘艘从远方而来的船只给宁静的港湾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喧嚣，也带来了许多令人神往的故事。

他从水手那里知道了中国，遥远的东方，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关于龙的传说，关于“羿射九日”，关于“女娲补天”，一个个奇妙的故事使他入迷。水手们从中国带来的一件件工艺品让他眼花缭乱，而波士顿科学博物馆里那些关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发明史的介绍，越发激起了他对这个文明古国的憧憬。

韩丁说：“中国仿佛是一束光环潜入了我童年的梦幻。”

1937年，18岁的韩丁读完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系，在一种急于了解外面世界的心理的驱使下，他决定奔赴远东考察。

远洋客轮在大西洋海面漂荡。晨曦里，韩丁伫立船头眺望远方，海天茫茫，波涛滚滚，在天与海的相连处一束玫瑰色的朝霞把整个天际映得色彩艳丽，鲜美多姿，给人



以无限的遐思。

对于韩丁来说，未来就像一部尚未掀开的长卷，神奇而茫然，但是他始终那样昂扬，因为他深信只有在搏风击浪中才有欢乐的人生。

半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客轮停靠日本港口，韩丁踏上了日本国土。

日本正处在军国主义的狂噪中。韩丁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广泛的接触中深深感到日本已完全被一种野心扭曲了，真理和正义无法报道，他不得不放弃在日本求职的计划，决定取道中国东北回国。

当时，韩丁仅有 10 美元，那是一家报馆付给他的稿酬。购买了一张从日本到中国大连的船票，已所剩无几了。

船靠大连港，这是韩丁第一次走上中国的土地。

蒸汽机车在东北平原上吃力地爬行。透过车窗见一望无际的荒野，枯树干枝在呼啸的寒风中摇晃，偶而有一群群寒鸦在树梢上盘旋，扇动黑色的翅膀，在铅灰色的天幕下制造出一片嘈杂。

战壕、弹坑把荒野勾画得支离破碎；时而有战车列成长队疾驰而来，滚过大地，卷起浓烈的烟尘；不时见成群结队的饥民扶老携幼像潮水般涌动。

列车一进沈阳站，还没站稳，两旁就涌上来成群的饥民，一双双污垢干瘦的手向车窗伸来，一双双渴求、绝望的目光深深印入韩丁的记忆中。

年轻的韩丁心里难以平静；在日本几个月的感受和

眼下这令人悲怜的情景使他清楚地预感到，中国正面临着—场劫难，而中国对这即将降临的不幸将持何态度呢？一种疑虑涌上心头。

这就是中国，是他所憧憬的地方吗？

韩丁要经欧洲回美国，身上的钱已不够购买到莫斯科的车票了。他无奈地在车站徘徊，就在这时，一位美国老太太走了过来，亲切地问：“小伙子，怎么了，有什么困难？”

“买车票的钱不够了。”韩丁如实地向老人家讲述了自己的来历。

“我帮你—下。”老人取出 5 美元交给韩丁。

韩丁感激地拉住老人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随后买了一张赴莫斯科的车票。

列车经西伯利亚向北飞驶。韩丁为了节省仅有的几元钱，在四天五夜的旅行中只吃了一顿饭。

莫斯科车站，韩丁饥肠辘辘下车，急匆匆闯进—家小餐馆，狠狠心买了一个盒饭，只几分钟就狼吞虎咽地吃光了。这个情景引起坐在餐桌对面—位老人的注意：“这点饭—定不够吃，我这里有篮子水果，拿去吧。”

也许是饥饿的原因，韩丁没有推辞，说了声谢谢，接过了水果。

韩丁在身上仅有一美元的情况下，从莫斯科经波兰到达德国。那里经常有开往美国的轮船。来到码头，他举目四望，终于寻觅到—面美国国旗。他飞跑着来到这艘船上，向船长说：“我是美国人，要回家乡，钱不够，我可以做

水手。”

说来也巧，船上正缺人手，韩丁被允许上船做工。一个月的海上航行，轮船到达美国，停靠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波士顿港。

韩丁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一次远行，也就是这样第一次结识了中国。

又一次点燃他的中国梦是1942年。那个冬天仿佛格外漫长。日本军国主义偷袭珍珠港，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说，号召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整个美国人民在同仇敌汽的社会心理作用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那是个飘雪的傍晚，凛冽的寒风掠过灰色的波士顿上空，掠过窄长的大街，发出阵阵呼啸，电线上的麻雀，门口的猫，负重的汽车仿佛都在叹息严冬的凄凉。

韩丁顶着一头雪花，踏着夜色赶回家，饭也没吃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本书，那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近期以来在全美甚为流行，几乎所有的书店都销售一空。

韩丁一下子被书中的报告吸引了。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

对于韩丁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自从第一次远行归来，“中国”时常在他的脑际闪现，关于中国的传闻也越来越多，但是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号越来越大。

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

韩丁从这里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二

万五千里长征,那些由中国共产党率领的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战士们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对饥饿、疾病、严寒以及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以超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迈开两条腿,横跨大半个中国,把红军那闪亮的五星带进了中国的西北角。

从斯诺的报告里,韩丁了解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那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民大众真正当家作主人。

从这里,韩丁了解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批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

一切都是全新的感觉,报告从头到尾洋溢着勃勃生机。

韩丁的心被震颤了。这是何等非凡的壮举啊!是何等宏伟的业绩!又是何等杰出的人才!与此同时,许多新的疑云又在他的心中涌起:进行着这项伟业的究竟是些怎样的人物?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们奋斗、牺牲、创造奇迹

.....

当韩丁读完最后一页时,晨曦已经映红了窗口,他依然没有一丝倦意,他轻轻合上书,伫立在窗前,一个强烈的意念撞击着他的心头:到中国去!

# 重庆岁月

……黑暗中带着巨痛的  
人民在前进。  
在夜色里，头顶着满天星斗  
的  
人民在行进：  
“上哪去？下一个是什么？”  
——卡尔·桑德堡  
《人民·是的》

1945年初春，韩丁第二次来到中国。

这是中国抗战和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的一年。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9月9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递交投降书，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

韩丁这次是作为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一员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分析研究新的宣传动向，向美国政府提供宣传分析资料。起初的几个月，韩丁和一名英国人，一名中国人组成一个小组进行时政宣传，先是在昆明，后到武汉，给中国军民放电影，还自己动手做幻灯片。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身背放映机，爬山涉水，顶风冒雪奔波在长江南北的广大城乡。

韩丁回忆起这段生活说：“我实际上加入了迎接反法西斯战争夺取最后胜利的行列，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民众那种以民族重大牺牲取得胜利后的欢欣鼓舞，对新生活的向往，中国正处在新世纪的前沿……”

不久，韩丁接到命令来到重庆。

云遮雾罩的山城，曾是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改变这里的反动统治。

韩丁每天上班都要从一些因饥饿或疾病而死亡的尸

体旁走过，目不忍睹，沿街乞讨的老人、儿童成群结队，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垃圾桶旁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觅食者。而那些老式小轿车，美式吉普车满载着大腹便便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和烂醉如泥的美国兵，不时地风驰电掣般穿过人群。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威胁着贫苦百姓的生计，米店前排成长龙似的求购者闪烁着一双双凄楚的目光……

韩丁说：“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抗战胜利为什么对中国百姓的命运没有改变？后来的日子里，我才渐渐清楚了，造成这种通货膨胀和灾难的祸首是那些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官僚资本家和美国官员。

初春的一天，我从重庆往武汉，搭乘一架由昆明经重庆、汉口，飞往上海的美国空军运输机。登机以后，我看到飞机上只有三名军官，空无一物。一打听，原来这架飞机是一名驻上海的空军上校准备飞往昆明购买鸡蛋的，结果到昆明发现鸡蛋的价格比上海还高，只好空机飞返上海。”

4月的一天，韩丁采访到东北沈阳，住在一家酒店里，他发现住在这里的大多是上海来的投机商人，多是国民党四大家族的买手，他们专做黄豆生意，这里是黄豆产区，他们以二角或三角一磅的价格把市场上的黄豆抢购一空，用军车或轮船运往港口，以七角或八角一磅的价格售往欧洲。由于运力不足，大批黄豆积压在货场上，韩丁所到的车站，铁路沿线，时时看到堆积如山的黄豆因受雨

淋霉烂。然而，就在这同时，一批又一批饥民饿死在路旁。

重庆的夜，星光与灯光相连，几乎分不出哪是天，哪是地，使人迷惘，令人困惑，韩丁与朋友杰·坦纳鲍姆常常漫步在嘉陵江边，他的思绪就像那江水一样不息地奔流。

“中国的问题在哪里？”

这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根本上讲是贫穷，贫穷是万恶之源。”坦纳鲍姆仰着他那宽大的脑袋，挥着强有力的拳头，“我们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援助，立足点也正在这里。”

“可是，我担心，有谁能填满如此穷困的深渊！”韩丁叹息着摇摇头。

“当然，主要还得把希望寄托于中国政府。”

“可是，我看这恐怕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

那么，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呢？

……

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里，韩丁和坦纳鲍姆带着这样的思考第一次去红岩村。

据说，这里原来名叫红岩嘴，是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八路军办事处，也有人干脆叫它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社都设在这里，周恩来任总书记。

天空飘着细雨，仿佛在昏黄的灯光下，挂着一张丝线织成的网，潮湿的石板路闪烁着青冷的光。韩丁和坦纳鲍姆小心谨慎地走在那条曲折蜿蜒的小巷里。他们知道，这



一带完全处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从报社到华龙桥街口，有好几家茶馆，时时有特务扮成“茶客”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来往人员经常受到跟踪，盯梢，甚至迫害。

韩丁他们走进办事处，出来迎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秀美，机敏而活泼，她是周恩来的秘书龚澎。她满面笑容地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Welcome Dear friends!”

在她的引导下，韩丁和坦纳鲍姆并肩向院子里走去，他们见许多工作人员都在紧张而和谐地忙碌着，刚才走在小巷里的那种紧张情绪渐渐消失了。

就在这个晚上，韩丁第一次结识了周恩来。

韩丁称这是一次永生难忘的会见。

“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子向我们走来，他的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微笑，那双手仿佛流淌着奔腾的情感，一下子把我们融化为一体……”

韩丁向周恩来作了自我介绍，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前景的疑虑。

周恩来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起，双目闪烁着动人的光彩，他充满自信地说：“经过八年艰苦斗争的岁月，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亚洲最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武装力量，中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然而，也有人不以为然，甚至于感觉这胜利来得快了点，早了点。因为，他们始终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把日本法西斯作为二号敌人。然而，不论怎样，抗日战争的胜利属于中国人民，尽管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人民的意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违背

的，历史的车轮不可能倒转……”

那天晚上，韩丁他们从周恩来的住所出来，已是深夜了。韩丁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和坦纳鲍姆几乎一夜未能入睡。

韩丁回忆说：“那个晚上，我觉得有一种新的力量鼓舞着我，多少天来萦绕在我们心中的迷团，突然有了一线光亮。同时，一种新的历史观以强有力的来势在我的思维中撞击……”

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一场新的反共高潮，实施他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部署。

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下的解放区和抗日部队主要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已经扩大到 19 个省市地区，人口达一亿，抗日部队 120 万人，民兵 230 万人。而国民党部队偏处西南一线，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要解放区抗日部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要国民党嫡系部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准备，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还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治安。与此同时，任命了一批投敌汉奸如孙良诚、周佛海等为司令长官或总指挥。而作为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的美国政府则加紧实施其对华政策，派遣运输机帮助蒋介石把大批国民党部队运往华南、华中、华北地区。

一出由美国支持，蒋介石、日伪合流的丑剧上演了。

这出戏的演出需要时间。

8 月 14 日起，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

家安危之大计”。

“毛泽东会不会来？”几乎整个山城都在议论着，猜测着。

8月28日，韩丁接到通知，有重要新闻采访，下午三点多钟，韩丁匆匆赶到重庆九龙坡机场。这里已经先到了很多人，他们当中有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著名人士邵力子、雷震、张澜、沈钧儒、郭沫若；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群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轻声交谈着，不时地举首遥望长空，正是盛夏酷暑，万里无云，蓝天如洗。

突然，从遥远的天际隐隐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便在蓝天下渐渐显现出一个银色的光点，它由小到大，在阳光下闪烁，紧接着，马达声越来越强，震耳欲聋，摇天撼地，随着一阵呼啸的气流，飞机徐徐降落下来。

人们不约而同地向飞机涌去，韩丁迅速跑上前，占领了拍摄的有利位置。

仓门一开，一位身材高大，头上戴一顶白色巴拿马船型帽的人挥着手向人们致意。他身着宽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穿一双黑色布鞋，他刚刚走出仓门，机场上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欢迎毛泽东！”

“欢迎毛先生！”

……

毛泽东微笑着挥动大手，迈开大步走向人群，亲切地和一双双伸来的手紧紧相握，就在这一瞬间，韩丁拍下了

毛泽东在重庆的第一张照片。

韩丁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说：

毛泽东的身后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还有周恩来，王若飞。

毛泽东和周至柔，张澜等一一握手。

我们这些记者们急切地往前涌，纷纷围上去。

“请问，毛先生，你对这次来渝谈判有何预见？”

“请问，如果谈判落空，中共将做何打算？”

……

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仿佛被潮水漂移着一样往前涌动，他以最简洁的语言，回答着人们的问题，谈笑风生，潇洒自如。

这热烈的场面使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周至柔等人不安起来，生怕发生意外，可又没有什么办法，一个个束手无策，不知怎样才能恢复正常秩序。

就在这时，周恩来突然分开人群走了上来，他不慌不忙，高高举起手里的一个文件包，提高嗓门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这里有从延安给你们带来的礼物，请到我这里来取吧！”

于是，记者们一下子涌向周恩来。“调虎离山”成功了，毛泽东得以和欢迎的人们握手交谈。周恩来打开文件包，送给每个记者一份“礼物”——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讲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救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即

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最迫切者，为保障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sup>①</sup>

《新华日报》当天为毛泽东到达重庆发了号外，整个山城沸腾了。

9月2日，韩丁和坦纳鲍姆又一次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在龚澎的带领下，来到一间小会议室，龚澎示意他们稍候。

这次，他们是专程前来会见和采访毛泽东的。

透过穿堂的窗户，韩丁见毛泽东正在和来自各界的朋友谈话。

毛泽东左手叉腰，右手挥着有力的手势，随着头部的摆动，浓密的黑发在颤动，使讲话更加生动有力。韩丁看到毛泽东那宽宽的前额下一双深沉的眼睛闪动着神采的光。

韩丁急于要听清楚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不由自主地向窗口走去，他注意到，毛泽东今天穿着一件洗旧的军装，皱折很多却很干净，脚上是一双农民常穿的布鞋。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不相信蒋介石的诚意，向毛泽东说：蒋介石可能是在摆“鸿门宴”。毛泽东说：“我们来它一个假戏真唱，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有何不好！”

有人请毛泽东谈谈：关于此次谈判的前景。

毛泽东指出，国共谈判所争的是民主与非民主问题，是中国人民能否得到应有的民主权利和中国人民已经得

---

<sup>①</sup>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到的民主权利能否保持的问题，即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之争，因此，谈判必然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和避免内战，建设新中国的目的，作了重大让步，也一定要以极大的努力克服谈判中的困难，去争取实现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说：国民党现在还在利用日伪军在许多地方攻击解放区人民的军队，国民党所谓“还政于民”正是“夺政于民”。如果真的要还政于民，就应该首先承认解放区民主政府，承认人民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政治权利，就应该给大后方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结束一党专制，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他挥动着大手，神情果敢地说：民主自由，是不能靠人恩赐，也不能靠好心肠得到，必须凭自己的努力斗争去取得。

韩丁完全被毛泽东的讲话吸引了，直到龚澎热情而有礼地催他们去客厅时，才猛然醒悟过来。

就在这时，韩丁听到一阵有力的脚步声，一抬头，毛泽东出现在眼前，龚澎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紧紧握住韩丁的手。韩丁注视着毛泽东，发现那是一张非常生动的脸，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岁月，却没有丝毫皱纹。

韩丁突然记起了斯诺关于毛泽东的描述：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目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间所得到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韩丁在后来回忆起毛泽东时说：他令人肃然起敬。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又有着西方人的幽默，喜欢憨笑，甚至于在说到苏维埃的缺点时也笑得那样厉害，他说话通俗，有人可能会感到有些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起来。

韩丁一时有很多问题要向毛泽东提起，但是，他发现毛泽东是一个非常虚心好学的人，会见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毛泽东发问，从他提出的一连串探讨性的问题中，可以明显地发现，他读过有关美国的大量材料并对美国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而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已经从别人那里得到了答案，只是希望听听不同观点，或者验证一下以前所得到的答案是否正确。

毛泽东向韩丁他们详细询问美国劳工运动情况，探讨关于工会和领导人的具体情况；问起了罗斯福死后刚刚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情况；当毛泽东得知韩丁曾是美国农民协会负责人时，幽默地说：当年，我在湖南也曾担任过农民协会主席。

谈话处在一种热烈，和谐而欢快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天已很晚了。毛泽东却依然谈兴很浓，担任翻译的龚澎微笑着说：“主席还有工作，改日再和大家谈吧。”

毛泽东起身和韩丁握手告别。韩丁见毛泽东精神饱满，毫无倦意，微笑着转过高大的身躯，步履矫健地走出了房门。

龚澎带领韩丁和杰·坦纳鲍姆走进餐厅。宋庆龄女士在那里等待他们共进晚餐，几个简单的小菜，白米饭，

然而气氛却很快活，大家边吃边聊，一直沉浸在一种热烈和谐之中。

转眼之间，半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期间，韩丁多次来到办事处。

在那次由郭沫若主持的在天官府召开的欢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韩丁听了金山关于《屈原》一剧中的独白，观看了贺敬之等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以及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等。

延安的朋友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那天，回到住所，天已很晚了，韩丁和坦纳鲍姆没有一点倦意。

“延安的文艺是真正人民的文艺。”

“从延安的文艺可以透视出那里的政治是充满生机的政治。”

“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毛泽东离开重庆的前一天晚上，韩丁再次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这里正在举行由《新华日报》社，《群众》杂志社主办的欢送毛泽东的联欢会。王若飞、潘梓年介绍韩丁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我们已经相识了。”

韩丁坐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兴奋地对韩丁说：“记者是个很了不起的职业，斯诺是我们结识的第一位美国记者，也是好朋友，欢迎你们到延安来……”接着他向韩丁介绍在场的朋友，他称胡绳是青年哲学家；称戈宝权是苏联文学家；称陶行知为教育家……他说：“他们是中国



的宝贵财富，从他们身上可以写很多文章。”

也就是在这个联欢会上，韩丁结识了黄炎培、史良、邓初民、老舍、夏衍、冯乃超、叶以群等知名人士。

不久，大厅里回荡起悠扬舒缓的舞曲，周恩来先是和大家共舞，接着又指挥大家一齐唱《黄河之歌》。办事处和报社的女同志，还有苏联的女同志一齐拥上来，邀请毛主席跳舞。毛主席欣然应邀，边跳边谈，问长问短，一位女同志见王若飞独处一隅，走过去请他跳舞，他摇摇手，表示不会。女同志却不罢休，屈膝行礼再次邀请，若飞不得不站起来，迈开方步，仿佛在操练，引起了一阵笑声。

韩丁来到陶行知身边坐下，他们已是老相识了。最初的一次接触是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们谈起教育，韩丁从自己的母亲讲到杜威，陶行知从孔子治学谈到中国教育面临的形势，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

后来，重庆一位共产党员教师被害，韩丁约陶行知一起来到教师家中，向英烈的遗体告别。

韩丁回忆说：“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阴沉沉的石板路上，陶行知一句话没有，我们就这样默默地走着，直到分手……”

“陶先生，对毛泽东此行有些什么感受呢？”韩丁望着陶行知。

“依我之见，内战难免，但共产党光明磊落，以民族利益为重，是真正的希望之所在……”

周恩来走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周恩来扶着韩丁

的肩头说：“美国人民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共同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战斗。”说着韩丁和陶行知同时站了起来，周恩来和陶行知一人拉着韩丁一只手，深情地注视着。

韩丁回忆说：“我未曾想到，此时竟是我与陶先生最后一别。”几个月之后，国民党特务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加紧迫害，先是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继而杀害了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遇难沉重地刺激了陶行知，他因悲痛甚深，患脑溢血去世。

“那天，我赶去与陶先生遗体告别，见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来了，周恩来握着行知先生尚未完全僵硬的手，眼里溢满了泪水，他哽咽着说：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的……”

东方欲晓，韩丁和他的朋友们早早赶到机场，毛泽东已经脚步匆匆地走了过去，那架美式小型客机的螺旋桨已经缓缓起动，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他走到韩丁身边时，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来延安！”

一阵轰鸣，飞机腾空而起。

韩丁举目仰望着，直到飞机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踏上回归住所的路途，韩丁怅然若失。仅仅半个多月时间，他感到仿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经受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认识和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更。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这个一直使他困惑的问题突然变得清晰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韩丁时时有一种期盼，有一种向往，那就是到解放区去。然而，由于工作的关系，这一愿望一直

未能如愿。

韩丁在美国新闻办事处工作了一年多，就要回国了。直到登上归途的列车，他似乎还有一种深深的遗憾，那就是未能实现去解放区的夙愿。

# 拓 荒 者

在人生的道路上，将血和汗一滴一滴地洒下去，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鲁迅《两地书》

1947年早春，东北大地还覆盖着白雪，从南面，从草原那面的小山上，转暖的潮湿的风吹来了。迎接春天的最初的夜，蒙着飘流的雾，仿佛是一缕缕寂静的黑色绢纱。早晨来得很迟，蔷薇色的夜雾被晨风吹开了，露出了天空和白云，大粒的雪珠凝结起的冰开始崩溃，缕缕炊烟下的屋顶，出现了褐色的斑纹，道路上，两条暗色的车辙仿佛细长的飘带伸向远方，河水开始涌动，从上游的什么地方，被太阳融化的淡青色的冰块顺流而下，在河的拐弯处旋转着，冲撞着，有时被冲上陡峭的河岸，有时被冲进岸边的田野。

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是太阳，乳白色的雾，最早的云雀唱出的动人的歌，响彻高远的白云。

白云下，广阔的原野上，跳动着阵阵马达的轰鸣，震得凝冻的大地颤抖，长长的一队拖拉机一字排开，缓缓地向前爬行。

1947年初，联合国救济和复兴委员会捐赠一批拖拉机给中国，并派技术人员组成援华工作组，主要任务是开发荒野，发展农业新区，位于东北的察哈尔荒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长长的拖拉机队伍中，居首的一台上边端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青年，凛冽的寒风翻卷着他那金色的短发，朝霞的映照下，冻得通红的两腮闪烁着青春的光。

他是韩丁。

他穿一身油污的工作服，蹬一双厚底牛皮鞋，他紧紧握着操纵杆，随着剧烈的颠簸上下起伏着，仿佛处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他的身后是犁铧刚刚卷起的褐色的冻土，像是大海上翻起的浪花，间或有田鼠，野鸡被惊醒，仓惶地逃窜。

韩丁不时地回过头来，大声地向身后的拖拉机手呼喊着，一只手挥舞着，指点着。

一个月前，韩丁还在美国一家新闻处担任记者。联合国救济复兴委员会组织援华工作组的消息一传出，他立即申请加入了这一工作。

按照计划，第一期工程是开发黄泛区。1937年，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望风逃遁，为保全自己，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炸毁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用洪水阻止日军的追赶。结果，难以计数的人民死于洪水，数不清的百姓家破人亡，大片农田遭水淹没。

十年过去了，那里已是一片荒野，野草和灌木丛的根已深深扎进泥土中，农民那种传统的扶犁已无法将其根除，拖拉机以深耕法可以把它开垦成良田，从而使那些流离失所的灾区农民重新回到这里耕种。

韩丁满怀信心地来到黄泛区，望着那浩浩荡荡的拖拉机队，听着那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从一望无际的荒原上滚过，韩丁曾激动不已，他曾暗暗下定决心，要在这里为中国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然而，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

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使这里的开垦计划很快流产了。

四大家族和盘踞各地的军政要人像一群贪婪的饿狼一样把这些拖拉机视为肥肉，疯狂地扑来抢噬，结果，两千多台拖拉机便依照各人的政治势力大小强行瓜分，使一大批拖拉机成了某些人的私有财产。

黄泛区开发计划落空，韩丁随工作组带着剩余的拖拉机开往东北。呈现在韩丁面前的是千古荒芜的凄黯与深寂，除了望不断的荒草和喊不破的寂静之外，一无所有。

一阵阵冷峭的北风呼啸着，飞旋着，发出凄楚苍凉的悲鸣。

韩丁和拖拉机手们冒着寒风支起帐篷，架起炉灶，千古沉寂的荒原上升起了缕缕炊烟，燃起了前所未有的生机。

夜来了，天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乌云把天压得很低，像要塌下来似的，寒风呼呼地撕扯着帐篷，雪片不时地飞旋着钻进来，落在正聚精会神地研究土地资料的韩丁身上，他不住地搓着手，嘴里大团大团地吐着白色的雾团，时而站起来，跺跺脚，伸伸臂，驱赶寒冷的袭击，接着坐下来继续工作。

他常常为了一项土地资源的数据步行几十里，取土样，访问当地百姓，深入细致地掌握当地土地特性，研究分析制作耕作规划，他曾这样告诉自己的伙伴们：我们是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谱写自己的奋斗乐章，有着特殊的意义。

开垦工作很快全线推进了。然而，就在他们满怀信

心，一展宏图的时候，出乎所料的事情接踵而来。

一位地方官员声称有军务，把拖拉机调走一批，而实际上是据为己有，转手倒卖；另外一些乡绅土豪则三天两头跑上门来，要柴油、拉机具，最后连帆布篷也要抢……

面对这一切，韩丁心急如焚，他深深地感到，中国现实的黑暗与可悲，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最缺少的不是物资和技术，而是一个真正属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韩丁多次向有关方面反映、呼吁，希望给予过问，以保证垦荒计划的正常进展。然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这腐朽的机体太庞大了，太沉重了。

察哈尔垦荒工程越来越艰难，到3月底，已无法推进。

韩丁不得不又一次失望。

5月，韩丁接到命令奔赴绥远，开垦萨拉奇大荒原。对于此行，韩丁不再像以往那样有信心，但是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使他别无选择。

起程了。二十台拖拉机，从天津起运，经北平奔绥远。一路上数不清的艰难困苦，为了防止拖拉机部件受损，韩丁白天黑夜守在车厢里，同行的人们无不韩丁的举动感慨：“朋友，你这样吃苦受罪，到底是为个啥？”

韩丁总是微微一笑，充满自信地说：我有自己的人生追求。

萨拉奇是绥远平原上一个城市。从萨拉奇山顶俯瞰，黄河蜿蜒东流的恢宏景观尽收眼底。韩丁第一次登上山顶，举目一望，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了：苍莽的群山，



奇岩壁立，万仞擎天，一条银白色的飘带穿云破雾，游刃于峡谷之中，烟雾缭绕，浪花飞溅，发出千万惊雷翻滚奔腾的轰鸣，浩浩荡荡，汹涌澎湃，一泻千里。

触景生情，韩丁不由想起了美洲的亚马逊河，她以希腊神话中勇敢的英雄亚马逊命名，从安第斯的东麓发源，汇集二百多条纵横交错的支流，织成了一张流程六百公里的广袤河网。

他又想起了密西西比河，那里蕴含着美国人民的勇敢和智慧，曾经是世界上船只最多的河流，也是世界上各种风帆的博览会。

然而，他感到黄河有她独特的神韵。他曾读过不少关于黄河的资料，她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漫长的岁月里，她用乳汁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灿烂的文化，她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和人民群众勇敢性格的象征。

黄河是勤劳的，她像一个倔强的母亲，率领众多的儿女，日夜不停地奔流……

面对这气势恢宏的黄河，韩丁心中升腾起一种沉重的历史感，涌起一种对中华民族的崇敬之情。他越来越感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着人类最伟大的精魂。

迎着飞沙走石的塞外狂风，韩丁和他的同伴们着手勘察土地。这里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多少年来，冬天大地冰封，春天连续干旱，夏季洪水泛滥，而洪水一过，干风四起，大地马上又裂开了孩子嘴似的口子。

韩丁查阅了大量地理水文资料，了解到造成这一带

洪水泛滥的原因，除自然因素外，还有人为的原因。1936年，这个地区发生大水灾，灾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政府的扶助下，计划在绥远地区建造一条从包头到萨拉齐的灌溉渠，从而把黄河水引来灌溉这一带的农田，当时有人把这条渠取名“民生渠”。但是，由于美国专家的设计错误，灌渠建成后，水平面比附近的地平线还低十英尺，根本无法把渠水引入田地，相反，在洪水季节，渠水倒灌大田，使农田越来越盐碱化。后来，农民便把它称为“民死渠”。

韩丁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之后，提出了关于绥远垦荒的整体规划，带着全体拖拉机手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荒原上，塞外的风砂打在脸上，刀割似地痛，塞外的夜仿佛特别漫长，他们全不在乎。他们风餐露宿，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开垦出上千亩田地。

然而，不久，新的问题出现了。不断有地主豪绅把新垦的田地划为己有，接着是燃料不足，给养短缺，连拖拉机手的衣食都难以维系，后来，一些地方官干脆把拖拉机调去为自己办私事，据为己有，机耕队名存实亡。韩丁痛心疾首地奔走呼号，然而，各级地方官只是打官腔，高谈阔论，无一人认真过问……

绥远垦荒计划流产了。

韩丁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离开了绥远。一路上，满目荒芜的农田，到处是乞讨的农民。

这一年萨拉齐大面积歉收，而地方官和追命税却有增无减，不少农民因无力交税被逼得家破人亡。韩丁亲眼

目睹了那些逼税的官兵是怎样把农民剥得一丝不挂，捆在雪地上，然后拿冷水浇在他们身上，一个个活生生地被冻死……，与此同时，一些从天津、上海来的投机商人和萨拉齐的土豪地主相勾结，合谋压低粮价，把大批谷物抢购外运，一车车的小麦、谷子被他们运往北京、天津等地去捞大钱、发大财。

饥寒交迫中的农民走投无路，揭杆而起，爬粮车，毁铁路，砸粮仓，风起云涌……

韩丁看到这一切，深深感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民怨似柴，一点即燃的历史时期，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再也无法维持其政治统治，一个新生的制度必然破土而生。

韩丁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曾就新中国的诞生谈过这样的感受：共产党代替国民党，新中国代替旧中国，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因为国民党失去了民众，旧中国已变成少数人的统治工具，这就决定了它的命运，正如中国有句古话：民众好比水，政府好比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韩丁就这样，带着无限失望和新的思考离开了绥远。

7月，韩丁接到通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河北省南部涉县担任拖拉机技术员。

对于韩丁来说，完全出乎所料，却又在他的期望之中，长期以来，他就盼望着到解放区去，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韩丁乘汽车到北平，接着，坐一辆马车昼夜兼程赶往涉县。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韩丁乘坐大车来到涉县，这里正在为了一支开往前线的解放军部队送行。大街小巷的人流，五彩缤纷的标语，此起彼伏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韩丁穿行在欢腾的人流中，不时有老人、孩子走上前来，向他问候，一种热烈、向上、朝气蓬勃的气氛紧紧地围拢着他。

“一个崭新的天地！”

韩丁说，这是我当时极强烈的一种感觉，一种直觉，虽然还没有更多的依据，但是从心理沟通，心理反映上，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穿过涉县县城里的人流，赶往十里店农场。这是解放区开垦的第一个农场。前来迎接韩丁的一位年轻战士，边走边滔滔不绝地向韩丁介绍这里的情况。

韩丁满怀新奇地注视着周围的环境，见许多墙上写着醒目的标语：

“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军民鱼水情，团结如一人！”

韩丁指着那条“自力更生”的标语，问战士：“这条标语怎样理解？”

那位战士兴致勃勃地讲了起来。

“这是我们解放区发展生产的口号，就是靠自己的力量，不依靠外援。对待农民，人民政府竭尽全力支持他们发展生产。我们这一带的农民，在政府的鼓励下，种植大

量的棉花，产量比国民党统治时翻了两倍多。到了秋天，你可以看到这一带棉田似海，一望无际。在人民政府的保护价格下，近年来，这里的农民种小麦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了，农民不担心像国民党统治那样，官商勾结压价收购。”

一路之上，韩丁看到一条条公路正在开拓，筑路队伍中除了年轻人外，还有老人、孩子，人们热火朝天，斗志昂扬。年轻战士告诉韩丁，像这样的公路，只用几天时间就能完工。他还讲述了最近在邯郸建造汽车修理厂，抢修铁路的动人场面。年轻战士说：“不到两个月建一座工厂，几天之内把战争摧毁的铁路恢复，这一切对国民党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想象，但是，在我们解放区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韩丁听着他的谈话，明显地感到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自豪与欢乐。

韩丁清楚地意识到，这里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是两重天地，是一个深受人民群众热爱的新制度，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

为了韩丁的到来，农场举行了气氛热烈的欢迎仪式。场长是个部队转下来的“老革命”，一身旧军装，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走起路来脚底生风似的。

他兴奋地拉住韩丁的手向在场的人们大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农场来了个洋教授，是美国来的，技术大把式，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宝贝蛋。”

他顿了顿，略微思索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冀衡农场

要迅速发展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全国解放，任务很重，怎么办？要发展机械化，韩丁先生来我们这里，就是要把大家都培养成新中国第一代拖拉机手！”

全场一阵欢腾。

农场有三千亩地，这里有 40 名拖拉机手，是刚刚从部队、城市中选招来的，韩丁的任务是带领他们边种地，边学习拖拉机技术。

韩丁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有个习惯，干起活来，不愿意让别人打扰，一件事干不到一个段落，宁可不吃、不睡。开始，炊事员摸不清他的脾气，每到开饭就去催他吃饭，韩丁不高兴地说：“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语气往往是那样不愉快。

韩丁虽然很忙，但是并非不留意一些细微的生活细节，他发现，开始几天，干部们陪他一齐进餐，饭菜比较丰富，两天以后，干部们不再上桌吃饭，而是每人盛碗饭，端到一边去了。韩丁一留神，发现所有的干部和职工吃得都比自己差，原来，那些好点的饭菜是专门为他做的。

韩丁心里十分不安，他主动找到炊事班长：“请不要把我当成客人，我应当和大家一样。”

拖拉机手培训工作很紧张，韩丁夜以继日地工作，带领学员们学习驾驶技术，手把手地教他们维护。

一个阴雨天的傍晚，由于光线不好，韩丁带领学员维修拖拉机时，碰伤了右手，鲜血直流，学员们纷纷劝他别干了。可是，韩丁若无其事地摇摇头，掏出一团棉纱包起手来继续工作，第二天，那只手已肿了好高，领导劝他休

息，他依然说：“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别大惊小怪的。”说着，又继续上班了。

到了8月，一连几天的暴雨袭击着冀中平原。运河的水位猛涨，眼看就要决口。县、区、村的干部带领群众成群结队地涌向大堤，干部们光着膀子担土、扛麻袋、抬门板，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他们和群众一起啃干饼，一起露宿在大堤上。

韩丁被感染了，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抗洪战斗。他没有想到，高达数十英尺的大堤，仅用几天时间就矗立起来了。

韩丁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从这里我看到了新中国的雏形。这里，虽然大家穿的是自己用木制纺车织的粗布，吃的是粗茶淡饭，但是，人和人是平等的，在这里再也看不到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的现象，看不到在蒋管区内司空见惯的穷奢极侈的腐朽；也看不到乞丐成群、妓女充斥的现象，抢劫偷窃也荡然无存，与蒋管区罪案如麻的情景截然不同两样。

那是一个朝霞满天的上午，一队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解放军队伍从这里走过。那些战士一个个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端详着拖拉机，好奇地问韩丁：

“同志，这是什么物件？”

“拖拉机。”

韩丁回答了以后，觉得还不够，又补了一句：“就是铁牛！”

“铁牛！能犁地吗？”

“当然，每天可犁五十亩，比十头黄牛还强。”

“那它吃什么？”

“吃汽油！”

人们哈哈大笑起来。

“好，等打完仗回来。我们也拜你为师，学开铁牛。”

队伍渐渐远去了。

韩丁久久地望着那朝气蓬勃的队伍，心里荡起无限的激情！未来的中国定然会在他们的手里走向辉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秋天，联合国救济和复兴委员会宣告解散，许多成员先后回国。韩丁毅然决定留下来。

年底，韩丁到中共中央北方大学任英语教师。

韩丁就这样从国统区走到解放区，亲身体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期望，对新生活的希冀，也正是这样的阅历，奠定了他与中国人民血肉相关的联系，奠定了他对新中国的无限深情。



# 难眠之夜

前进，让我们肩并着肩，  
伟大的世界永远沿着变化的  
轨道旋转。

穿过地球的阴影，我们进入  
更年轻的时代；

激奋的几十年胜过古老中  
国的一轮循环。

——丁尼生《洛克斯利堂》

北方大学设在太行山腹地的上党古城长治以北二十公里处的高庄。

方志上诠释说，上党“居太行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这里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堪称太行山的脊梁，从广袤千里的华北平原西眺，太行群峰，千岩迭嶂，万岭起伏，连绵于天际之间，黑压压地像一条不见首尾的云带，所以又有“太行自古天下脊”的说法。

上党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曾发生过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后晋后梁的夹寨之战，后周北汉的巴原之战。相传公元 206 年，魏武帝曹操挥军征高干，兵马至此受阻，曾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坳曲，车轮为之摧……”

面对崇山峻岭发出无限感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部曾设在这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曾仁马太行，在这里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立下了汗马功劳。1945 年，上党战役，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取得了震撼中外的胜利，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

就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有座古城长治。

按照中国风俗，阴历年正是悠闲清静的日子。可是 1948 年的春节，长治城里分外热闹，人们也格外忙碌。只见满街人流如潮，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店铺前悬挂着彩旗和五色标语，标语上分别写着：

“拥护土地法大纲！”

“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

……

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不断涌进从四面八方农村奔来的农民，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驴，老太太、小媳妇坐在手推车上颤颤巍巍，一张张脸上洋溢着宽慰、安详、自得的笑意。

古城正街北端，有座英雄门，那是1946年，为召开华北抗日群英会专门兴建的。当年，来自华北各地上千名杀敌英雄、生产模范和支前先进人物参加会议。他们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英雄门前走过，进入东边的英雄台广场。

此时，英雄门的東西两侧各摆开一支八音会的队伍，吹打得热火朝天，只见唢呐手的脸一个个涨得像个红脸关公，两腮仿佛含着两个大鸡蛋，高仰的唢呐在空中摇来摆去，锣鼓手不时地把家伙甩向空中，随着激昂粗犷的旋律，围观的人们发出一阵阵喝彩声。

“秧歌队来了！”

随着喊声望去，见身披彩绸，腰系缎带的姑娘们踏着欢快的节拍边舞边唱地走了过来；高跷队的演员扮演这样，那样的戏文，甩着花杆，说、唱、逗、打，让人笑得合不拢口。

一些专业剧团在街头表演活报剧，大多的主题是斗地主闹土改，庆翻身，还有一些揭露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罪行的。

欢腾的人流，从上午到傍晚，在古城四街流淌，一直

到夜色降临。

就在这同一个日子里，北方大学的校园里也沸腾了。

北方大学是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个文化教育中心，是一所培养各级干部的学校。由于战争的原因，学校时常搬迁，其实是一所流动式、游击性学校。当时，设在高庄的一所教会大院里。

在这里担任英语教师的韩丁，一大早就发现校园里有一种新的气氛。学员们在操场上，饭厅里纷纷议论着什么，接着校园里四处贴出了用红纸写的决心书《到土改一线去》、《做“土地法大纲”的宣传员》……到了下午，学员们开始在教室里讨论，不时地传出慷慨激昂的口号声：

“宣传贯彻《土地法大纲》！”

“到土改一线去，接受革命的考验！”

……

气氛热烈，声势浩大，整个校园沉浸在激昂向上的浪涛中。

韩丁终于弄明白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从北方大学中抽调部分学员参加土改工作队，宣传贯彻《土地法大纲》。

《土地法大纲》是1947年9月，中共中央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文件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中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

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贫农，并分给地主同样一份”。

早在《土地法大纲》公布不久的上年冬天，韩丁就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过这个文件。

他回忆说：我感到它和美国的《黑人宣言》具有同等的历史价值。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纲领性文件，是一个在中国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文件。但是，同时我有一种困惑，因为我在中国已经接触了一些现实，那就是在垦荒中的挫折，如此辽阔的幅员，如此深厚的历史沉积，这样彻底性的革命能贯彻下去吗？

韩丁怀着这样的认识和思考，产生了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念头。

新年一过，几百名参加土改工作的学员和几百名本地的县区干部混编成了土改工作队。临出发那天，一大早，男女青年们就忙乱起来，捆行李，打背包，他们哼着歌，兴奋地谈论，说笑。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背上行李，在一面红旗的引导下，在一片锣鼓声和口号声中出发了。

红旗飘舞着向远处移动，渐渐消失在远天的白云下，大路上只留下两股漂浮的烟尘，远处的群山闪烁着晶莹的光芒，那是冬天的残雪。

韩丁久久地凝望着远去的队伍，心潮起伏，热血沸腾，一种激昂的情绪不断冲撞着他的心，一种年轻人所特有的追求进步，探索真理、探索人生的希冀使他下了决心：我也要像他们那样到农村去，参加土改工作队，了解

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这一天,韩丁的心情似乎怎么也不能平静,在课堂上讲课多次走神,午饭也吃的很少,中午的休息时间,他找了几个老师说出自己的打算。

“你可以去,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你应该去找校长谈谈。”

夜已很深了,韩丁在空旷的教会大院里徘徊,他仰望长天,见星光点点,新月中天,整个大院里一片寂静,只有教堂二楼一扇窗口闪着桔红色的灯光,他知道,那是校长范文澜还在灯下办公。

韩丁迈步向那间屋子走去,他轻轻推开校长的房门,灯光里,范校长正伏案读书,他身材不高,背有些驼,一副厚厚的深度镜片后闪动着一双智慧而深沉的目光。韩丁敬佩地望着面前这位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曾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不仅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而且有一腔爱国热忱。抗战爆发,他投笔从戎,离开繁华的大城市到达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他以治学严谨闻名,著有《中国近代史》、《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等著作,在全国享有盛誉。

范校长起身招呼韩丁坐在房子中央的火炉旁,自己搬了个条凳坐在对面。热烘烘的暖流顿时扑面而来,范校长打开炉盖,从里边取出两块烤熟的土豆,顿时一股诱人的香气洋溢在整个房间里,校长和韩丁一人一块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韩丁注视着校长说:“校长,我要求下乡参加土改工

作。”

校长似乎没有听明白韩丁的话：“你说什么？下乡。”

“是的，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对于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农民，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是，你是外籍人员……”校长放下土豆，站起身来，背转身，在地上踱着步子。这是一个学者长期以来思考问题形成的习惯动作。

韩丁的目光紧紧地追随着校长的身影，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桌子上那只马蹄表发出“嘀答，嘀答”的声响。

校长终于停住了脚步，注视着韩丁：“我很赞赏你的胆识和勇气，感谢你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热诚。的确正如你所感知的，目前正是中国最关键的历史关头，也是中国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作为年轻人抓住这个时机去感受、去认识、去实践，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选择。”范校长越讲越兴奋，那充满智慧的头高高仰着，两眼闪着激越的光。

就在这个飘雪的深夜，范校长和面前的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人谈了很久，后来，校长与年轻人结伴走出房门，漫步在严冬的夜色里，寒风凛冽，可是他们的心却热呼呼的，那是两颗对革命事业充满向往与希冀的心相互撞击发出的共鸣，是对新生活充满信心的感应。

校长拉住韩丁的手，严肃地说：“你下乡的事，我明天就去区里、县里联系，等党组织决定以后，马上通知你。”

三天以后的一个上午，韩丁正在课堂上讲课，教务处的老王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伏在韩丁耳边悄悄说了几句

什么。韩丁没等老王说完，高兴地举起双手：“OK！OK！”他脸涨得通红，向学员们用生硬的汉语说：“同学们，我要去土改第一线了。”



# 伟大的实践

亿万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运动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它所揭示的真理，往往比教科书更丰富、更生动、更真实，许多革命者就是从这里认识世界、认识革命的。

——列宁《论学习》

1948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韩丁动身前往学校以南十公里处的张庄参加土改。

范校长和学校其他领导同志前来为韩丁送行，人们簇拥着他一直走到村外很远的大路上，才一一握手告别。握着那一双双有力的手，望着那一双双亲切的目光，韩丁不觉心里一热，眼眶里涌上了晶莹的泪花。

到北方大学已经4个多月了，朝夕相处中，他与这个集体的情感越来越深长，这是个充满生机的集体，又是一个洋溢着温情的家庭，人们把他视为师长，又把他当作朋友，和睦、真诚、无私的人际关系给他鼓舞，给他力量。

现在要离开她了，一种留恋之情油然而生。

冬末初春的黄土高原，裸露着苍凉干冷的肌肤，淡黄色的土地上点缀着一片片白色的斑点，那是冬天的残雪在灰蒙蒙的阳光下闪烁着银色的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田，被一条条碎石垒起的地堰勾画成无数个格子，山坡上的梯田里已经有人耕作，牛和人同拉一付套缓慢地向前移动，木犁的后边是翻起的新土，像是褐色的飘带。

与韩丁结伴同行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名叫戚云，身材不高，圆圆脸，一双秀美动人的眼睛，她的主要任务是为韩丁担任翻译。

韩丁迈开大步，踏着松软的田野向扶犁的农民走去，他饶有兴趣地察看着木犁，好奇地对戚云说：“密斯戚，这样的木犁恐怕在上古就有了，我曾在教科书上见过，想不

到这里还是重要的耕作工具。”

戚云对韩丁讲话必须把头高高仰起：“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太漫长了，农业一直在这样艰难的爬行。”

韩丁深有感触地说：“美国的南北战争不仅仅是砸碎了一种旧制度，更重要的是把美国农业一步推向了现代。”

离开村庄越来越远，风也越来越大，韩丁任凭山风吹拂他那金色的卷发，甩开长腿往前走。戚云紧紧跟在后边，为了避开寒风，她把软沿军帽压得很低，只露出灰白的紧闭的嘴唇。她的双手对插在袖子里，紧紧抱在胸前，迎着风，斜着身子艰难地往前走，远远望去，活像一只直立行走的熊猫。

韩丁转回头来，看着戚云，几乎笑了起来。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张庄就在眼前了。韩丁迎着风，细眯着眼望去，见黄褐色的大地上横出一片灰色的农舍。

“那就是张庄。”戚云向上推了推帽沿，露出那双动人的眼睛。

张庄东枕太行山脉，西临漳河，处在一个方圆二十多里的平川上，一条大路横贯村中，往南可达河南，往北可去太原，这条大路上成年累月有车夫和行人跋涉，不论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张庄从东到西，200多户人家，大多是土坯房子，冬季呈现出一片灰黄，只有到了春夏，绿树掩映，才披上一层生机。村子中间一条土路，夏季里，暴雨袭来，所有的雨水从各家各户的院落里流出来汇集到这条路上，于是，路就

变成了河，直流向村中的池塘，池塘四周长满绿柳，村里的妇女常常在柳树下的池塘边洗衣服。

池塘附近的一片开阔地上，有个大车店，可停放大小车辆，路过张庄的车把式常常在这里打尖歇脚。他们蹲在路边的小摊前，狼吞虎咽地吃面条、米饭、烙饼。

大车店旁边有个小杂货铺，其实是间东倒西歪的土坯房，里边摆着旱烟、针线、豆油、食盐等小商品。因光顾者很少，所以掌柜的常常不是守在店铺里，而是蹲在门前与过往的闲者下棋聊天。

张庄在1946年以前，世世代代就是这样默默地喘息着，村里的农民过着忍饥挨饿、受冻遭病的日子。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集中优势兵力占领城镇，张庄也难逃洗劫。

张庄的百姓在饱尝地主、奸商的欺压的同时，又遭受日军的残害，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宗教成了绝望中的农民的精神依托。1840年以后的十年里，随着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第一批外国传教士来到太行山区。他们大多是意大利圣芳济会教士。十九世纪末，又从法国和荷兰来了一批同一教派的教士，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影响，在长治建立起一个教区，张庄成了其中的一个分支。1916年，张庄的教会活动达到了高峰，传教士们从全县各地筹集砖瓦，请来高明的工匠，在村北的一片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庞大的、歌德式教堂，教堂顶部的塔楼高高地凌驾于村舍上空，就像一座路标。

自从1945年8月14日，经过三天战斗，八路军解放

了张庄以后，张庄像注入了新的血液，焕发出勃勃生机。先是1946年的反奸运动，打倒了伪村长，以及反动神父，接着是贯彻《五四指示》，斗争地主，分粮分田分农具，实行土地改革。1947年3月21日到24日，中共太行地委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地委书记王谦郑重宣布：在党的大胆放手、耕地归农的政策下，经过最近4个月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农民已直接从地主手里取得了土地，消灭了剥削，彻底翻了身，土地革命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了。

可是，没过多久，也就是1948年1月，太行地委又在长治以北，张庄以南的鹿家庄召开会议。地委书记王谦对当地的土地改革作了重新估价，指出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张庄党组织根据这一精神在全村开展又一次财产评估，阶级划分。

就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为了贯彻这一纲领性文件，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7年10月在河北省武安县的冶陶召开会议，对全区土改工作进行全面检查，会议决定本年冬到1948年春在全区按照土地法大纲精神，对土改运动进行复查，对没有进行或没有完成土改的地区按照新的政策实行土改，同时，为保证土改的彻底进行，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

韩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张庄的。

走进张庄，街上空无一人。正纳闷的时候，小巷里突然闪出一个穿灰色干部服的小伙子，他手里紧握着一支上了膛的手枪，两只眼睛闪着机敏威严的光。

“同志，”戚云镇定自若地上前打招呼：“我们要找队长。”说完，把一封盖着北方大学印章的介绍信交给了小伙子，然后才掀起自己的帽沿，露出一张红朴朴的脸。

“我带你们去。”

小伙子收起枪，边走边说：“我们这里昨天晚上出了点乱子。”

后来，韩丁才知道，昨天晚上，工作队一个年龄最小的队员遭到暗算，凶手从背后袭击了他，把他拖到井边，正准备往井里推的时候，被行人发现了。

这次没有得逞的暗杀，给张庄笼罩上一层血腥的气息。

走进一个宽敞的院落，在一间顶棚很低，光线暗淡的房子里，韩丁见到了两个穿蓝色上衣的干部，一个是李区长，一个是侯队长。

李区长个头不高，脸上笑容可掬，侯队长身材高大，举止深沉。

先是一番问侯，接着谈起了工作，侯队长语气十分严肃地说：“村子里情况很复杂，我们所进行的土改复查是一次更深入的土地改革，必然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所以阶级斗争必然要激化。你们年轻，又是知识分子，一定要深入群众，多作调查研究。”

李区长郑重其事地对戚云说：“你的任务是双重的，要参加土改复查，还要照顾好韩同志，当好翻译，这担子可不轻啊！”

韩丁的出现，给张庄的农民带来一个迷团。

“这个大个子外国人来干什么？”

人们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对于外国人，张庄的人们并不陌生，自从1916年荷兰圣芳济会的神父们来张庄以后，几十年来，那些身躯高大，鼻梁突起的传教士们川流不息，来来往往，已是司空见惯。然而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外国神父都悄然溜走了。

现在怎么又突然跑来个洋人呢？

后来又听说，这个大个子是个美国人，人们越发疑惑了。

谁不知道美国佬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穿一条连裆裤。自从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那个一直躲在重庆的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了。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越来越近了。一方面是以北方解放区和一亿农民为后盾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是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而美国政府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了国民党政府，用六亿美元的租借法案物资和数亿美元的太平洋战争所剩物资装备蒋军，其中有三十九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师和一百六十七个整编正规军。马歇尔出面调停，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争取时间。然而，韩丁这个美国人却背其政府之道而行之，跑到中国的老百姓之中，帮助穷人搞土改，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张庄的农民天性直爽，他们向韩丁直言不讳地讲自己的疑惑。

韩丁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我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做贡献。”

这样的回答似乎依然不那么有力。当初，那些外国传教士不也是说要帮助中国，要传播主的声音，拯救受难的灵魂吗？

然而，人们渐渐从观察中发现，韩丁确实与他们不同。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吃完早饭，韩丁、戚云跟在侯队长的身后，走进了贫农王文斌的家。

路上，侯队长郑重其事地对韩丁说：“这叫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毛泽东说过：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联系，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能把事办好，为此，只有靠调查研究。”

从阳光下猛然走进王文斌的家，韩丁感到两眼一阵昏暗，定了定神，才看清这是一间凄凉、阴暗的土屋，屋里几乎一无所有，所有的用具只有一口大缸，三只带裂缝的破碗和一口铁锅。呼呼的北风一阵阵窜进屋里，带着刺骨的寒气，一股难以形容的臭气扑鼻而来，韩丁辨别了很久，确认出这是吃蒜以后呼出的气息，仿佛某种腐烂的东西。

王文斌的老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身上盖着全家唯一的一条破被子，王文斌自己蹲在门口，背朝着韩丁一动不动地抽烟。

韩丁注视着面前这位农民，他有两道浓眉，一脸杂乱的胡须，从而使那脸显得很特别，那身子瘦得仿佛一副骨



架，撑着那件肥大的破棉袄，一块块肮脏的棉絮绽露在外面。

韩丁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向王文斌提了几个问题，王文斌面对着这么多生人，特别是一个外国人显得不知所措。

戚云赶忙把韩丁的话又翻译了一遍。王文斌听了以后，才渐渐平静下来，慢慢讲起了他的家史。

从讲述中，韩丁了解到，他们在张庄曾经有过一块土地，灾荒年典给了地主，只好流浪在外，乞讨为生；近两年回到村里，正赶上分配革命果实，有了十五亩地。

讲到这里，王文斌的脸上第一次泛起了开心的微笑，整个屋里生出一片生机。

韩丁在回忆中说：“这是我在张庄结识的第一位农民，第一个农民家庭。我当时并未想到，从此与这个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王文斌的孙子，当时不满十岁的王金红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与我结下了兄弟般的友情。

召开全村贫农大会，会场设在教堂前的一片空地上，人们或自带板凳，或找几块砖头，三三两两坐在那里。韩丁的身旁坐着一位老大娘，她一边捻线，一边听讲，不时地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打断宣讲者的话。村里人叫她王老太，又叫她玉荣娘，从她的讲话里，韩丁了解到二十年前，她死去了头一个丈夫，从山东逃到这里，一路上讨吃要饭，几乎卖掉了亲生儿子，后来，这里的一个远房亲戚收留了她们，给她找了一个比她大 20 岁的长工作丈夫。

“闹灾荒，我卖豆腐，穿得单薄，透过窟窿能看到俺的屁股，旁人为这笑话俺。”她情感真挚地对韩丁讲。“如今好了，分了九亩地，十几石玉米，总算熬出头了。”

散会了，王老太邀请韩丁和戚云到她家走走。

这是个简朴而整洁的房间，王老太向他们谈起的第一件事是她的织布机。她拿起一团线，带韩丁来到一架织布机前，那是一台老式布机，显然也是她的骄傲，她轻巧地上好线，两只手娴熟地把梭子甩来甩去，在双脚的踏动下，发出节奏鲜明的“咔嚓，咔嚓”声。

韩丁端详着老人那充满自信的面容，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油然而生，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妈妈，眼前这位老人质朴、勤劳的品质，对生活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不是和妈妈一样吗？

短短几天时间，韩丁感到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以前从文件上，从教科书里，从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中也曾听到许多有关中国农民的介绍，他们勤劳、贫穷、愚昧……现在看来，这种理性的认识太浮浅、太苍白、太平面化了，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农民比教科书中讲的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每个人都是一部内容各异的活的教科书。

土改工作队的第一项任务是向农民宣讲《土地法大纲》。

第一个宣讲大会在张庄那所二层洋房的顶楼上进行。韩丁、戚云跟随工作队副队长小李早早起来，对会场

作了精心布置。不久，农民们陆续来到会场，男人们围坐成几个圈圈，有的点火抽烟，有的默默地想心思；女人们聚成几堆，各自忙着手里的活计，纳鞋底、捻麻线；做母亲的小心地关照着自已的孩子，这些衣服破烂，满脸肮脏的孩子，光着屁股在人堆里窜来窜去，互相追逐，不会走路的婴儿香甜地吮吸着母亲袒露的、胀满乳汁的乳头，他们还不知道在这里正发生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变革，这变革将要改变他们整个生活和命运。

“农民兄弟姐妹们！”

李副队长以一种话剧演员的动听的语调说。

“两年来，我们边区曾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全区约一千万人口已经彻底翻身，但是还约有两千万人口翻身不彻底，翻了半个身，或者只翻了个空身。”

听到这里，人们都不由得点着头，互相交头接耳。韩丁明显地感到这些农民对小李的演讲发生了共鸣。

“过去的运动出过一些问题。《土地法大纲》就是要纠正这些毛病。”

韩丁听到这里，费解地皱着眉头望了戚云一眼。

戚云对着韩丁的耳朵压低了声音说：“这些问题主要是指前一段土改工作中的革命不彻底，没有真正的贯彻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方针。”

小李提高了嗓门继续说：“《土地法大纲》第一条明确规定，废除封建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讲到这里，整个顶楼本来已经很热烈的情绪，现在更加沸腾起来。

“我讲的你们懂不懂？”小李大声问道。

“我们怎么不懂？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事！”一个老汉呼地站起来，高高举起手里的烟袋。

“再好没有了！”

“我们不怎么懂，但是总感到是好事！”

人们七嘴八舌，越来越分不清在说些什么。

.....

韩丁回到他的住所，天已近傍晚，房间里光线很暗，为了节省灯油，他改变了整理笔记的计划，斜靠在床铺上思考着几天的所见所闻。

自 1945 年秋季开始，内战打了已经近两个年头了。如今，中外的军事分析家，甚至于包括国民党及美国政府的许多人士无不认为国民党是注定要失败了。但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许多西方专家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何以能够击败比他强大得多的对手呢？

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分析，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首先是物质力量的悬殊，国民党拥有八百万正规军，又得到美国的支持，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一支最强大的国防力量，而共产党的军队之少，装备之差，也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奇迹却出现了。

对此，韩丁也曾困惑不解。

现在突然有一种顿开茅塞之感。

根据《土地法大纲》，解放区的村庄首先要分类排队。一类村已经胜利进行了土改，只要稍加调整；二类村分配

土地搞得粗糙一些，要实行抽肥补瘦；三类村虽然搞过平分土地，但还没有进行真正的土改，要重新开展这项工作。

张庄的工作队通过调查分析，认为张庄的土改属于三类，决定重新开展土改工作。

首先是划分阶级，会议开了一个又一个。自报公议，公议就是让大家“咯吵”。

韩丁回忆说：“对这样的‘咯吵’农民非常踊跃，精神饱满，热情很高，会议往往从白天进行到深夜，人们没有一点倦意，我记起了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在他所著的反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实文学《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列宁所说的：革命是亿万群众自己的伟大节日。”

一个多月时间，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张庄的所有农户的成份都划定了，接着是根据成份的确定和《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分配土地和财产。

那是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韩丁和戚云走在张庄村中的大道上，谈论起近几天的工作。

“什么是土地改革的最终目标呢？”戚云自问自答：“就是要解决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问题，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组织他们走进我们的革命的大军。”

韩丁持不同意见：“如果这么说，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太平天国李自成也是这样。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变革，实质上是一次生产关系的革命，根本目的在于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桎梏彻底打碎、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一种新机

制,从而使广大农民的能量真正释放出来。”

三月底,张庄的整党工作开始了。

在北方大学时,韩丁接触过不少共产党员,偶尔也听他们议论过自己的组织生活,来到张庄以后,至今不知道哪些人是共产党员,更不清楚整党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张庄教堂里那所曾作为教会学堂的狭长的房子里,由全村 26 名党员和贫雇农代表团参加的整党动员大会正在举行。

韩丁作为工作队员列席会议。

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开会之后,大家一齐站起来,面对一张大幅毛泽东画像敬礼,接着会场上响起一首雄浑悲壮的歌。韩丁起初感觉那歌曲仿佛是基督教的赞美诗,随着唱了几句,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国际歌》。他左右环顾,见人们虽然很难唱准歌词,也捉不准调子,有些人只能偶尔跟随别人哼几句,但神情都是那样专注、虔诚,当唱到最后那句“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时,突然声音高出了很多,震得窗户纸发出索索的声响。

韩丁置身在这样的气氛中,心被强烈地震动了。一个长久在他心中难解的迷团,突然解开了。中国共产党就是由这样一些土生土长的群众而又不一般的群众组成了自己强有力的队伍,其所以强大就在于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在整个整党期间,韩丁目睹了广大党员是怎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外群众是怎样批评那些有错误的党员和干部,而那些受到批评的党员和干部又是怎样深刻

地解剖自己,有些党员即使受到某些不正确的批评,甚至受到某些委屈和冤枉也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韩丁从他们身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正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4月19日,张庄的整党胜利结束了。韩丁准备随工作队前往潞城开会。在这之前,他回到了北方大学所在地高庄,让裁缝量了夏季衣服的尺寸,领取了当月的小米津贴,当时规定每月除口粮外,有折合八斤小米的零用钱,韩丁计算了一下相当于50美分,每年两套单衣,一套棉衣。办完这些事以后,他急忙去探望范校长。

校长双手扶着韩丁的肩头,端详了稍许,兴奋地问:“怎么样?密斯特韩,有何感想?”

“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完,乡村一个月胜读十年书。”韩丁高兴地说。

韩丁和校长谈了很久,谈到了土地改革中的政策问题,谈到农民的思想状况,谈到了目前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直到深夜,韩丁才走出校长的办公室。

韩丁回到了教堂自己居住的那间天花板很高的房间时,夜深人静,而他仍然没有一点睡意,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一个月的农村生活,刚刚结束的与校长的谈话汇集在一齐,激荡着他的胸怀。他长期不解的一个问题,革命是什么?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中找到了答案。正如范校长所说的,具有两层含意,一方面是运用武装力量推翻反动的统治和压迫,使全体劳动者获得解放,成为主

人，而更深一层的含意在于对人的改造，把那些曾经不劳而获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人，把那些受小生产意识束缚的小农经营者改造为无产阶级新人，这是一项何等恢宏而浩繁的工程，一项何等艰巨而伟大的事业，韩丁为自己能投身这样的事业而自豪。

四月底，韩丁和戚云去潞城县参加全县工作队队长会议。

从张庄到潞城县要跨越两道山岗，从岗顶东望，巍巍太行像一面雄伟的屏障，又仿佛一幅淡雅的山水画。近处的山坡上，一群群的山羊、绵羊，就像是撒在大地上的雪团，羊倌们手执鞭杆，在空中悠甩着，不时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声响。

韩丁走进县城。到处是一派繁忙景象，参加会议的一百多名干部住在一座庙宇里，韩丁学着干部的模样，把文件包、毛巾和外衣挂在五颜六色的泥菩萨身上。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也是一次干部经验交流会。

各工作队队长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向大会作了各地土改工作的汇报，随后是县委陈书记向大家作报告。他是潞城县 2500 名党员的组织者、领导者，身材修长，面孔微黄，表情总是那样严肃，一副黑边眼镜后边闪动着一对机敏的目光。

陈书记在报告中批评了忽视和脱离中农的倾向，对毛泽东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接着又讲了很多道理，



韩丁认为所讲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唯物主义。

在潞城期间，韩丁参加了党日活动，就是工作队的党员干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北方大学的学员也参加了思想分析会。当人们请韩丁对5个学生谈谈意见时，他善意地批评了一位姓徐的学员，他认为徐同志过于消沉，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报纸或小册子，对集体活动缺乏兴趣。

韩丁说：我认为他犯的是知识分子容易犯的通病，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那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箭拿在手里，只是称赞：“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放的革命家。

戚云听完韩丁的话，高兴地说：密斯特韩，你已经是初通马列了。

会议期间，饭场设在男干部宿舍所在的院落里。厨房里只有一口锅，每顿饭要煮两锅小米粥，做成后，由两个壮劳力用木杠子把锅抬到院子中央，人们自己拿着碗，排着队，依次打饭，厨房里的另一个小锅里有菜，大多是白菜、土豆加点盐。每人盛满一碗热腾腾的小米饭以后，自己往上边盖一勺菜，然后找个地方蹲下来吃。

人们一边吃饭，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韩丁常常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特别是几个活跃的女干部总是打头向韩丁挑衅，那个剪短发、没缠过脚的年轻妇女望着韩丁说：“听说你们美国女人不穿裤子？”

韩丁说：“穿裙子，也有穿牛仔的。”

没等韩丁说完，另一个妇女说：“那大概是为了去茅

房方便。”话没落音，在场的人们哈哈大笑起来。

另外几个妇女也插进话来。

“你们吃饭用筷子吗？”

“你们种什么庄稼？”

“杜鲁门为什么支持老蒋？”

“拖拉机是什么样子？”

对于她们的这些问题，韩丁有时用汉语艰难地回答，有时说不上来，干脆用英语回答，然后由戚云向大家翻译，由于这个额外的“任务”，韩丁往往顾不上吃饭，几乎每次都要到庙里的大钟响了，开会时间已到，才匆匆忙忙把早已凉的饭扒进肚里。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在河北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万多人，解放了石家庄。中共中央决定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把解放区的两所大学即在太行山的北方大学和在五台山的联合大学合并为一所大学，取名华北大学，校址设在河北省正定县一所教会大院里。学校发出通知，所有参加土改工作的学员立刻返校。

4月份，通知下达到潞城县，5月初，在范校长的率领下，全校学员徒步向河北出发了。

驻张庄工作队的几名学员也离开了张庄。按说，韩丁和戚云都应随队北上，韩丁却坚持要继续留下来。

范校长不解地望着他：

“密斯特韩，你有什么想法？”

“张庄的土改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我想继续为他们

做点事，同时，对张庄的农民，我也是刚刚熟悉，我想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

校长沉思了稍许：“那好吧，你可以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土改工作的全过程。”校长破例批准了他的要求。

为了帮助韩丁更好地开展工作，范校长又增派一名英语系的毕业生留下来，她叫谢虹，是一个身材瘦小，轮廓分明，两眼充满热情的年轻姑娘。

韩丁回忆起这段生活说：“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集体。我们工作之余，谈论最多的是革命问题，她们俩个都是那么富有幻想色彩，浪漫精神，对未来充满五彩缤纷的追求，然而他们却都具有一种吃苦精神，奉献精神，我从她们身上吸取了许多教益，这是我在中国最早认识的两位女知识分子，女革命者。

一天早晨，三个衣着破旧闪着乌黑的眼睛，长着长长的辫子的小姑娘冲进了韩丁的房间，拉住韩丁的手就往外跑，她们连推带拉地把韩丁带到村东头去。

“剧团来了！”

在一块开阔的庄稼地里，像突然冒出来似的，出现了一座戏台，那是用草绳和长长的木棍绑在一起，然后铺上木板搭成的。

来演戏的是潞城县剧团。这个剧团由 50 多人组成，大多是翻身不久的穷苦艺人，他们利用农闲时候外出演出。他们的演出不要报酬，只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自觉把革命故事告诉给更多的农民。他们和工作队员一样在

村子里吃派饭，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

夜色降临了，农民从四面八方走向舞台，他们各自带着板凳，马扎。一阵激昂的锣鼓声之后，帷幕轻轻拉开了，整个空场上挤得水泄不通，后边的人膝盖顶着前边的腰，肩膀靠着肩膀，一个个仰着脸注视着舞台，急切地等待演出开始。

中国传统的戏曲舞台是空荡荡的。一个报幕员走上台来，报告了即将演出的剧目：赤叶河。故事是讲王老汉和他的一个贫农邻居，跑到山里开荒，用汗水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可是，地主来了，说这山本来就是他的，逼着王老汉交纳苛捐杂税，王老汉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地主又强奸了他的儿媳，捣毁了他的家园，儿媳愤然自尽，儿子参加了游击队……

韩丁被剧情深深感染了。他发现周围的妇女们已经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他转过身，看到无数张脸上闪着泪光，韩丁的眼睛也不觉模糊起来。

过了很久，韩丁依然难以忘怀那番情景：

夜色漆黑。除了戏台，哪里也见不到一星火光，舞台上，一盏孤零零的煤油灯把微弱的光线投在演员身上和布景上，似乎整个宇宙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个小小的空间上。

在戏台的正中央，一个年青姑娘如泣如诉地唱着歌，她绝望地伸出双手，仰望苍天：“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

这呼声飞过田野，像一阵寒风在大地滚动。

那姑娘自尽了，乐声嘎然而止，台上一片寂静，只有

一阵阵“唧唧”的蝻蝻的叫声打破沉寂。

第二场戏，情调完全变了，3年后，解放军来到了赤叶河，土改运动热火朝天，不久，组织起贫农团，揭露了地主的罪恶，没收了他的财产，王老汉的儿子率领群众斗争了地主。

戏散了，韩丁走在归家的人流里，人们踏着夜色，缓缓地走着，不住地议论着，许多人认为第二场戏带劲，感到不满足的是没有当场处决那个地主。

戚云问韩丁：“你的感觉怎样？”

“我看还是第一场好。因为正是这场戏把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揭示得深刻，才产生了后场戏的高潮，悲剧在人们的感情上形成了共鸣。然而人们并不喜欢看到这些场面，因为那种痛楚太真切了，和人们不久前刚摆脱的现实那样相似。”

6月初的一个早晨，韩丁被一阵吵杂声惊醒，他走到街上，见成群结队的妇女从各个胡同里走出来，向教堂的大院走去。

“今天要召开妇女大会。”

妇女主任胡雪贞站在教堂前的台阶上，挥着手对韩丁说。

韩丁走进会场，妇女们已经坐了一地。胡雪贞大步流星地走上前台，她的后边是戚云和谢虹。

胡雪贞大声喊叫着：“别乱了，别乱了，咱们开会。”说着，她从衣袋里取出一个文件，却并不看一眼，只是用手高高挥舞着。

胡雪贞是韩丁到张庄认识的第一个妇女干部。她个子不高，墩实敏捷，说起话来粗喉咙大嗓门，有人说她一个人曾打跑了一群狼。

会议开始了。

胡雪贞说：“现在革命已经胜利了，妇女应该解放了，可是仍然有人欺压妇女，这样的事我们要管……”

他的话一完，一个年轻妇女站出来控诉自己的丈夫，她外表纤细、柔弱，出众的秀美，一件鲜美的花布上衣虽然有些宽大，但仍然洋溢着她丰满的体态，动人的曲线。她的脸就像雾中的苹果，红润鲜美，有一种孩子般的天真，纯正和娇嫩。韩丁未曾想到，就是这样的女人，曾经历过难以想象的磨难，更没有想到，在斗争会上，表现得竟是那样沉稳，勇敢与坚决。在那一瞬间，她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与她那仅有 17 岁的年龄是那样的不相符合。

韩丁从几个月的生活中了解到，这样的事在张庄是前所未有的，在张庄，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女人敢于这样站在众人面前斥责自己的丈夫和公公。这是开天辟地的创举。

1948 年 6 月，张庄土改基本告一段落。

韩丁跟随工作队的同志一齐到潞城县参加全区土改工作汇报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前段土改工作进行再次评价和调整。

会议期间，地委书记王谦传达了前不久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认为晋绥边区土地改革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同时指出这些成绩是在纠正了严

重的错误之后取得的，尤其是前一段集中表现的“左”的偏向，它的背后是平均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称赞农民关于打土豪分田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制度，但绝不是提倡平均主义。

那次会议进行了很长时间，直到夜色降临。韩丁和张庄工作的队员们坐在他们已经习惯而又很熟悉的瓦砾堆上，讨论王书记的报告。

“现在看来，我们张庄也有平均主义。”队长沉重地说。

“伤害了部分中农，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

韩丁听着人们的议论，时而插几句自己的认识：我认为这不奇怪，任何新生事物都难以求全，人类就是在失败和挫折中走向成功和完美的。

韩丁仰望天空，见一轮明月高悬，片片白云从天际飘然而过，时而把月亮罩上一层轻纱，时而又把一缕缕银光洒在周围的瓦砾上。韩丁不由得产生了种种联想；正如这周围的瓦砾一样，旧社会已经土崩瓦解，而代替它的大厦还只是一张蓝图，只是一个梦幻，要把它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还有很多很难的课题。

韩丁在中国革命极其关键而又复杂的历史时期，在中国新旧两种社会交替的联接线上，置身于革命大潮之中，经历了这一伟大的实践，从而使他对中国，中国革命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是从土改工作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员是为人民办事的，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的事业。



# 革命的洗礼

这时,拿未曾改造的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太行山的冬天，寒冷而漫长。

工作队主持的土改工作会议经常开到深夜，不大的屋子里，前边挂一盏马灯，闪着橘红色的光，空气里弥漫着烟叶子燃发的气息和云雾，为了抵御寒气的袭击，人们相互紧紧地背靠背地坐在一起，这样，每个人发出的热量就可以互相传递而暖和一些。

韩丁每天晚上也是这样和大家紧紧地靠拢着。

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取暖方式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

那是一个寒气袭人的深夜，韩丁回到住所，正准备把记录的笔记再整理一下，突然感到浑身奇痒，脱下衣服发现肩头和脖子上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不久就漫延到腰部，他急忙把衣服翻转过来，凑在灯下仔细一看，“啊！”不禁头皮发麻，原来，那上边，特别是衣服的接缝里爬满了扁平的、正在蠕动的小虫，它们有的白而透明，有的因吮吸了血而变成暗红色。

虱子！

韩丁检查了外衣，又把裤子脱下来，那上边也一样爬满了虱子。

韩丁曾经见过农民捉虱子，他们坐在暖和的阳光下，把衣服脱下来摊在膝盖上，饶有兴致地寻觅那些小动物，追踪到了就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使劲一挤，发出一声轻轻的响声，于是就把那小动物消灭了。韩丁看到过很多次

这样的场面，可是，今天要自己下手了。却没那份勇气，他一想到那些虱子被捕住挤死，溅得到处是血就涌起一阵恶心。后来，他想了一个好办法，把衣服铺在地上，找来一双筷子，把衣服上的虱子夹下来，好像在宴席上夹什么菜似的，韩丁把那些虱子一只只放在一块表面平整的砖头上，然后用另一块砖把它们碾死，他就用这种办法，慢慢把棉衣上的凶恶的敌人消灭了许多。

韩丁捉虱子的场面，被北方大学英文班一个学员撞见了。那个同学哈哈大笑起来，事情很快传扬出去，人们见了韩丁笑着问道：“你从哪里发明的这种新方法，能教教我们吗？”

韩丁感到，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受到血与火的洗礼，第一次真正感到了中国的“革命热”。中国好几代青年人为了追求全民族的解放事业，自觉地深入到社会最底层，深入到民众中，接受这种“革命热”的考验，也正是这种“革命热”使韩丁自觉不自觉地融化到了这个群体之中，使他对周围的环境从不适应到适应，渐渐一切都习惯了：请窜乡走户的剃头匠刮脸，那手巾热腾腾的，却那么脏，不论多少人使用，有砂眼和其它眼病一律使用这条毛巾，从来不曾消毒；每个月能有一次去几十里外的长治城里洗澡的机会，而那澡塘的水池里，像煮饺子一样泡满了人，水上漂浮上一层浮垢，人们就在澡塘的房间里小便，吐痰；这里的茅房深不见底，里边积下了多年的粪便，散发着强烈的令人窒息的恶臭……

尤其是吃派饭，对韩丁来说是艰难的考验。他印像极

深的是第一次走进农民家吃饭。那是甄忠喜家，从阳光灿烂的外面，一迈进那个门坎，只觉得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定了定神，才渐渐恢复了视觉，那是一间隔成两半的破屋，墙壁被烟熏成了炭黑色，火台、灶具，桌凳边几乎都是烟黑色，一间堆放着农具，几只鸡正卧在农具上，地上拉满了鸡粪，一家六口挤在隔壁的另一半屋里，那里乱七八糟，到处是麦秸，破砖烂瓦和碎布片，一条土炕上躺着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盖着一条满是灰尘、四处露着棉絮的被子，从那被子下面伸出两只干瘦如柴的双脚。那女孩不住地咳嗽，吐血。她害的是结核病，已经一年了，眼看离死亡已经不远。家里的其他人都照样挨着她睡觉，在一起吃饭，合用一切用具。

韩丁只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恶臭扑鼻而来，那是地上散发出的童尿的臊气和鸡粪的气味，燃烧麦秸的余烬腾起的气息以及那女孩从溃烂的肺里呼出的病败气味的混合体。

甄忠喜的老婆是个三十多岁，瘦弱、憔悴的女人，满脸皱纹，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用一双满是污垢的双手端过来一碗半凉不热的煮疙瘩，那碗的边沿上满是豁牙，还沾着不知什么时候留下的旧饭。忠喜老婆放下碗，转身拿了双筷子，先是放在自己那油黑发亮的大襟上抹了两下，然后恭恭敬敬地横放在韩丁面前的饭碗上。

屋里实在没有一个坐的地方。韩丁只好坐在炕沿上，那个奄奄一息的女孩身边。

韩丁知道，在那碗筷上面，在他所呼吸的空气里，不

知充满了多少结核病菌。可是，他见戚云对这一切毫不在意，她一边香甜地吃着疙瘩，一边和忠喜老婆聊天。

“你娘家是哪村的？”

“忠喜娶你时要了多少彩礼？”

“村里开会你去参加吗……”

戚云的举动鼓舞了韩丁，再说也确实饿了，肚子里直打鼓，韩丁强作不在意地端起了碗。

从忠喜家出来，戚云望着韩丁说：

“你过了重要的一关。”

韩丁摇摇头：“我认为这太困难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村里组织一下开展讲究卫生活动，无论如何，我们不当视而不见。”

戚云却不以为然：“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革命就像一座大熔炉，只有在这里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韩丁不能完全接受这样的理论，但是他也确实不能不为戚云的精神所敬慕。他不由自主地，第一次认真地打量面前的这个姑娘。

她衣着和发型都不太讲究，较多严肃的面容上时而泛起妩媚的笑意，一身宽大的棉袄遮住了大半身。她热情，泼辣，却又不失女性的魅力。

关于戚云，韩丁多次想了解她的身世，她却总是讲得很少。

韩丁只知道，她本来不叫这个名字，来自沿海一座大都市，她在那里念完了大学，先是到延安，抗战胜利后，她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主动申请奔赴前线，她曾在马歇尔主持的军调小组担任翻译工作，后来又转到北方大学。

韩丁在后来的生活中了解到，像戚云这样的青年在革命队伍中有很多。他们大多在以前有过一段优越舒适的生活，甚至有过极其珍贵的爱情，但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向往，对未来的追求，舍弃了一切，投奔到革命队伍中去，接受这样艰苦环境的考验。

韩丁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他和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人们也像对待自己人一样对待他。走在路上，人们远远地向他打招呼：“密斯特韩”。

韩丁住在教堂后面，原来神父住的一间房子里，他常邀请人们到房间里聊天，老乡们也像回自己家一样，从他那里出出进进。

后来，人们送了他个“孩子王”的外号。这是因为，他总爱和娃娃们在屋里闹着玩。他帮助孩子们修石板，他用罐头盒剪成狭长的条，用这些条条箍在石板的木框角上，使石板不再开裂。当然，这项技术活难度并不大，关键是罐头盒，在这样的农村要找这东西，仿佛找一块肥沃的河滩地一样。韩丁带在身边的罐头盒还是在联合国救济总署领到配给食品后吃剩下的。孩子们把韩丁看成一个伟人，有了什么问题总爱向他请教。

“美国在什么地方？”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要漂洋过海。”韩丁总是兴致勃

勃地回答孩子们的问题。

“轮船是什么样子？”

“火车吃什么东西？”

韩丁听着孩子们的天真幼稚的问话，忍不住哈哈大笑。

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忙季节。韩丁、戚云和谢虹晚上参加工作队的会议，白天帮助农民种地。

早晨，太阳还没出山，寂静安谧的空气里传来了车轱辘的声响，接着是一只又一只公鸡争相啼鸣，构成了此起彼伏的交响曲。

韩丁摸黑穿好衣服，摸索着走出房门，慢慢向大街走去，很快就赶上了那辆铁轱辘车。

朦胧中，传来车把式的声音：

“是韩同志吧，上车吧。”

韩丁一跃身，坐上了与车把式相对的另一根车辕，背靠在身后的粪桶上。又往前走了一阵，停在了王老太的茅房前。

车把式掀开车上粪桶那沉重的盖子，操起一把杆子很长的小型粪桶走进了茅房，韩丁跟在他的身后，把一桶人粪尿从很深的茅坑里提起来倒进车上的大桶里。

一个多小时，当红日东升时，车上的粪桶已经装满了。

村子里渐渐出现了忙碌：女人喊叫孩子的声音，男人吆喝牲口的动静，猪和狗在大街上窜动，一扇扇院门随着“吱呀”，“吱呀”的声响慢慢开启，井台上响起了搅水轱辘

的缓慢而低沉的转动声……

车把式把粪桶收拾停当，自己坐在了车辕上，又招呼韩丁坐好，接着甩了一下牛鞭，大车缓缓移动了，韩丁听到那粪桶里的稀物在不停地咣当，感觉到不断有东西溅出来落在背上，他强忍着不安，坐在车辕上，两条长长的腿拖在地上，发出呼啦啦的声响。

迎着早晨清凉的风，他们来到了王老太的地头，车把式打开粪桶，一掀车辕，桶里的稀粪便一下子倒入了地头特意挖好的粪坑里。韩丁和早已在地头等待的几个农民用小桶把粪一下一下地往地里浇。另外有人用锄头扒起土把粪盖上。

人们就这样一声不响地一连干了好几个小时。韩丁个子大，腿长，往往把别人甩在后边，几个农民不服气，拼命地追赶，累得呼呼喘气。

日头正南，王老太来了，她一手提着一个瓦罐。她招呼大家来到田头，打开瓦罐，一个里边是米汤，一个里边是玉米饼子，还有一些土豆丝，萝卜条。韩丁确实饿了，也像大家一样，用刚刚放下粪桶的手抓起饼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随后，捧起碗里的米汤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地喝了一阵子。

王老太来到韩丁身边，悄悄塞给他两颗鸡蛋，不料这个动作让戚云看在眼里，她几步跑过来，笑着喊着：“好吧，王老太有偏心！”

王老太拍着手说：“可不能这么说，你们看他这个子比你们高一大截，光吃那点稀饭能行吗？”



其实王老太也着实喜欢韩丁，每当有点新鲜吃的，总要给他留点，她常说：“人家孩子千里遥远地来咱这里，多不容易，可不能让人家孩子受了委屈。”

戚云逗韩丁说：“我看，你给王老太当儿子满合适。”

韩丁一本正经地接过话来：“她就是我的中国妈妈。”说着，一伸腰躺在了地上。他闻到了衣服和每个孔都散发着难以忍受的臭气，然而他顾不上这些，困倦渐渐涌上来，蒙胧之中，感到山那么低，天那么蓝……，迷迷糊糊中，韩丁又听到了那铁轱辘车由远而近的滚动声，车把式把又一车粪送来了，韩丁从地上爬起来，继续那种重复的劳作，一直到太阳偏西。

傍晚，踏着夜色人们往家走。韩丁感到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然而他看到归家的人流中，那些老人和妇女都若无其事，有的还哼几句“上党落子”。那是一种粗犷豪放，富有民间气息的调子，韩丁不由得也跟着人们学唱起来，惹得戚云笑个不停。

回到村里，韩丁顾不得脱衣服，就一头倒在了自己的土炕上睡着了，一觉睡到又一个新的拂晓。

我曾经问起韩丁，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使他面对如此的艰苦与困顿而无愿无悔。他深深感慨地说：“一是信念，我坚信这样的事业是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是前景光辉的事业；二是情感，实践使我与中国人民结下了血肉相关的内在关系……”

那是韩丁在工作队开会回来的一个深夜，他刚刚入睡。

突然，一阵骚乱声把他惊醒，夜色里传来狂歌、乱叫和吵闹声，那是从隔壁传来的，韩丁渐渐分辨出那是个人在吼叫，仿佛一个醉鬼，无休止的吵闹使韩丁无法入睡，他几次抑制自己，不去过问，用被子蒙住头，但还是忍耐不住了，他气愤地翻身下床，急匆匆地走出房门，对着隔壁的房门喊道：

“别人要睡觉，请你安静一些。”

那边根本不理睬他的话，而是用英语：“进来，进来，你敢进来！”

韩丁大步流星地走过去，一把推开门。屋里漆黑一团，只有那透过窗户的月光，使韩丁分辨出面前的景像。在靠墙的铺板上正坐着一个年轻的学员，只穿一条短裤和衬衣，见韩丁进来，他一下冲上来喊道：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不愿听就把门关上，有什么权力管教我！”

韩丁竭尽全力抑制住自己不要发怒：“你在影响别人休息，这不道德！”韩丁说完之后，正转身往回走，突然听到那人小声嘟囔了一句：

“美国警察来这里逞凶，快滚出去！”

韩丁再也无法忍耐，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一阵热血直往头上涌，他一步跨上去，猛抬手，“啪”地一个耳光打在了那青年的脸上。

韩丁什么样的苦都能吃，就是承受不了这样的侮辱，

因为他历来认为自己是一个清清白白的美国人，而他之所以远涉重洋来到这个偏远的山村，正是因为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又怎么能和美国警察相比呢！一种屈辱，一种被误解使他难以平静。

韩丁迫不及待地向那青年表白自己。然而，那青年依然在喊叫“美国佬滚出去！滚出去！”

韩丁无奈地向外边走去。

那青年又喊道：“美国佬！你回来！你有种就回来，如果你不是我的敌人就回来。”

韩丁渐渐感觉不对劲，终于明白了，这青年一定是患了神经病。当韩丁回到自己屋里时，那青年又追了过来，撕拽着韩丁的衣襟说：

“我们曾见过面，曾坐在一辆卡车上，我要和你做朋友。”

他说着伸过手来，韩丁握住那手，感到像冰一样凉。

他双眼紧紧地盯着韩丁：“你想家吗？我想回河北，进医学院……”他语无伦次。

韩丁费了很大劲劝说着把那青年送回了他自己的房间。返回来重新躺在床上，心里有一种隐隐的自责，对一个患病的朋友，自己干了什么？太不应该了。他想去补救一下，可又没有办法，他听到隔壁一夜没有安宁下来，那青年一直自言自语地不停。

第二天，去潞城县开工作队会议。韩丁向戚云讲了晚上发生的事。戚云告诉他，那青年是清华大学，即国立工科大学的学生，他没有真正懂得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来到了解放区，在学习会上，他拒绝正视地主阶级出身，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在土改工作队里，他因为骄傲自大受到了批评，他失望、孤独、精神渐渐垮了。

阳光明媚，春风习习，大田里覆盖着翡翠一样的冬小麦。路边的白杨树上新叶发出哗啦啦的声响，田里有不少农民正在忙碌。

韩丁走在路上，似乎对这早春的景致没有一点兴趣，他心里还在想着那个学员的事，越想越觉得沮丧。他甚至想到是不是伙伴们对这青年太苛刻了。

戚云发现了韩丁的伤感，有意识地向韩丁谈起这次即将召开的会议，把话题转到了工作上。然而，效果总是不好。韩丁依然心不在焉。

韩丁想了很多。几个月的实践中他了解到，在这支革命队伍里，像那位学员一样出身的有很多，他们背离了自己的阶级出身，自觉与过去决裂，坚定地站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一边，甚至有的人自己的家庭已经或即将遭到革命的洗礼，然而，他们依然选择革命道路，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

从这位神经病患者的身上，可以看出这种考验是严峻的。韩丁也曾不止一次地看到那些知识分子在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吃不下饭，但是，他们大多终于战胜了自我，走向了新生，韩丁也曾看到了他们解脱之后的欢快。

韩丁从这些人的身上，进一步体会到革命在中国的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大众中的号召力。

1948年8月底，韩丁要离开张庄了。

和6个月以前相比，这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划分了成份，农民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大会，群众对革命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这一天，晴空万里，朝阳似火，韩丁最后环顾了一周住了半年的房间，背起行李走出了大门。突然，一阵喧嚣的热浪迎面扑来，那么多人前来送行。

高个子裴兴发带着村领导人所具有的镇定和自信，他后边有郭真宽，剃光的头上包着新毛巾，张存喜笑哈哈地咧着嘴，胡雪贞、仙娥等一些妇女手里拿着针线活，远远地向韩丁招手，工作队的干部陪着韩丁走出了大门，很快融进了人流。

韩丁沿着村中的大道向东走去，每到一个院落，他都要走进去，向乡亲们一一告别，送行的人流越来越长，王老太像踩高跷似的，精神抖擞地赶上来，一把拉住韩丁的手。

“好孩子，俺们张庄的百姓忘不了你。有空一定再来看俺们。”

一些孩子们涌了上来，团团围住韩丁：“叔叔！叔叔！什么时候再回来！”

一个孩子猛地一窜，伸手抓住韩丁的手，于是，其他孩子也一个个伸出手抓住他的指头，有的干脆跳起来，搂住他的脖子，欢呼着，跳跃着。

在人们的簇拥下，韩丁渐渐走出了村子，走上了田间小道，大田里正在忙活的乡亲们，远远地向他招手致意。

有几个拼命地向他跑过来，围着韩丁说长道短，惜别之情依依难离。

工作队的同志们一直把韩丁送到村外很远的地方，是戚云劝住了他们的脚步，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注视着韩丁、戚云和谢虹，戚云的眼泪慢慢流了下来，韩丁也不觉鼻子一酸，最后还是果断地转过了身。

离开张庄，韩丁他们先是到了长治，上级组织安排他们作短期休整。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赖若愚书记。他是“基点村”的总领导人，他的总部设在冶陶，那是一个盛产花椒的地方。

赖若愚给他们谈了很多道理，对前一段工作进行了概括，他说：“尽管我们前段工作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但是，那仅仅是黄河水上的小小涟漪，而我们伟大的功勋在于，封建主义在太行山区彻底垮台了。”

韩丁感到赖若愚同志讲得非常深刻。他清楚地记得，1947年，以没收地主富农财产为主要内容的清算运动时，许多人担心反复，一些贫农担心分到手的财产会不会交回去，一些干部担心《五四指示》得到的果实可能丧失，而现在，经过土地改革、整党、建立新政权，一切都不用担心了，一切都有了新的基础。

夜幕降临了，韩丁和戚云走在长治街头，沿着灯光通明的大道漫步。

戚云向韩丁提出一个问题：“通过土改，农民从被压迫被剥削者变成了土地的主人，我们把这个变化叫翻身，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翻身呢？”

韩丁沉思了稍许：

“我认为土改只是搬掉了阻碍生产发展的一块绊脚石，而潜在的生产力的发掘还有待于努力。土改使农业生产者之间达到基本平等，但这只能给生产者提供选择道路的机遇：是土地个体经营走向资本主义，还是土地集中经营走向社会主义，在两者之间仍需做出新的选择。”

韩丁停顿了一下，接着很坚定地说：“我认为中国应当选择后者。”

几天以后，韩丁和戚云，谢虹结伴离开长治；他们将从潞城翻越太行山，经黎城县，涉县，武安县到邢台。

正是山菊花盛开的季节，满山遍野金灿灿，香喷喷。太阳刚刚出山，玫瑰色的晨曦把东方的群山涂抹得分外迷人，山峦仿佛一副美丽的水彩画。

韩丁背着一个几十公斤重的行囊走在最前边，后边紧随着戚云、谢虹，这个三人组成的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有好一段时间，谁也不说话，只听到脚下发出的沙沙的脚步声。

突然，韩丁站住了，高声对戚云说：“我想起了一首诗。”他沉吟了一会，放慢脚步，用英文诵起了英国诗人豪斯曼的诗句：

逝去了，黑暗的车轮滚滚向西，  
灿烂啊，东方升起光明的旗，  
幽灵、恶煞，还有那骑狗的魔神，  
都没入了金色的晨曦……

戚云、谢虹不约而同地举起双手，齐声吟道：  
向着太阳  
向着胜利，  
曙光就在面前！



# 为新中国奠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的方面，在多才多艺和技能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段辉煌的年代。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最紧迫的是为这一切塑造新型的人才,从根本上奠定新中国建设的基石。

1948年秋天,韩丁回到华北大学,继续担任英语教师。

关于这段生活,他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11月,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郊外横跨一条河流的废铁路上,我从叶剑英将军的司令部里走出来,坐在轨道的小桥头上休息,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英文版的毛泽东的作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本书是一位朋友刚刚送给我的。

几个小时以后,太阳落到太行山下,我发现自己还坐在同一个地方,看得像着了迷似的,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书上闪耀的字字句句使我越看越激动。尽管夕阳西下,暮色降临,但是由于我心潮澎湃,急切追求光明,整个世界好像越来越明亮了。我所体验到的思想和感情的奔放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的话是那样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规律和本质。

记得在11月间,国民党的一支骑兵突然从北平南下。如果不加以阻挡的话,可能在一、二天内踏平我们的校园。一天下午,我接到通知后三个小时,整个学校就悄悄地搬走了。

当我们在黑暗中急速南下时，在朦胧中有一支人民武装插过。他们以一系列纵队向相反方向走去。我们数千人、数万人通宵寂静地行军。忽然传出话来说国民党的部队逃跑了。他们为了保命向北疾驰。

这是一次典型的反围剿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这本书里，毛泽东把如此精深的军事理论叙述得连儿童都能理解。在我阅读这篇文章时，我终于对已发生的事情有了更深的理解：敌人的骑兵迅速南下，人民解放军后撤等待时机，没有自卫能力的单位，如学校、医院，迅速地撤到离敌很远的安全地区之后，人民武装突然像汹涌的潮水一样涌现出来，在毛泽东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一场坚决的歼灭战。这样，国民党军队的骑兵夹着尾巴逃跑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围剿、反围剿，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运动规律，敌人逐渐削弱，人民力量逐渐壮大，然后，壮丽的一天必然来到，整个力量发生变化，量变引起质变，运动战代替游击战，包围城市，解放城市，最后在全国取得胜利。

毫无疑问，这是真理。我曾亲身经历过一些具体现实，感到困惑、矛盾。毛泽东把零星的具体的现实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仅说明过去和现在，而且也说明将来。

当我最后读完这本书，重新踏上回家的路途时，我似乎没有花多大劲就轻轻地穿过了高粱地。我走过六英里就象只走了几百米似的。”

转眼之间到了1949年初春，然而严寒迟迟不愿离去，呼啸的北风扑打着冀中大地，原野上的残雪在淡淡的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

华北大学的校园里却涌动着激昂的热潮。前线不断传来好消息，国民党反动统治像波涛汹涌中飘摇欲坠的孤舟，亿万人民由于期待与向往沉浸在热切的情绪之中。学员们传递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捷报，宿舍和饭厅里，学员们热烈地交谈、争论……

“济南解放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

报告济南解放的新闻说，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机场缴获了几千桶汽油。这一情况，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很平常，并没有引起注意，然而却引起了韩丁的兴趣。长期以来，他一直惦记着在冀南开荒的那批拖拉机，因为缺少燃料，它们被封存在一些窑洞里。

“现在有了汽油，何不把这些拖拉机开出来！”他兴奋得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他向上级递送了一个关于在冀南开办拖拉机手培训班的计划。

不久，上级批准了他的请示。一月底，韩丁到达冀县与衡水之间的冀衡农场。

韩丁带领70多名新招收的来自各地的拖拉机手，把一台台拖拉机擦洗干净，修整齐备，一溜烟地开进了辽阔的原野，轰鸣的马达震荡着沉寂的大地，仿佛一个中队的轰炸机掠过头顶。

拖拉机的后边是犁头翻起的新土，散发着土壤的清

香。

春耕全面铺开了，困难也越来越多。拖拉机手大多是工人、农民或学生，经过短时间的训练，虽然能把拖拉机开动，但对拖拉机的构造、原理、维修技术一窍不通。韩丁一边给他们讲课，一边实地指导，他称之为“从实践出发”。

韩丁常常坐在耕过的地头，不停地环视四周奔波的拖拉机。他从拖拉机的轰鸣声中能判定哪台机器要出了毛病，他会立即让拖拉机手停下来，一边检查维修，一边讲给他们听。

他这一手叫人佩服，场长常民逢人就说“老韩真绝！”

韩丁就这样，在这里带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拖拉机手。

另一个难题就是配件和燃料短缺。拖拉机风扇传动带坏了，尝试着缝了多次都没成功，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不久，又一台拖拉机的油泵出了毛病，怎么办呢？韩丁苦苦思索，最后决定拆开了一台拖拉机，取出零件供维修别的拖拉机使用。这无疑是杀鸡取卵的办法，韩丁为此长途跋涉到北京寻找配件。

在天坛的北墙根，韩丁发现了一个不小的机械零件市场，长长的一条街，足有二里路，韩丁一个摊点、一个摊点地端详，仔细地寻找。在一对老夫妇的摊点前，他眼前忽然一亮，发现了一件福特拖拉机连接管。毫无疑问，那准是几年前从联合国救济总署支援绥远的物资中遗留下来的。韩丁担心老夫妇要高价，于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拿起那些管子，但是店主还是察觉出了韩丁抑制不住的

激动，于是狮子大张口，漫天要价。韩丁真想买下这管子，可是钱不够，于是他和老夫妇讨价还价，用一个多小时，终于以店主开价的一半成交。

韩丁从北京又赶到天津，那里也有一个出售机械配件的市场。这是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街，韩丁顾不得吃饭，一边啃着冷馒头一边看市场，足足两天，选购了一大堆配件。

一个晴朗的下午，韩丁像往常一样守候在田间，指挥着奔忙的拖拉机。场长踩着刚刚犁过的田野，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了过来，他从犁过的地上抓起一把土，看了看，兴奋地抛向天空，高声说：“韩，没想到春耕进行得这么顺利。”

韩丁说：“这就是新制度加上机械化的作用。”

“是啊！”场长感慨地望着原野。

韩丁举目远眺，拖拉机犁起的田畴，在晚霞里仿佛金色的波涛。太阳在慢慢地向天边坠落，一种对生活深沉的眷恋之情涌上心头。

他望着场长说：“你认为我们仅仅是在耕耘土地吗？我想不是，像这样的拖拉机耕作，在中国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但是，作为掌握了中国农业命运的一代新人驾驶着拖拉机耕作，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一页新的历史篇章，我们很难估量它的价值，这些拖拉机手将作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火种燃遍全中国。”

2月初，油料告急。韩丁连夜赶往永平，听说那里有二十桶汽油，结果扑了空。韩丁日夜兼程又赶往邯郸，千方

百计带回了十二桶汽油。

回来的路上，传来了北平解放的消息，整个冀县立即沸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鞭炮声、锣鼓声，欢声笑语震荡着全城，韩丁带领拖拉机手驾驶着拖拉机列成长队，加入游行队伍进入北平城。

北平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欢腾，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每个人脸上跳跃着喜悦，一队队儿童高唱着胜利之歌。

北平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末日的来临，标志着二十多年的战火烽烟行将平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将成为历史，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就要诞生。

韩丁经常因公进北平，每次都有一個新感觉。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个解放前动荡不安、死气沉沉的古老城市已经焕发了青春，到处都是宁谧、舒畅和生气勃勃的新景象。以前鱼肉百姓、殴打示威学生的国民党警察，已由态度随和、热心服务的人民警察所代替，他们身上不再配备枪支和木棍，只拿着扬声器提醒人们过路要小心，井井有条地指挥着交通。自义和团起义失败后便被帝国主义者占领的东交民巷外国领事馆区，已重新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那里再也见不到外国士兵架起铁丝网和机关枪恫吓中国人民，只有威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里巡逻。在春天和煦的阳光下，王府井大街上到处是欢腾的人群，小汽车和卡车穿流不息，城楼上红旗招展，公园里到处欢歌笑语……北京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

1949年秋天,韩丁所在的拖拉机训练班由冀衡农场迁往北京郊区的双桥农场。这便是中国农业机械化大学的前身,北京农业机械厂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这个农场原来是日本侵略者的一个雷达站,一片荒芜,破烂不堪。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韩丁和大伙一起平整道路,修理房屋,配备炊用、床铺以及笔墨纸张,短短几天时间,双桥农场旧貌变新颜。

训练班向全国各地已经办起的农场发出了通知,要求拖拉机手在上冻前赶来培训。

不久,新的面孔出现了:察哈尔的拖拉机手戴着狐皮帽,穿着羊皮大衣,个个像猎人;黄河边上来的拖拉机手炫耀他们今年的收成如何如何好;唐山来的拖拉机手个个戴着前进帽,精神超人……总共二百多学员。

开初一周是理论课,韩丁讲机械原理,传动结构,接着是实际操作训练。几十台拖拉机边培训学员边耕种,十二小时倒一班,人换机不停,短短几天耕种了一万亩冬小麦,新开垦一万亩荒地。与此同时,学员们也取得了好成果。他们不仅掌握了驾驶技术,而且学会了维修。他们尽管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阅历,但是共同的目标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学校的墙上写着大幅标语:“我们是新中国的拓荒者。”拖拉机手成为他们共同骄傲的称号。

一位从长江流域来的机械师对韩丁说:“旧社会,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双桥几个月,我变了,我开始感觉到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技术水



平,而是关心国家的命运,献身祖国的事业。”

在毕业典礼那天,大家都穿上了新发的制服,蓝色的背带裤、蓝色夹克衫,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

场长容光焕发,他紧紧搂着韩丁的肩膀走上讲台,拉着韩丁的手高高举起,大声说:“同志们,你们从今天起,就成为新中国一名拖拉机手了,这应当感谢谁?”

“感谢韩同志!”台下异口同声地呼喊,接着全场爆发出激昂的歌声《我们工人有力量》,随后又是一支《团结就是力量》……

歌声像浪潮一样滚过大地,直到午夜才沉寂下来。韩丁久久不能平静,他漫步在农场的大院里,一个记忆中的场景突然映现在面前。那是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日子里,波德·潘,一位中国国民党官员潘主任曾不止一次地对韩丁说:“共产党绝对搞不了农业,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懂农业。”

韩丁持不同意见:“你不认为一旦共产党执掌了政权,技术人员就会成为新社会的一员,他们的劳动就具有了新的性质吗?”

“多可笑的想法!”潘不屑一顾地说。

想到这里,韩丁不觉一阵欣慰。现在,共产党不仅把大批农业技术人员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之中,而且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农机队伍,这是多么不平凡的创举啊!

# 十年磨一书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

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  
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

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  
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

当初，韩丁和戚云、谢虹从长治到邢台，一千多里的长途跋涉，历经半个多月。

一路上，韩丁别的都不怕，唯一担心的是他的行囊，那里装的是他在长治采写的几十公斤重的文字资料，是他半年多的心血，是他亲身经历了一个伟大时代变迁的纪实，是他的一份无价之宝。

在那段日子里，无论是在路边小店，还是露宿荒野，韩丁总是把行囊枕在脑袋下，他乐呵呵地对戚云说：“要想夺走我的资料，除非夺走我的脑袋。”

国民党的空袭来了，炸弹就在他的身边爆炸，韩丁顾不得个人安危，一翻身扑在行囊上，仿佛一个母亲保护自己的儿女，就这样，他冒着千难万险，始终把这些资料带在身边。

1953年，韩丁带着这些资料登上了归国的飞机。

游子归乡。韩丁度过了六年的异国生活，如今回来了。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意想不到的厄运。

韩丁一下飞机，就被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所谓安全人员带走了，接着是屈辱的盘问、搜查。在韩丁随身携带的提箱里，他们发现了一张韩丁在中国解放区的照片，以韩丁头戴一顶八角帽为由认定韩丁是共产党；他们又发现了一张1953年中国的年画，上面画的是一个稚气的孩子举着玩具冲锋枪打飞机，以此为由又认定韩丁作反政府宣传，背叛祖国。

就是以这些罪名，他们扣压了韩丁所带的全部文字资料。

韩丁急得像发疯了似地向他们辩解，向他们申诉，然而没有人听，没有人理会。接着是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传讯、调查，试图找出他新的“间谍”罪证。从此，韩丁被列入了受监视者的名单。

韩丁没有屈服，他渐渐认识到，要取回那些资料只有斗争。为此，他开始作反击的准备。

1953年8月，华盛顿国会责成六名官员对韩丁进行公开调查。第一次调查，场所设在一个宽大的会议厅里，六名官员衣冠楚楚，居高临下。美国几家大型新闻机构都应邀到场，电视台、广播电台准备做现场直播。

韩丁静静地坐在下边，仿佛若无其事。其实，他的脑子里正在快速地盘算着，怎样迎接这来势凶猛的攻击。

当四十年后的1994年夏天，记者与韩丁坐在张庄的小院里谈起此情此景时，记者问他：“你当时想些什么？”

韩丁风趣地说：“我想了中国的武松打虎的故事。”

官员发话了：“韩丁，为了对美国的安全负责，我们请你回答问题。”

韩丁从容地耸耸肩，摊开双手说：

“我对美国的安全也很感兴趣。”

“请你回答，在中国期间你从事了哪些有损美国的行为？”

“我去中国是受政府派遣，履行当时政府所下达的援助中国的任务，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有损美国的行为……”

六名官员轮番上场，气势汹汹，咄咄逼人，韩丁不慌不忙，用一件件无可辩驳的事实打乱了对方的阵角。

韩丁的回击，使坐在上边的所有官员心神不安，他们没有想到韩丁会如此难以对付，于是，整个程序发生了动摇，新闻记者不知在什么时候也悄然离去。

第二次提问改在了一个较小的会议厅，官员只来了四名。

第三次提问在一所更小的房子里，只到了一名官员。

官方对韩丁的公开调查就这样草草告一段落。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归还韩丁索要的文字资料，反而通过各种新闻媒介大肆对韩丁进行人身攻击。韩丁因此而找不到工作，甚至无安身之地，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到处奔波寻求工作。

在一家拖拉机修理间，他好说歹说，得到了老板的同情，答应他留下来当修理工。可是，干了没几天，官方把老板叫去训话，韩丁不得不离开修理间。

一家汽车修理行答应韩丁留下来做工。他对汽车修理技术很不熟悉，就一边学一边干。他随身带着一本汽车修理工手册，每当修理过程中遇到难题，就以去厕所为由，钻到一边去查资料，翻书本，然后回来接着干。

韩丁疲于奔命，做过木工，摆过饺子摊。然而，困难压不倒他，恐怖吓不垮他，却激起了他更坚定的信念。他省吃俭用买了一部旧汽车，不顾保安人员的监视跟踪，几乎跑遍了整个美国，每到一处就发表演说，揭露当局扣压他的文字资料，对他实行人身攻击的行径。

韩丁凭着一片赤诚，找到了众多的支持者。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他们同情韩丁的境遇，理解韩丁的追求，纷纷以各种方式声援韩丁的正义斗争。卡梅尔达·欣顿、科利斯·拉蒙德等几百名朋友和热心人士解囊相助，支持韩丁在法庭上的斗争，著名律师米尔顿·费里德曼竭尽全力为他辩护……

经历了长达五年的诉讼，韩丁用心血凝成的关于张庄土改的文字材料终于追回来了。

加工、整理数百万字的材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对于生活尚无着落的韩丁来说，绝非一件易事。研究中国著名古典文学代表作——《红楼梦》时的学者们把曹雪芹当年的穷困潦倒描写为“举家食粥酒常赊”，而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真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然而，谁又能想到，在被称为现代文明的“自由世界”，物质财富过剩的美国，韩丁为了一部著作的完成竟处在同样的困境中呢？他白天在外打工，晚上彻夜伏案笔耕。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那位可敬的卡梅尔达又一次给韩丁以经济资助。纽约的路易·拉宾诺维基金会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远东问题专家、自由撰稿人苏姗·沃伦，是一位同情中国的进步人士，为帮助韩丁尽快成书，她花费大量时间与韩丁一齐讨论，寻找最佳表达方式。

雷州安，这位黑人妇女，在韩丁处于生活艰难，遭受严密监视的情况下，毅然来到韩丁身边，她作为韩丁的妻子，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坦然地

放弃了职业保险、体面的住宅以及娱乐和假日，全身心地服从于韩丁的创作。

1964年，历经六载，数易其稿，长达53万字的著作完成了。

书稿完成了，但此时的中美关系依然十分紧张，很难找到敢于接受书稿的出版商。

1966年，纽约《每月评论》负责人保罗·M·期威和奥·休·伯曼作出接受出版任务的大胆决定，编辑内尔·萨姆采用新的编辑方法对书稿进行了认真修编。由美国兰登书店出版。

关于为何把书名取为《翻身》，韩丁说：

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无数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起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解放和土改意味着站起来了，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农具、牲畜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的地位……总之，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韩丁在《翻身》的序言里写道：“总的来说，我在这部书里试图通过张庄这个缩影，揭示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实质。这场大革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改造了中国，它所迸发出的巨大的政治、社会力量，不断地震撼着中国以至于全世界。

韩丁在《翻身》的结束语里写道：“我当时觉得很明

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很有可能要失败,张庄的经验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贫农很有可能把革命向“左”偏离,以至于走向反面,造成“左”的复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贫农就可能分掉一切东西,连农舍里最后一副碗筷,工厂里最后一个齿轮。没有共产党,贫农就很有可能把同盟者赶到敌人怀抱里去,以至于毁掉涌现出来的富有战斗性的朋友。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才从自发的行动到有指导的行动,从有限的胜利到全面胜利。同时,通过这样的过程,他们把自己从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被动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积极建设者。

据我的理解,这就是“翻身”的实质。

从《翻身》里,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半个世纪前在中国发生的那场伟大变革的过程及其内涵,而且我们也清晰地看到韩丁这位美国朋友,对中国革命深刻的认识、热切的拥护,看到他对中国人民那种血肉相连般的亲密关系,看到了他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人生观。

《翻身》由美国兰登书店纽约分店一出版,便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有的评论家把它比作美国作家约翰·里德为俄国十月革命所吸引,冒着枪林弹雨采写的纪实长篇报告文学《震撼世界的十天》;有人把它称为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革命的巨著。

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翻身》发行 20 万册,先后被翻译成八种文字出版,一度在美国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人



类学、经济学等学科必读书目之一。

1971年，周恩来总理接到韩丁赠送的《翻身》后，高兴地握着韩丁的手说：“太好了，你为中国革命树碑立传，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不久，周总理召集几位翻译工作者到他的办公室，专门布置了对《翻身》的翻译工作，直到总理患病住院期间，还不止一次地询问《翻身》的翻译出版情况。

1980年，《翻身》中文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早在1975年，英国著名剧作家大卫·哈利把这部作品改编为同名话剧，发表在《演出和演员》杂志上，并由他担任导演，把这出话剧搬上了伦敦舞台，受到英国观众的欢迎。

许多评论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出英国戏剧史上从未见过的话剧。

1978年，话剧《翻身》传入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和波士顿演出过三个星期，观众如云，呼声极高。1983年1月27日到2月27日，在纽约百老汇附近的索霍剧院连续上演二十场，场场爆满。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记者陈忆村曾专门采写了通讯《在纽约看话剧“翻身”》，报道了演出情况。

“一场四十年罕见的暴风雪刚刚过后，纽约街头厚厚的积雪正在融化，冬夜，寒气凛冽，我们却怀着兴奋的心情，踏着泥泞的雪水，来到一处剧院，观看反映中国农村土改的话剧《翻身》。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9名演员分别扮演37个

不同的角色。这出长达两小时的话剧是这样开幕的。三五成群的农民在一起讨论，应当由谁来摘取果实，然后是斗争风暴，一个接一个，有错误的过火的行为，也有政策的纠偏，直到迎来新的胜利。

演出结束后，我曾访问了在曼哈顿戏剧俱乐部任职的导演米歇尔·布鲁姆，他谦逊地微笑着说：“哈利改编的剧本，具有政治性，也富有戏剧性，引人入胜。中国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那里所发生的推翻封建制度和结束饥饿的斗争，对多数美国人来说还是一种神秘。演出这个话剧，可以让美国人了解中国发生的这场变革。”

他又说，目前西方剧作家所写剧本多为反映个人琐事，很少涉及政治题材，因此，他有意向美国观众介绍一些政治话剧。

他说，他和演员大多没有去过中国，更不熟悉中国农民，因此，要把中国的事情重现于舞台，是很不容易的，经过五个星期的排练，才搬上舞台。从观众来讲，来自各个方面，有教授、青年学生、职员、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以及爱好哈利作品的人们。他们经常被《翻身》的曲折情节、生动、幽默的对话所吸引，观众始终反应热烈……”

韩丁用了十年的奋斗，向人类奉献出了这部作品，以此向世人报告了在世界东方，在中国亿万人民群众中所进行的伟大事业。

# 圆 梦

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  
——唐·李白《太原早秋》

我们这一次的谈话，竟是从梦说起的。

韩丁说：“中国有句俗话叫苦思成梦，自 1953 年回到美国以后，我最多的梦是重回中国。我怀念中国的山，中国的水，中国的农民，怀念我曾生活过的地方和我熟悉的朋友，怀念那已逝的火热的岁月。”

韩丁曾多次在梦境里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地方。华北平原，太行山、黄河水历历在目，他追逐着，欢笑着，呼唤着：中国，我又回来了！

然而，梦与现实并无必然的联系。

好梦难圆！

为这梦，韩丁曾付出了多少苦思冥想，付出了多少心血。

1955 年，韩丁向美国政府提出到中国旅行的申请。当局护照部拒绝了他的要求。

1958 年，联邦最高法院相继作出两项重大决定，其中之一是国务卿不能因公民的政治信仰和交往拒绝发给护照。指出，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可以到国外旅行。

韩丁依照这样的规定，再次向官方提出去中国旅行的申请。然而，结果还是被拒绝了。

1967 年，在公众舆论的支持下，韩丁以争取个人合法权益为内容，向肯尼迪政府新任国务卿腊斯克多次陈述，护照部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给他和妻子、女儿签发了护照，却在上边加盖了“禁止到中国旅游”的条款。

1968年，韩丁夫妇到英国旅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见到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官员。韩丁清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抓住时机向中国官员倾诉了自己对中国的思念之情，希望能得到支持。

中国官员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临别告诉韩丁，等待请示以后，很快给他答复。

半个多月过去了，韩丁心急如焚，他心里七上八下，是怎么回事呢？是中国不欢迎自己了吗？

他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几亿人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更没有想到，就在他提出要到山西省张庄旧地重访时，这里的农民们正忙于“阶级斗争”。

那是韩丁未曾想到的结果。他接到了中国大使馆的答复：“对不起，这个时候接待很不方便。”

韩丁仿佛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如果说为了重回中国，他与美国当局进行斗争，他从来没有气馁过，没有失望过，那么今天却不同了，一种痛苦，失望的袭击使他无法承受。

“这是为什么？”

韩丁带着疑问，带着痛苦和失望迈着沉重的脚步踏上了回归美国的客机。

然而，越是难圆的梦越要梦。

韩丁重回中国的希冀更为强烈。在那些日子里，他无时不在关注着中国的动向，期盼着新的转机。

本世纪七十年代，冻结二十年的中美关系迎来了一

股徐徐的暖风，毛泽东与尼克松各自用不同的方式思考着同一个问题——解开这个历史的死结。

1970年，10月1日，韩丁从电视新闻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细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十一个生日的这一天，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人群中有一名美国人，一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另一位是他的妻子路易斯·惠勒·斯诺。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美国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显然有一种深刻的内涵。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向另外两位美国朋友发出特别邀请，那就是《中国震撼世界》的作者杰克·贝尔登，他曾于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深入我华北解放区，深入采访，从而写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报告文学《中国震撼世界》，被刘伯承、薄一波称为“了不起的战地记者”。

另一位就是韩丁。

韩丁接到了周总理的邀请，同时也接到了美国政府护照部批准他去中国旅游的通知。

好梦成真。他顾不上向亲朋好友告别，顾不上家中那么多难以放不下的事务，急匆匆踏上了飞往中国的客机。迎着和暖的春风，向着他朝思暮想的地方飞驰。

这是1971年的5月1日，全世界无产阶级自己的节日。

天安门城楼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它曾是几千年封建中国的象征，也曾是皇权无上权威的体现，也是中国历次革命的目击者。

今天的天安门城楼像处在一片红色海洋中的擎天柱。

韩丁作为国际友人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俯瞰广场，见红旗招展，人潮如潮汐似的奔涌，欢声震天，呼声像春雷般滚动。在那一瞬间，韩丁曾被这宏伟的场面震撼了，他突然联想到了土改的日子，面前浮现出那彩绸舞、腰鼓队、八音会……那是中国人民抒发成功，追求真理，向往未来的外在表现，然而，他尚未清楚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一场面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他尚未明白当年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功，许多世纪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凝结的民族 文化，正面临着一场疾风暴雨的考验，他无法想象这种历史的漩涡是怎样飞流而下，又呼啸而去……

就在韩丁望着广场沉思时，一个亲切的声音向他传来。

“您是韩丁吗？”

韩丁注目望去，见一双热情，明亮的目光向他投来。他感到似曾相识，却又一时难以断言，就在他犹豫不决时，那人迈开大步向他走来，随着伸出一双大手紧紧握住他的手。

韩丁一下子醒悟过来：

“周恩来总理！”

韩丁伸开双臂猛然扑上去紧紧拥抱住周总理的肩头。

一别多年，想不到周总理竟有如此的记忆，韩丁心里

久久不能平静。

“韩丁同志，多少年没回来？”

“十七年。”

周总理爽朗地一笑：“欢迎你，你是我们的老朋友，患难之交，欢迎你来中国。”

韩丁紧紧拉住周总理的手说：“我这次来中国有一个心愿，就是到中国普通群众中去走一走，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一看，到那些在艰难困苦中结交的朋友中走访。”

周总理高兴地说：“好，我们是一家人，没有内外之别，向你敞开大门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周总理为此向有关部门下达指示，一定要安排好韩丁的访问活动。

韩丁获得了当时大多数外国人难以得到的方便条件。

他先是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走访。他曾置身于清华园里那潮水般的人群中，听青年学生们慷慨激昂的辩论，也曾目睹了那么多的教授、专家、学者以及党委书记挂上牌子接受批判的场面。也曾在末名湖畔听到人们为中国的前景忧虑而发生的哀叹……后来，韩丁以他在这一段时间采集的素材为内容写出了纪实文学《百日战争》，在这里，他曾引用了哲人费希特的一段话。“我绝不能设想人类的现状会永远一成不变，也绝不能设想这现状就是人类的全部最终目的……只有我把这现状看作是达到更好的状态的手段，看作是向更高级，更完善



的状态的过渡点，这现状才有价值；并不是为了这现状本身，而是为了这现状所准备的更好的事物，我能忍受这现状，重视这现状，甘愿在这现状下尽我一份责任。我的心情不能安于现状，一刻也不能停留于现状，我的整个生命都不可抗拒地奔向那未来更好的事物。”

可以看出韩丁当时对中国现状的一种忧思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他曾漫步在天安门广场，长久地注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下层座基上，镶嵌的那一组连环画似的汉白玉浮雕。从“虎门禁烟”，到“大军渡江”，恰好绕座一周，仿佛聪明的石匠深谙哲学玄机，意味深长地把百年风云凿成了一个神秘的圆圈，只是人们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环视它时，往往看不到这一层。

他却看到了，从金田村呼啸而起的太平天国风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圆圈运动。然而，早在湘军攻陷南京之前，这场农民战争就已被内部的迷信、腐化、分裂注定了命运。代之而起的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否定了农民战争，却也先后葬送在了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只有当历史的螺旋上升，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之后，中国革命才在1949年成功，终于完成了否定之否定。

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神秘的历史圆圈。

仲夏，韩丁带着妻子骑车穿过繁华的闹市，直奔郊区双桥农场。

这里变化太大了，面目全非，甚至使他怀疑这是不是

当年曾工作过的地方。只有那座水泥墙工棚，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满目苍凉地静卧着，勾起了他的许多回忆。他记起了住在他隔壁的场长，一位从事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他记起了那位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机械师……他多么想找这些老朋友叙叙旧啊！可是一打听，大多去了江西五七农场，有一些调往其它地方工作。

旧地重游，感慨万千。他更关心的是这里事业的发展，急于想了解农场的生产情况、管理水平和经济状态。

然而，他所到之处，见人们脚步匆匆，神情严峻，有的在写大字报，有的在贴大标语，有的在开批判会，没有一处研究农场工作的，一台台农机具横七竖八地停放在旷野里，任凭风吹雨打，锈斑累累，农场的大田一片荒芜，野草一人多高。

双桥农场也像当时中国的许多生产部门一样陷入困顿的泥坑。

韩丁和妻子离开农场，他的心沉甸甸的。那段回归的路，仿佛比来时漫长得多，难走得多。韩丁思索一个问题，那是当年参加土改时他就曾和戚云谈论过的问题，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解放生产力，改变人民群众的命运，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这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然而，现在却把这些搞颠倒了，人们把生产视为可有可无的事情，其结果会怎样呢？

大路两旁不时向他们投来许多惊异的目光，他发现其中一个年轻人分外特别，那小伙子穿一身劳动布工作

服，骑着自行车总是不远不近地尾随着，在一个转弯处，小伙子紧赶几步，追上韩丁，急切地呼喊：“韩丁大叔！”

开始，韩丁怀疑自己的耳朵，因为，他无论如何回忆不起曾经见过这年轻人。

小伙子显然由于内心激动，语无伦次，由于冲动，脸涨得通红。过了好一会才平静下来，讲述了韩丁意想不到的事情。

年轻人就是韩丁要寻找的那位拖拉机训练班老主任的儿子。老主任在三个月前已经去世了，生前在他诸多的罪名之中，有一条是“里通外国”，根据就是，在解放初，他曾和一个美国人做过邻居，两人处得火热。

小伙子讲述了这个出乎韩丁意料的故事，流着热泪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写给周总理的信。他说他是从报纸上看到韩丁来中国的消息的，希望韩丁能把这封信送给周总理。

韩丁抚摸着年轻人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小伙子，你放心，我会尽力去办这件事的。”

那天晚上，韩丁久久不能入睡，一种难以解脱的困惑压迫着他。多少年来，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每当从新闻中获悉中国的发展，每当从新闻中获悉中国的成功，那怕是细微的一个进展，都给他带来由衷的高兴和欣慰，他常常以此为自豪和骄傲，他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当他在美国听到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传闻时，开始不相信，后来，越来越不理解，现在使他更困惑了。尤其使他震惊的是，这位主任的遭遇竟和自己有点殊

途同归之感，人类的丑行也有着如此惊人相似之处。

不知不觉两个多月过去了，韩丁此次中国之行就要结束了。

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又一次接见了韩丁一家。

宾主落座，韩丁畅谈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有欢欣鼓舞的观感，也有发自肺腑的直言。

周总理热切地望着韩丁：“我主要想听听你对中国落后方面的看法。”

韩丁心里一沉，一下子竟感到无从谈起。对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韩丁确有自己的看法，可是，面对国家总理，他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来评价这一切。

还是总理打破了沉默，风趣地说：“不行，还是调查研究不深入啊！”接着他就改变旧的习惯势力，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韩丁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周恩来那种“闻过则喜”的坦荡风度鼓舞了我，我感到中国有像他这样的襟怀坦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即使现在或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风雨，中国一定会有希望。

临别时，周恩来亲切地拉住韩丁的女儿韩琼的手说：你是年轻人，是新生力量，我对你抱有希望，年青人朝气蓬勃，是未来的希望，当然，年轻人也不是不犯错误，我犯的错误比你多，可能将来还会犯，犯了不要紧，重要的是面对事实，面对错误……

这一次中国之行，韩丁先后受到周总理五次接见。他

回忆说,周总理对美国社会各界的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善于听别人讲话,善于使谈话保持一种和谐、欢快、轻松,使人无拘无束,好像不是接受大人物的接见,而是和一位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的朋友促膝谈心。

## 张庄——第二故乡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晋·陶渊明《归去来兮》

一辆乳白色的面包车在群山间的柏油路上疾驰。

韩丁透过车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远方。深秋的太阳，满目苍翠，郁郁葱葱。那山峦之中，不时闪过一团团火红，一片片金黄，一缕缕银丝，那是正在盛开的山菊花。尽管韩丁知道这是山路，比不上美国家乡的高速公路那样平坦、宽阔，可以高速奔驰，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催促司机加足马力，开大油门。

与韩丁同行的女儿韩琼深深理解爸爸的心情，拍着爸爸的肩头说：“爸爸，用句中国话说，你现在是归心似箭。”

是啊，重回张庄，这对韩丁来说是件多么不寻常的事，以他本人的心情，这次重回中国，首先访问的就是张庄，第一站就是张庄，可是中国有关方面的同志一再改动他去张庄的时间表，迟迟不作安排。

其实，韩丁不了解，有关方面的同志为他的张庄之行正在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的。

早在一个月前，张庄所在的山西省长治市就接到了北京关于韩丁要来张庄访问的通知。

解放二十多年了，可是，这里山河依旧。生产落后，道路泥泞，房屋破旧，人们依然还在为填饱肚皮犯愁。

可是中国人历来有个人穷志不短，家丑不可外扬，打掉牙往肚里咽的脾气。

上级领导同志来了，从张庄村东走到村西，从大田里

到庄户人家的院落里，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看个够。最后慎重其事地对村干部说：“这样子不行，太寒酸了。韩丁是咱的老朋友，不能让他失望。”

于是，迎接韩丁的准备工作开始了。上级拨去款，突击盖起一座小宾馆，连夜铺设简易公路，粉刷墙壁，打扫卫生，连临街的厕所都粉刷一新……

就这样，上级领导依然不放心，迟迟不给北京回话。

韩丁等得不耐烦，给周总理打电话问情况。周总理听了有关人员的汇报以后，急切地说：“韩丁是我们的老朋友，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套。要马上安排韩丁的张庄之行。”

韩丁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幕幕往事在他脑际浮现。张庄曾留下了他的足迹，留下了他青春的梦，理想的歌，留下他的思考和欢乐。在他的心目中，张庄是第二故乡。

面包车在崇山峻岭中奔驰，韩丁的心跳得越来越剧烈，他真想面对这群山大声喊：我回来了。

其实，张庄的人们也正沉浸在激动人心的等待之中，为韩丁即将到来而欢欣鼓舞。

“韩丁要回来了！”人们争相传送着这个消息。

“韩丁是谁？”年轻人不解地寻问。

“就是老韩，美国大个子，土改时在咱村当过工作队。”老人们言谈之中洋溢着自得与骄傲。

“那是好样的，和咱农民一样睡土炕，吃玉米疙瘩。”

“那天晚上斗地主，半夜三更出发，老韩就跟我后



边，一点也不含糊。”

……

人们七嘴八舌，韩丁的故事在张庄传扬着。于是两千多村民都象等待一个喜庆的日子似地等着韩丁的到来。每天，人们不用安排，自觉地把各自的门庭打扫干净，把一些希罕物件精心地保留起来……

整个张庄沉浸在迎接亲人的喜庆气氛中。

面包车行至长治市，韩丁执意要步行去张庄，人们劝他：“要走20多公里路，还是坐车吧。”

他却说：“我可以一边走一边观看这里的变化。”

他迈开双脚，大步流星，两个多小时的跋涉，走进了张庄。

“老韩来了！”

“老韩！”

一声声热切的呼唤，一双双含着热泪的目光，一张张亲切的面孔，有的相识，有的陌生，但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热烈的激情，韩丁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他用中国传统的礼节，双手抱拳，高高举过头顶兴奋地说：“老乡们，你们好！”说着，心里不由得一热，两眼泛起了泪花。

韩丁顾不得七八个小时长途跋涉之苦，带着妻子和女儿走家串户访问亲人。

多么熟悉的当街大道，这上边曾留下过他深深的足迹；多么熟悉的院落，这里曾留给他无限的欢乐和记忆。他一边走，一边向女儿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长治市政府的领导同志闻讯赶来，告诉韩丁，市政府

为他的到来，在市宾馆安排了住处，准备了午宴。韩丁连连摆手说：“谢谢了，我到了家，应该在家里，应该和张庄的乡亲们在一起。”

午饭，村里为他做了一桌地道的上党家乡菜：酸溜溜的土豆丝，灰子白炒豆腐，黄豆烧肉丝……韩丁一家吃得有滋有味，整个午饭谈笑风生，其乐无穷。

饭后，韩丁急忙去看望他的“中国妈妈”。

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韩丁还没跨进门坎，就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颤颤巍巍地向他走来，韩丁紧迈几步走上去，伸出双手紧紧搀住老人，深情地呼喊：“老妈妈，你好！”

老人家仰起头，紧贴着韩丁的脸望了又望，一汪泪珠从满是皱折的脸颊上滚落下来，她用两只干瘦的手紧紧抓住韩丁的胳膊，断断续续地说：

“你还记得我？”

“记得，我一直挂念着你老人家。”韩丁的声音有些颤动。

老人抹了一把眼角：“好，好啊，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老人家又着实地对韩丁端祥了很久说：“你发福了。”

韩丁笑笑：“我现在 193 斤，太胖了，我的女儿和妻子都批评我。”

不同国籍的一老一少组成的“母子俩”，就这样谈了很久，那话语像山间的溪流，又像田原上的长风一般热烈亲密的气息在老人的院落里荡漾。

第二天一大早，韩丁刚刚起床，六十多岁的王金水老大爷抱着三岁多的小孙子来看老韩。

“叫韩爷爷！”王大爷哄着自己的小孙子。

“韩爷爷——”小孩子拉着长调地喊，乐得韩丁把孩子接过来，紧紧抱在怀里。

一会功夫，屋里屋外挤满了来访的乡亲，一个个争着要请韩丁到家做客，这个说给韩丁做拉面，那个说给韩丁烙饼吃，这下可把韩丁难住了。最后还是村干部出面安排，告诉大家，耐心等待，韩丁还要住好多天，只要有可能会，争取各家都走走。

正在这时，一个中年汉子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高声说：“老韩，老韩。”

韩丁注视着来人，思索了稍许猛然地：“啊，你是发盛。”

“是的，我就是发盛，你还能认出我来。”

韩丁去看望他的母亲，正好他到长治办事去了，今天回来，听说消息，立即赶了来。

韩丁指着发盛说：“当年我在张庄时，你才十来岁，我常把你举到头顶上，直到把你吓得哭着喊着叫大个子叔叔才罢休。”

人们听了，发出一阵笑声。

“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给我们修石板，在我们心里，你是个了不起的大能人。”发盛说。

韩丁在人们的簇拥下来到胡雪贞家。

胡雪贞笑着问韩丁：“老韩，我考考你，知道不知道我

今年多大岁数了。”

韩丁思索了一会儿，断然说：“跟我同岁，51，用中国的属相讲应该是狗。”

胡雪贞高兴地两手一拍：“好记性，真不愧咱张庄的好朋友。”

“我记得你那时很厉害，常为妇女打抱不平，连男人都怕你三分，据说连狼都怕你——”韩丁给大伙讲起了胡雪贞打狼的故事。

一会儿，村幼儿园的小朋友来了。一片“韩爷爷”的呼喊声中，小朋友在当院里给韩丁表演刚刚排练的《欢迎你，韩爷爷》，当节目就要结束时，小朋友们提出“请韩爷爷来个节目好不好？”

韩丁笑哈哈站起来，先给小朋友们鞠了一个躬，然后欢快利落地跳起了美国东部民间舞蹈，和着那舒展欢快的节拍，人们沉浸在乐融融的气氛之中。

在采访中，我曾问起韩丁：

“你先后到过张庄多少次？”

韩丁：“从第一次搞土改计起，十五次了。”

“我感到与张庄有一种至深至厚的情缘。我是从张庄开始认识中国，是从土改运动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从张庄的今天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张庄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我信念的奠基石，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是我与中国友情的联结点。”

韩丁不仅自己珍惜这种友情，而且把它不断传扬发展。1975年，他携全家又一次来到张庄，女儿韩琼在这里

拍摄了反映中国民间文艺的《高跷》等小电影，在美英等国广泛放映，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1987年，韩丁率领由20名专家、学者组成的626美国特别考察团来到张庄，向他们介绍自己的“第二故乡”。在此以后，先后有上百名美、英、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外国朋友来张庄考察。

1994年，韩丁组织并带领美国一批眼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张庄。

……

张庄的人们说：“老韩是俺的常客，是俺的亲戚，也是俺张庄发展生产走向富裕的技术顾问。”

韩丁曾帮助张庄发展小型喷灌和螺旋输送机，曾给张庄带来了美国新培植的蔬菜品种以及播种机、太阳能加热器……

最近几年，韩丁来张庄更频繁了，他为张庄投资兴建了合资企业长弓玛钢有限公司。

1985年，张庄授予韩丁荣誉村民称号。

1987年长治市政府授予韩丁荣誉市民称号。

韩丁幽默地说：我这个市民没有负担，不需要农转非，不吃商品粮……

# 风雨真情

我们之所以珍重这种友情，因为在艰难的跋涉中它曾像一盏明灯，照彻我的灵魂，给我力量和智慧。

——巴金《一颗红心》

我们在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中，关于道德准绳与人际关系常以“金钱至上，残酷无情”而论之。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思维定势——西方无真情，于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盲目者便演绎出一个理论：商品经济必然导致见利忘义，导致人情淡化，良知泯灭。

然而，在我对韩丁作了研究之后，从那众多的故事中，发现了一种特别。

在张庄的那个夜晚，他向我谈起了母亲，当谈到老人最后的人生旅程，谈到了宾夕州老人的墓地时，我清楚地看到他那布满皱折的眼眶里泪如泉涌。

在又一次的交谈中，我们谈起了陈永贵同志。他深沉地说：“作为一个农民，我佩服他改造自然的毅力和勇气，我们虽然只见过一次面，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终生难忘。”

据说，一次路过大寨，韩丁专程登上虎头山，在陈永贵的墓前为他点上一支烟，还学着中国人的样子磕了一个头。

……

韩丁是个极重感情的人。

鲁迅曾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这恐怕不仅只指中国人。

当然，最能体现韩丁这一情操的是他与张庄农民、党支部书记王金红的友情。

韩丁说：“我和金红是同志加兄弟。”

金红说：“韩丁是真正的朋友，我们的友情经历了风雨的考验。”

故事还要从韩丁重回张庄说起。

早在1968年，韩丁的纪实文学《翻身》一出版，就曾了解到张庄现任党支部书记名叫王金红，为此，特意给金红寄了一本，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献给张庄的人民及王金红。”但是始终未曾见过金红，这次来张庄，他的一个心愿就是一一定要和金红谈谈。然而，行期即将结束了，要去的地方大都去了，想见的的朋友大都见了，唯独没见到金红。

韩丁后来终于打听到，金红作为“走资派”正在接受审查。

“金红究竟犯了什么错？”

韩丁逢人便问。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在饭桌上，热炕上。韩丁决心要搞个清楚。

“金红？我说老韩，你总该记得王文斌吧？那是咱张庄有名的厚道人，金红就是他孙子，他比他爷还厚道，还本份。”王老太对韩丁说。

“叫我说，金红什么错也没有，这是没事找事，胡折腾！”

“金红为咱张庄办了那么多的好事，咱做人总不能不讲良心！”

……

人们愤愤不平地向韩丁讲起了王金红的故事。



1942年，也就是金红出生那一年，潞城县闹饥荒，日子实在艰难，父亲靠木匠手艺无法养活那么多子女，咬咬牙把金红送了人，这件事被金红的小姨知道了，这个善良的妇女急急忙忙跑去把金红抢回来说：“这孩子不能给人，再难我也要把他养活大。”从此，她把金红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拉扯，节衣缩食，相依为命。

岁月如梭，1955年，金红考入本县一所完全小学，离家十几里路，开学那天，小姨送他去学校，自行车后边的衣架上是一个简单的铺盖卷和小姨为他借的7斤小米。

为了交学费，年仅12岁的小金红每到星期天就跟着大人一起去拉炭，晚上12点上路，披星戴月赶50多里路到煤矿，拉炭的人多，一排队就是半天，饥肠辘辘，寒风刺骨，装上炭要赶上百里路送到长治，卸了炭回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整整两天的辛劳挣几块钱。

16岁那年，山西省电力建设局招工，王金红当上了起重工，他吃苦肯干，又有股子钻劲，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学会了木工、电工、机工、泥瓦工，业余时间还帮助放电影，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被推选为工会干事兼团支部干部。

就在这个期间，和金红一齐参加工作的姑娘徐水娥与金红产生了爱情，两人一齐出席了包头市青年工人代表大会。

60年代初，那场罕见的自然灾害加上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共和国在艰难中跋涉，为了减轻国家负担，需要部分职工离职返乡，金红主动报名响应党的号召。

“反正得有人回去，咱不回，别人就得回，上级有压缩指标，咱别让领导为难。”金红和水娥商量。

领导和师傅们打心眼里不忍心让他们离去。平时，他们为人热诚忠厚，任劳任怨，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回就回吧，年轻轻地有力气，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师傅们无可奈何。最后，大伙一致商定，帮助这两个年轻人把婚事办了再让他们走。

好一阵子忙活，大家凑份子，买了毛毯、热水瓶、香皂、雪花膏、花脸盘……热热闹闹给他们完了婚。

金红回乡，正遇上村里打井，辘辘把上四条绳，一条绳十几个人拉，一共上了40多号人，几乎全村的壮劳力都上了阵，昼夜倒班干。

“这太笨了！”金红到现场一看，脱口而出。他曾干过起重工，二三十吨的东西，吊车轻轻一抓就起来。

“何不改装个简易吊车？”他自己设计，自己加工，不到半个月，自制的绞车代替了人工，一下子省了20多个人。

人们先是惊异不解：小伙子出去才几年，哪来这么大能耐？继而是佩服：后生可畏。金红一炮打响，村里把打井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带领几个年轻人一年打了两眼井。后来，他又改革了双轮双铧犁、马拉抽水机……王金红成了方圆几十里闻名的技术能手。

金红以自己的汗水和才干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他先是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后来又担任党支部书记，成了张庄的领头人。

打那以后，他带领大伙治山治水，战天斗地，一心想把大家引上一条富裕路……

韩丁听了这一切，再也坐不住了。他没有等村工作组的人批准，直接去找王金红。

推开金红的家门，韩丁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中年汉子，敦敦实实的个子，一双厚实有力的大手，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明快的眼闪烁着憨实与聪慧。韩丁端详了很久，他似乎寻找到了什么似的：“你是金红？”

“是的，我叫王金红。”金红茫然地。

“确实有你爷爷的影子。”韩丁依然抓住金红手不放。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处境呢？”

韩丁开门见山地问金红。

“我想不通，我认为我始终是照毛主席的话做的；可是他们说，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吗？记得自打一解放，咱们党就说要叫农民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不也就是这个意思吗……金红越说越激动，他已经忘记了坐在自己对面的是位美国人。

韩丁专注地听着金红的讲述，不断地点着头：金红，你不要苦恼，这算不了什么，我通过调查了解，认为你干得不错，你被撤职前每个工分值八角钱，你下台后，每个工分只值五角钱，还不能兑现，这不是很好的说明吗？”

金红听了，心里一惊，他未曾想到这个美国人对情况会了解得如此清楚，态度会如此鲜明。然而，阴云依然笼罩着他的面容：“现在庄稼放在地里急需收割，工副业生

产等待整顿，可是，人们成天忙于东奔西跑参加大辩论，搞“革命”，这怎么能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心里不安啊！”

韩丁安慰金红说：“我想这种情况不会长久下去的，你应当有信心。”

韩丁站起身，发现了方桌上摆着的几张农具图纸，不觉一阵惊喜：“这是你画的？”

“是的，总不能坐着白吃饭，利用这个机会，想设计几个小农具。”

韩丁认真地一一审视那些图纸，不时地指出了一些不足，谈了自己的建议，临别握住金红的手说：“好！王，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条件，永不忘为党、为人民做事，我佩服你这种精神。”他思索了稍许接着说：“种地不能光靠两只手，你爱动脑子，这很好，种地需要动脑子，要在机械化上下功夫，这是农业的必由之路。”

韩丁告别了金红，走出院落，已是夕阳西下，一抹火红的晚霞映在两个人的脸上，泛着红扑扑的光芒。

韩丁离开张庄，经省城太原回北京，省城的领导同志会见他时，他说：“长治市张庄有个党支部书记王金红，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是一直不让他工作，太可惜了……”

回到北京，他在很多场合向当时领导同志谈起王金红，为金红鸣不平，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韩丁在北京逗留期间，又专门给金红写了一封长信，

鼓励他不要气馁，要有信心。信的最后附了一首诗：

在你的身上体现了张庄农民的优秀品德，  
几乎把中国人民所具备的品德容装，  
勤劳、倔强  
好奇所从事的一切  
前进，或者徘徊，  
都有远见和创造力，  
热情和胆量，  
是世界上杰出的新人形象  
· 有着自己的信念！  
隔洋的老友，  
将永远做你的同志，  
鼓励人们像他那样吧；  
中国有这样的人民和足以信赖的领导者，  
未来的繁荣，  
绝不可限量。

韩丁和金红就这样在风雨中相识，一见如故，结成了知心朋友。

对于这件事情，大多数人们没有什么特别看法，但也有少数人出于“革命的警觉”，“鲜明的阶级立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觉悟”，对此疑虑重重，个别人还大作文章。

“王金红和韩丁一定有特殊关系，一个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和一个美国人怎么可以谈得那么亲切，投机呢？”

甚至有人提出王金红可能里通外国，因为他爷爷就和那个美国人认识。问题越说越严重。

金红泰然自若，在有人让他交待与韩丁的这次特殊交往时，他说：“韩丁在美国算是贫下中农，土改时曾是张庄的工作队员，我认为无论阶级出生还是个人经历都决定了他属于革命派，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同时，我与韩丁的交谈，没有任何不实之词，我问心无愧……”

1975年，韩丁又一次来中国，他依然把和金红见面当作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为了避开“革命派”的监视，以免引起对金红的麻烦，通过中国有关方面约金红到北京见面。

金红此时已经重新“站出来”主持张庄的工作，他找到老主任赵贵财，商量去北京的事。

“我看这事要思量思量，上次老韩和你见面，给你带来麻烦还少吗？”

老主任出于对金红的爱护，忧心重重。

“不管怎么说，咱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群众的事，谁说也不怕！”金红就是这种倔劲，认准的理，九头牛也拉不住。

“我看这样吧，你陪我一起去北京，你是老贫农，根子硬，将来可以站出来替我做证。”金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金红和老队长一起来到了北京，两个人穿着一种式样的黑色对襟棉袄，宽裆黑棉裤，大头黑棉鞋，头上捂个白毛巾，北京饭店的值班人员望着他们的装束，盘问了个透才放行。

可是临进门出了个笑话，那扇不断旋转的大门搞得老队长眼花缭乱，不小心卡在了那门的格子里。

“看来，咱真是没见过世面！”老队长沮丧地说。

“那是见得少，没什么了不起。”金红不以为然。

说话之间，韩丁远远地挥着手走了过来：“你们可来了，我几乎每天都在这里等你们。”说着，带金红他们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想和你们谈谈张庄农业机械化问题。”

韩丁说：“你们一个劳动力，平均一天生产 8 公斤粮食，而我呢？我一个人经营一千多亩土地，一年只劳动 150 天，产粮 75 万公斤，平均一天生产 5000 公斤。”

对于金红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韩丁接着说：“这决不是因为我有三头六臂，而是走农业机械化道路的结果，在我的农场里，耕种、除草、收割、直到储藏，一系列工序都实现了机械操作，不单是省力，最重要的是提高了劳动效率。”

韩丁边说边打开背包，取出一卷图纸：“这是我在美国设计的一些农机具图纸，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据金红上次谈话中所讲的情况设计的。”

金红惊喜地翻看着那些图纸。

“这是烘干机，是在你设计的基础上改进的。”韩丁指着图纸”

“这是喷灌系统，希望你们能把这项技术搞起来。”

.....

接着，韩丁向金红讲起了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问题，从机械配套，人员培训，田间管理到资金投入，粮食市场，

一直谈到深夜。

王金红回忆这次会见说：“如果说在农业机械化工作中，我为张庄做了一些工作的话，那么，决不可忘记韩丁的心血，我常常想，在张庄第一次见到韩丁时，我对农业机械化只是接受了启蒙，在北京的那个夜晚，我便真正进入了农业机械化的课题研究。”

听了金红的一席话，我不禁产生了一种联想，有人提及韩丁曾经问我，他给中国带来过什么？我想这个问题不应当从单纯的功利观念评价，韩丁带给中国的，带给张庄的物质性的东西，有，但有限，但他带给中国，带给张庄人的“悟”性的东西却无法计量。

张庄人是从什么时候听说机器种地的？恐怕早在土改时期就听说了：“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可是，那时人们追求的目标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对于机器种地还未曾认真去想。

新中国成立不久，共和国的领导者就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的思考。1954年，在杭州召开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程》讨论会上，两种理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从前苏联来看，首先具备了较高程度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从而为向农业集体化过度奠定了基础。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先有机械化，后有集体化；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应该是先有集体化，后有机械化。

中国依照后者的理论走上了合作化、人民公社的道路。土地连片，为机器耕作创造了条件，但是就人们的观念来说，把使用机器像使用电灯一样看待，认为仅仅是一



种享受,按照当时反修防修的理论,必然有滋生修正主义思想的负效应,于是,人们对“机器”的认识依然没有突破。

毛泽东主席研究了中国农业的现状和世界农业的发展走向,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点,全国上下以行政手段和经济措施推行这一战略。然而,作为广大农村,广大农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韩丁的作为就在于他用最实际的方式,最形象的引导,使张庄人感悟这一战略的正确性。

也正是这次北京会见之后,王金红带领张庄人大踏步向农业机械化迈进了。

1977年,金红自己设计制造出张庄第一台谷物烘干机。韩丁来了,一看很高兴,向当时的农机部长项南推荐,项南把这项技术介绍给农机院,农机院请金红参加在山东召开的全国谷物烘干技术座谈会,并安排他在会上发言。

金红说:“我们这台烘干机,有很多东西是韩丁同志教的……”

会场上突然响起一阵笑声。

金红莫名其妙,不知是自己说错了什么。后来一打听,人们说:“你讲的道理不错,只是不该称韩丁为同志。”

金红把眼一瞪,理直气壮地:“那就怪了,老韩从土改就跟着咱共产党一起闹革命,怎么不是同志。”

1978年,王金红在张庄把农业机械化工程推上一个

新阶段，他自行设计制造了挖渠铲刨机，弹簧耙，喷灌机、螺旋提升机……划出 100 亩试验田，由三个人耕种，一年下来，平均每人每天生产 250 公斤粮食，机械化的威力明显地体现出来。

然而，有些问题的难点往往在主观意识上。对此并非看法一致。

有人说：“中国农民这么多，活儿都让机械干了，人干什么？”甚至有人说机器种的粮食不好吃。

就在人们围绕机器种田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韩丁又一次来访。他兴致勃勃地逐项考察了金红的发明，对挖渠铲刨机、喷灌机等存在的缺陷提出了改进意见，并设计出图纸，直接指挥加工，组装，实地实验。

那一个多月，韩丁没明没黑地忙乎！直到临走那天上午，来接他的汽车到了村里，他还在大田里调整喷灌机。

这一次告别张庄，韩丁特意动员金红陪他一起到了大寨，目的是要见陈永贵，希望这位当时在中国政坛有一席之地的农民能对张庄的机械化工作给予支持。

陈永贵热情地接待韩丁和金红，陪他们上了虎头山。

韩丁望着那气度恢宏的梯田，赞不绝口：“老陈，大寨名不虚传，在世界农业史上，恐怕也是一个奇迹。”他思索着：“不过你考虑过没有，如何走机械化道路？”

陈永贵沉吟了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讲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是真理，我们大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作为大寨来讲，最根本的是艰苦奋斗精神。”

韩丁谈起了张庄，介绍张庄农业机械化进展情况及

粮食产量，谈了他们现在存在的困难，希望陈永贵能给上级有关部门讲一讲，给点支持。

陈永贵微微点了点头，那布满皱纹的眼角边闪过一丝不意觉察的笑意。

离开大寨到太原。

韩丁带金红找到了当时刚刚“站出来”的山西省委领导王谦。

王谦久久地端详着韩丁：“你就是当年在张庄搞过土改的那个韩丁？”

韩丁：“是的，我还听过你在潞城的报告呢，谈的是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两个人从过去一直谈到今天，越谈越亲热。

韩丁说：“我这次来主要是向你谈谈张庄上农业机械化的事，他们已经做出了成绩，但要再发展，上水平，需要你这个大领导支持一下。”

韩丁回国了。

第二年春天，由省委直接下达指示，组成了一个专家工作组来到张庄，经过多方面考察，最后决定在张庄搞500亩机械化作业试验田，省科委拨给15万元试验费，购置了一系列的配套机械，当年基本实现了耕、耙、播、种、收割、排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作业，亩产上了600公斤，每人每天平均生产粮食200公斤，年创价值4500多元，粮食生产成本由过去的每斤7分降到4分。

秋天，收获的季节。1978年的秋天，对于张庄来说，丰收的不仅是粮食，还有观念的转变，农业机械化之路终于

以雄辩的实践被人们认可了，确立了。

王金红怀着喜悦的心情给远在大洋彼岸的韩丁写信，报告这一丰收喜讯。

不久，金红接到了韩丁的回信。

亲爱的金红：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了你的来信，尤其高兴的是知道你们已制定了使用机械提高500亩玉米产量的计划。

另外使我高兴的是，我听说你们的烘干机搞得不错：你们还是用竹子搞成的吗？烘干一斗玉米（按：合美国三五点二三八升——译者）要烧多少煤？你们用仪器所测出烘干的潮湿度百分比是多少？

离我很近的一位农民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太阳能玉米烘干机。我将为你们设法弄到这种计划与图纸。那个农民说：太阳烘干慢是慢些，但代价便宜。本来，我们也无需过分匆忙，因此稍稍慢点儿倒也并不碍事。在这件事上，需要并不复杂，能有一个收集热量的宽绰地方就行了，也就是说，需要有玻璃或透明塑料下边的热气和一部能把热气吹入玉米的鼓风机。所以，主要的费用不过是带动鼓风机的动力。

另外，我高兴地获悉，省机械研究所真的把我们要求的那个机器借给了你们，并很快运了回来，这真是够快的了！我曾担心，一旦我离开之后，会不会发生什么故障，致使借机器一事成为泡影。或者因为耽搁过久，机器到手时秋收已过。

你们从机械研究所得到的那个玉米收割机按美国今天的标准来讲是比较笨重的，实际上适合你们使用的应是福特公司或马赛佛古森公司所制造的那种排式玉米摘穗机。那些机械重量轻，在小块地里移动灵便，适合中国的情况。只可惜机体太大，卡玛也没法给你们送去。

你们现在既已有了玉米收割机，那么，玉米在送进烘干之前的脱粒一环便是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脱粒的？与你们一天所能摘取与烘干的玉米相比，你们的脱粒机是不是太小了些？我们这儿有一种不但能除去玉米的外皮，而且能在地里边走边脱粒的玉米收割机，其作用与康拜因相同，但结构却更简单，我看这才是你们所需要的那种机器。

请把我的问候和好意带给张庄全村人。我非常关心那里的一切。我希望能同大家尽快见面。同时卡玛也愿意作为我的使者，她将给你们带去一些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和你们用得着的农业机械方面的印刷材料。

比尔·韩丁

1979年6月4日

如果说韩丁与金红的友情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中凝结的话，那么，80年代初，这友情接受了又一次考验。

这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以家庭联产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第一步改革无论从理论的探索还是实践的尝试来说，都是一个伟大创举。但是，即使再完美的蓝图在实施过程中也难免偏移。于是就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分到底，分得越彻底越好的思潮，认为不如此，就是不

改革。

一些人长久以来习惯于唯上级领导、唯文件是从，赶风头，追潮头，习惯于“一刀切”的思维方式。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只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最省心。”

王金红是个爱动脑子的人。他看到很多地方在一夜之间把集体多年来积累的那点儿家当分个净光，而只是为了向上级表明自己改革的深入性。特别是，他看到一些地方由于田地分割，耕作和收割，机械完全失去了用场，他的心里很不平静，进而联系张庄，十多年来的努力，机械化耕作水平已经初具规模，如果照此一分，不是要前功尽弃吗？他越想越不安。

支委会开了一个又一个，上级催促分田分地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金红对支委们说：“凡事都不能脱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张庄的路子怎么走？我觉得要从张庄的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张庄具有本地特色的改革方案出台了：“全村每人八分口粮田到户，其余土地由少数农户承包，土地集中经营。”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这样的做法太让人吃惊了。

上级派来一个工作组，指责金红不能紧跟形势，拖了工作的后腿，并严肃地指出这是一种与上面不能保持一致的行为。

这是何等沉重的帽子！阴云笼罩着金红的心头。

就在这个时候，韩丁又一次来张庄访问。

金红向韩丁谈了自己想法。

韩丁认真地说：所见略同，所见略同，我认为你的做法很对，要勇敢地尝试，大胆地走自己的路。

韩丁就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其它地方作了考察，他把自己收集的大量数据，所见所闻讲给金红，富有信心地说：“我认为家庭联产承包的路子主流是好的。但决不可搞一刀切。”

后来的实践肯定了金红的成功，随着改革的深入，“统分结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作为一种原则和经验在全国实行和推广。

张庄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改革之路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向前跨越，在短短几年内经济状况发生超常飞跃，1991年，张庄集体收入达到1000万元，全村人均收入1000元以上，粮食总产量达80万公斤，900多个剩余劳力转移到14个村办企业，集体固定资产达到百万元。

经济的腾飞带来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全村主要街道已水泥化，办起了养老院、幼儿园，实现了老有所养，子有所教，村建公园和许多游艺设施使张庄人感到了文明生活的气息，高标准、高水平的村办学校，展示着张庄的希望……“太行山上第一庄”、“上党城郭卫星村”成为张庄人的骄傲。

韩丁欣慰地对金红说：“应该说，这是张庄的第二次翻身。”

# 耕云播雨

古今中外，凡成就事业，凡对人类有作为的，无一不是脚踏实地，艰苦攀登的结果。

——钱三强



在对韩丁的采访过程中，我常常想起毛泽东评价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一句话：“他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

韩丁何尝不是如此呢？

1978年秋天，正是中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

位于中国东北的北大荒经过10年蹉跎，正在萌发新的气息。这里早先是中国北部边陲的不毛之地；解放初期，当年威震湘鄂，后来名扬南泥湾的矿工出身的王震将军，率领一批长期鏖战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英雄健儿，放下枪杆，拿起锄头，向大自然开战，勒令荒原献米纳粮，要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使这千里莽林荒原，迸发出青春的火光。

在边境线上，几十个农场应运而生。

50年代末，一场政治风云把一批“犯有错误”的人卷到这里。从此，北大荒具有了“改造基地”的含义，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中，无数自愿和不自愿的知识青年以接受改造为追求向这里云集……

北大荒纪录着新中国几十年的苍桑。

韩丁风尘仆仆地来到友谊农场。还没有走出车门，一个汉子三步并作两步地迈了上来，一把抓住韩丁的手。

“你还认识我吗？”他微笑地望着韩丁。

四只眼睛相视许久，两人专注地凝视着，情感的激流在目光中撞击。

“你是马连相！”韩丁猛然伸开双臂，紧紧地搂住对方。

“叫你说对了！”马连相兴奋地手舞足蹈，孩子似地搂住韩丁的肩膀。

“老了，我真有些不敢认了。”

韩丁摇着马连相的肩头，不无感慨地。

“你还是那样精神！”马连相的脸上跳跃着兴奋的火花。

马连相是1949年冀县拖拉机训练班里，韩丁所带的70名学员之一。

最近，听说韩丁要来，他的心怎么也难以平静，当年，在冀县的一幕幕往事像浮云一样在面前掠过。

那是韩丁给他们讲第一次理论课。题目是拖拉机传动原理。韩丁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公式。有很多名词，他用汉语讲很费力，一边比划，一边吃力地叙述，憋得脸上冒汗。

在下边听课的马连相尽管用了全部精力，还是听不明白韩丁讲的内容。他越听越糊涂，左右环顾，发现不少学员都在皱眉头。马连相忍不住了，举起手打断了韩丁的话：

“老师，我们听不懂。”

韩丁愣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不快，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那么你说应该怎么讲呢？”韩丁认真地审视着马连相。

“叫我说，不要啃这么多书本上的东西，只要学会摆弄那些手柄，把拖拉机开动起来，能干活就行。”马连相直率地发表个人的见解。

韩丁摇着头：“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目光太短浅了，目标太低了。”

马连相还要继续发表意见，学员们制止了他。

下课以后，有人责怪马连相不该打乱老师的讲课，有人批评他对老师不恭……

马连相渐渐感到不自在，晚饭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

突然，门开了，韩丁走了进来：

“马，我们能谈谈吗？关于讲课的问题。”

马连相注视着韩丁，从他那恳切的目光里寻到了鼓舞：

“我说的不一定对，我是觉得你不了解你的学生，虽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马连相从自己讲起，是怎样从饥饿与压迫中走向革命，是怎样在革命战争的风雨中跋涉，从来没有机会读书识字……马连相告诉韩丁，他的学员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简历，怎么能在突然之间去接受那些深奥的理论呢？

韩丁渐渐明白了：“马，你说得对，我想是我对实际情况的认识出了偏差。”

夜很深了，韩丁和马连相越谈越兴奋。当他离开马连相，走出房间时，三星高照，月光似水，万籁俱寂，韩丁感到一种超然的清爽。

从那以后，韩丁改变了自己的教学方法，他把生硬的理论教育改变成与实际紧密结合的传授方式，把课堂搬到了田间，搬在拖拉机旁，用他的话说，这叫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学干结合。

20多个春秋过去了。

当年的学员，今天已大多成了中国农业机械战线的专家、领导和骨干。

马连相取出一叠信：“韩，你可称得起桃李遍天下，这是最近你的学生们听说你要来这里，从各地寄来的信。”

韩丁一封一封地翻阅着，神情专注，脸上不时闪动着兴奋、激动。他一边看信，一边寻问着那些学员的情况，感慨地说：“不简单，都已成了中国的栋梁之才。”

午饭过后，韩丁提出去农场看看。

马连相：“很惭愧，我们的工作赶不上老师。”

韩丁说：“学生应该超过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深秋的北大荒有着一种特别的神韵，无边无际的田野闪着金黄色的光辉，给人一种辽阔和壮观，缓缓的风里流淌着成熟的清香、收获的欢乐。远远望去，鲜红鲜红的拖拉机、收割机，宛如舰艇驰骋在金色的海洋里，劈风斩浪，滚滚向前。他们身后是一片黑色土地，而金字塔似的草垛，疏疏朗朗一堆堆排在土地之上，太阳照在上边，闪着耀眼的光芒。汽车一部接一部地在大地上飞驰，场院里，人声鼎沸，机械的轰鸣和着雄壮的进行曲和流行小调在空中飘荡……

韩丁兴奋地说：“马，你们大有希望，因为你们有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一定会超过我。”

马连相：“我们有这种想法，但也很困难。”

随同韩丁来的领导同志说：“两年不行，三年，四年总能超过吧。”

韩丁诙谐地说：“我只说两年，毛主席生前讲过，1980年中国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你们要做个榜样。”

在马连相的带领下，韩丁来到了农场的机械处。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农业机械博物馆，建国之前美国援华的“福特”；50年代前苏联援助的“伏尔加河”；60年代中国自己生产的“东方红”；近期购进的美国“埃命”。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农业机械化之路的缩影，也似乎反映出世界农机工业的发展走向。

马连相指着那些新到的美国农机说：“这是我们刚从你们国家引进的60台成套农业机械，现在正作试点规划。”

韩丁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请你具体给我谈谈，我想我能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马连相说：“大体讲，我们计划配备20名工人，耕种2万亩土地。”

韩丁摇摇头：“这是低效率，计算还不精确。我建议配备15名职工，耕种3万亩土地。”他搬着指头，对这个规划作了一番说明。他说，使用这套农业机械，只要12个半人工作，其中队长也开一台车，外加一个炊事员，一个作后勤工作的，这样还结余半个人。

韩丁用自己的经验说明，搞农业现代化要一个人顶几个人使用。他风趣地说：“在我的农场里，我是场长，又是驾驶员，修理工，保管员……总之，全农场只有我一个人，与你们相比，恐怕可以说是以一当十。”

韩丁深有感触地说：“我不是建议你们全盘照搬西方的东西，但是，作为科学技术，作为管理经验，我认为这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是不讲信仰与习俗的。在农业方面，美国有用的经验，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思路对一切制度下的农业生产都是有用的。”

他稍作停顿：“可能有人会批评这是‘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也不一定不对，甚至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的一条成功之路。”

韩丁脚步匆匆地在农场奔波。

马连相抓住时机向老师请教。

对于那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技术问题，韩丁不仅从道理上分析，而且亲自动手处理。

他穿起工作服，忽儿蹬上驾驶台，一边操作，一边调整；忽儿钻到拖拉机下边，仰着脸检查机械零件，抹得满身油污，累得满脸流汗，人们不由得劝他休息，结果，得到的不是沉默，就是他不高兴的斥责：“看不见我在忙吗？要休息，我就不在这了。”

后来，闲下来的时候，马连相问韩丁：“韩，你怎么还是那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这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的产物，美国社会的产物。”韩丁幽默地说：“我和你们不同，你们端的是铁饭碗，

我端的是泥饭碗。不过，我想，也正是因为你们没有危机感，所以人的潜力发掘不出来，工作效率不高。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从理论上讲应当比资本主义高，问题在于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是一个多么深刻而紧迫的命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晨曦里，韩丁已经清晰地感悟到了这个至关重要而又难解难分的课题。社会主义，自从马克思创立了这一学说，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发展构想，它曾使资本主义世界恐惧不安，同时曾使无数追随者为之前仆后继，奋斗不息。我们称道韩丁，就在于他不仅仅崇尚这一制度，而且从两种制度的对比中，思考，寻求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回顾历史，社会主义作为一面旗帜，很多人都曾把它高高举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社会主义以后，许多人都曾标榜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但是，许多只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标签，并不去实行，并不去奋斗。

韩丁没有标榜自己，但是，我想，无论是观念还是行为，都是再明了不过了。

1979年，阳春三月。

韩丁驱车来到苏州，他不是来领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盛景，而且要实地考察这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他协助主管部门制定全区农田水利建设方案。在那些由苏州地区主要领导主持、全区知名专家参加的可行

性论证会上，两种思路发生撞击，一种主张整齐划一，搞“标准块”、“方块田”、“水平梯田”，另一种意见主张因地制宜。

韩丁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中，各有不同地形，土质，气候，千百年来形成了相对稳定，各具特色的种植环境。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制定方案时不可以死搬硬套外地经验，在坡度缓的地带，搞缓坡梯田，沿着等高线方向平整土地，修成形状多样，大小各异的梯田带，但是，在地势平坦的地区，就不必整齐划一。

韩丁建议，在截流防洪的缓坡田埂上，种植粮食，在排水道中种饲草，这样既可以收获饲料，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他说1972年6月，他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地区连续下了两个星期的大雨，最后一天，降雨量达750毫升，但是，他的农场缓坡梯田没有被冲垮，流下来的水是清的。他说，修筑这样的梯田既省工，又便于农业机械越过田埂作业。

韩丁说，搞农田基本建设，即使在人多地少，暂时机械化水平还低的地方，也要考虑将来大机械化作业问题。

韩丁的意见得到了当地主管部门的采纳，“缓坡梯田”在苏州地区推而广之。

在人欢马叫，机声隆隆的喧嚣中，韩丁深入农田基本建设一线，向农民做示范，讲道理，挥铲抢抢，挖土造田。

韩丁和农民一起挑灯夜战，一起坐在田间地头吃夜餐……



人们至今回忆起韩丁说：“那是个令人敬佩的人，他有一种实干精神，有一种永远使不完的劲头。”

1980年春天。

韩丁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粮农组织聘请的农业专家的身份来到内蒙古昭乌达盟翁旗特示范农场。

这里正在紧张地实施扩建工程。韩丁作为技术指导，夜以继日地忙碌在工地上。他的认真、严谨使人无不称道。每一个重点部位，他都要仔细察看，反复检查，每一项技术难点，他都慎之又慎，一丝不苟。

从3月份直到5月底，韩丁没离开工地一步，澡没洗，头发没理，一位上级领导专程来看望韩丁，几乎认不出是他。

是的，头发长了，人消瘦了，两手的老茧越发厚硬，塞北的风在他脸上又新雕了几行皱纹。

第一期工程基本结束了，在二期工程，机械安装之前，有一个修整时间，其他同志放假休息。

韩丁利用这个时间空隙要去东北友谊农场解决几个技术难题。

5月25日下午，友谊农场的赵守安前往车站迎接韩丁。火车进站，韩丁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站台上，赵守安迎上去，发现韩丁背着个大木箱。原来，这是他从美国来时，特意为友谊农场捎来的小零件。这些重50多公斤的零件，年过六旬的韩丁当作随身行李放在卧铺车厢里，从内蒙一直带到佳木斯，中途转车时，背上背下。赵守安从

韩丁身上接过木箱，一步一挪地搬到车上。

友谊农场的职工们看着韩丁千里迢迢背来的零件，纷纷感动地说：“韩丁是咱们真正的朋友！”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韩丁很快为友谊农场处理完技术问题，昼夜兼程赶回内蒙。

翁牛特示范牧场机械安装开工了。韩丁每天和工人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哪里最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整天一身灰尘，两手油污。

试车临近了，韩丁几乎一夜一夜不合眼，他一遍又一遍核实安装程序，检查安装质量。他对同事们说：“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严重地是会打击人们对机械化的兴趣。”

望着韩丁那越来越黑，越来越瘦，常常露出倦色的脸，工人们劝他休息。他却说：“搞建设，一定要抢速度，我来牧场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工作。只有草场多长草，亩产两万公斤青储料、牲畜吃得腰肥体胖等这一套肉、奶加工线顺利投产，我才能休息安稳。”

那是播种苜蓿草的一天下午。突然，播种机的传动链脱落了，韩丁把手一挥：“大家都快找，我去库房补领一件，不能耽误时间。”说完，迈开大步向库房走去。人们考虑回库房路程很远，韩丁年纪大了，又有支气管炎，纷纷拉住他，计划派年轻人去领。

韩丁说：“不行，他不懂英文，找翻译查卡片太费时间，还是我去吧。”说完，转身走了。

他没有绕道寻路走，而是两点成一线他直接奔向库房。人们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往返跨过牧场的刺围栏，趟过没膝的渠水，很快取回了传动链。

当播种机重新轰鸣起来时，韩丁高兴地笑了。

在一段交往之后，人们对韩丁的了解越来越深了。他在休息时，和大家有说有笑，亲密无间，和蔼可亲，可是，在工作时间，他严肃认真，毫不含糊，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天上午，一台拖拉机的液压表失灵，为了赶进度，拖拉机手没有告知韩丁就出车了，韩丁发现后，顿时涨红脸，双唇发颤，十分严厉地大声喊：“你们为什么不找我。”他气呼呼地拦住拖拉机，命令马上停车。

韩丁带着那个拖拉机手马上查找毛病，修好以后，韩丁那铁青的脸才缓和起来。

聊天时，韩丁又一次向那个拖拉机手讲解使用和保养机器的重要性，他说：“机器出了毛病要马上处理，不然的话，就会出大乱子。”

翁牛特示范牧场的工程结束了。临走，韩丁对当地干部说：“你们这里有沙漠，风沙大，耕作制度，耕作习惯要有改变，要寻找更科学的途径。”他认为，这里的牲畜太多了，会把草吃光，草场已经超过了载畜量，一定要控制牲畜发展，计划放养。要植树造林，多种固河草，补播牧草，保护植被，保护土壤。

在示范牧场的乌兰图格，韩丁看到一台已经报废的机器，他了解不适用的原因之后说，购买机器应当尽可能

地先进,要有超前观点,不要总是跟在别人尾巴后边爬行。

谈到牧场技术培训计划,韩丁提议,出外考察人员要是内行,不要总派外行,可以直接到进口公司学习,这样快,合算。人员培训要与机械设备情况相配套,学以至用,学用结合。

韩丁对这里的工作想得那么多,那么周全,那么深刻而又富有远见。

# 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思考

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考。

—《康德传》作者  
阿尔森·古昌加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农业发展史。

毛泽东同志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指出，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解中国革命。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来因教授1981年在费城曾对中国留学生们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研究中国问题，首先要切入农业这个主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韩丁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与中国最广泛的接触是农业，是农民，他不仅从实践中对中国农业给予了极大热情，解决了许多具体的、富有紧迫性和经济价值的问题，而且不断地从理性的高度思考中国农业。

他以宏观的视野分析研究这个课题，从中寻找规律，归纳出科学的答案。

他在历史的轨迹及其延伸线上寻觅，追索那些闪光的结晶和富有生命力的萌生。

他以西方先进农业为参照系，在对比中筛选、发现、构造中国农业最佳的坐标点。

他并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决策者，甚至不是一个中国农民，却始终对中国农业有着如此的热情的关注。

这不能不叫我们由衷地敬佩。韩丁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阐述了一系列的观点，他倡导改革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方法，推广秸秆还田、免耕法等现代农耕方式；他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

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当务之急是推进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引用现代化管理手段……

### 秸秆还田与免耕法。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韩丁奔波于中国东北边陲时,大田里时常燃起的浓烟引起了他的注意,人们告诉他这叫烧秸清地。在中国北方许多地方,长期沿用这种方法,人们把作物秸秆除了作饲料外,大多焚烧在地里。

韩丁认为传统的东西并非科学,这种习惯把土壤中大量有机物质通过牲畜或燃烧转移出去,造成地力减退,对大自然的掠夺势必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为了说明这种危害,韩丁以北大荒为试点收集了大量土壤数据,查阅了广泛资料,得出的结论是:20年前,这里的土壤含有机质8%,现在已下降到2%,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韩丁说,这样发展下去,北大荒真要荒了。

韩丁说,美国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就推广秸秆还田,又叫秸秆覆盖,就是把农作物的秸秆、根茎残体覆盖在大田上,从而达到有机质还原,增强地力,提高粮食产量。

韩丁说,对这项耕作技术,如果追根寻源,其老祖宗在中国。早在汉朝之前,就有关于用秸秆覆盖党参、蔬菜及其它弱小作物的记载。现代工业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给整个地球带来了危机,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地膜“三大兴奋剂”,带来了土壤板结、环境污染,使人类生存之本、衣食之源的土壤告急。

美国针对农业面临的土地困境,在农业界和科技界

出现了对“常规农业”的批判和反思，以有机农业为先导，陆续提出了“生态农业”、“生物农业”、“再生农业”等新思路，超出以往仅限于在种植上作文章的局限，围绕水土保持、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率，防止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关系美国农业能否维持长久的重大课题，开展多学科、跨行业的综合研究。

北美州旱地农业区，包括美国北部、中部、南部三大平原和西北、西南沿太平洋海岸及加拿大太平洋六个地理区，根据降雨量等自然条件，人们曾对秸秆还田、耕作法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实验。

这种方法从根本上来讲是科学利用自然资源。农作物秸秆、根茎是一笔可观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很大。中国每年以平均生产四亿吨粮食计算，就要产出五亿多吨农作物秸秆，但长期以来利用率很低，除少量用作饲草，用于工业、建材、造纸等以外，大量被丢弃了。据测算，全国仅烧掉的秸秆约等于一个大型化肥厂的年产量。

韩丁说，把秸秆还田再推进一步发展为免耕法，又叫留茬播种法。即在作物收割后，不翻耕土地，在地上保留一定高度的玉米茬、麦茬，逐年积累，造成一层肥厚的腐植质。

免耕法可以保持土壤的团粒结构，防止水土流失，增强土地抗旱力。

他说，近几年，由于他实行免耕法，土地越来越肥，玉米单产千斤以上，大豆连续多年达亩产四百公斤以上。

为了让人们认识免耕法的优势，韩丁与中国科技人



员结合起来,在山西长治选择试点,小麦亩产增加四十多公斤,从而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中国农科院、长治市科委、长治市农业局等单位组成秸秆覆盖旱地农田效应及其推广应用课题组,对覆盖增产机理和技术难点进行系统研究,并以点带面,大面积推广,从而使人们对这项农业技术终于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不自觉到自觉地接受下来。

### 农业机械化与水桶定理。

1978年10月,韩丁作为美中友协主席应香港学术界邀请在香港理工学院发表了题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前景》的讲话。

我们讨论中国农业现代化,现阶段主要是谈机械化。固然,现代化比机械化的涵义更广,但是机械化却是今日中国农业的关键问题。

我在中国所到之处,人们纷纷在讨论这个问题,制定计划,认真实施,决心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其热情之高、信心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使我们预感到中国农业的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正在酝酿之中。

中国是否真的能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呢?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乐观的看法,所谓基本,要包括村一级农作物加工处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交通运输,最后还包括田间作业的机械化。这就是中国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大略计划。

现在,这个计划的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例

如在农作物的加工方面，磨粉、脱粒等，因此，解放了不少生产力。当然，如果和现代化的磨坊相比，中国的生产率还很低，但农村大队集体化决定了这种小规模的加工方式普遍化。

在水利灌溉方面，一般已利用电力或柴油水泵，用手泵的例子已不多见，从这方面看来，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不成问题。

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一方面随时可见人们用原始工具如篮子、担挑、水桶、手推车等干活，同时，人们又在进行机械化作业。一些良好的机械正在代替人力，如推土机已用于挖沟造渠、平整土地。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目前虽然仍以人力为主，但是人们相信，1980年，起码有七成的人力将为机械所代替。

在交通运输方面，机械化比前几年有很大进步，柴油机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都被广泛地运用于一般运输上，取代了牛、马、骡等。

到1980年，相信70%的运输都会被拖拉机或货车替代。

田间作业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但一般相信到1980年，农活可以实现70%机械化操作，但是标准如何？据我所知，中国到1980年的目标是希望达到美国1940年的机械化程度。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农业器械供拖拉机使用，所以现在相当一部分拖拉机用于运输。

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农业机械的配套问题。

在科学哲学中,有个关于常识性的所谓精神水桶理论:人的精神,起初只是一只空水桶,经过我们的感观积累起来并得到消化的材料就倒入这个水桶之中。洛克的白板理论、贝克莱的经验论以及休谟的实证主义都是这种理论。这也是教育学上的“仓库理论”的哲学基础。

水桶理论现在已经受到了严厉批评,不过,如果我们不去争论倒入水桶中的材料是从怎样的哲学渠道得来的话,那么可以得出一条有用的“水桶定理”,即一个水桶的容量由最短的那一块木板所决定。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人的“精神容量”由这个人最弱的一个精神特征所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限度由这个国家最短的限制尺度决定。

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水平是由最短缺的配套机具所制约。一个环节不能使用机械,就像一个水桶,有一块木板缺了半截,这个水桶只能装半桶水。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有了拖拉机没有播种机、中耕机、收割机,这样,拖拉机也无法干活。这就造成了一方面是拖拉机无用武之地,只好往公路上跑,这种现象在美国看不到。另一方面是人们依然摆脱不了繁重而低效率的人工操作,黑龙江不少农民把拖拉机叫作“犁后喘”,因为那些拖拉机没有相应配套农具,只好挂上犁杖,由人扶犁,拖拉机在前面跑,人在犁后喘。机械化投资来之不易,一台拖拉机要花一、二万元,可是由于机具不配套,发挥不了作用,影响人们对农业机械化道路的认识。

解决中国农业机械化问题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农机具

配套。从生产上讲,只生产拖拉机,不生产相应的农机具,好比是只造船不造帆和只买马不备鞍一样。

解决农机具配套问题,固然主要依靠农业机械生产企业,但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需要的农机具不同,解决农机具配套,要依靠群众,因地制宜。中国农民很聪明,富有创造力,但是现在仍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绥化县积极发展群众性革新活动,自行设计生产出了深松播种机,松土、破茬、点种、培垄、填压五道工序一次完成,很受农民欢迎。他们播种和中耕的机械化程度已达百分之七八十。全县13万农业劳动力,有5万人已初步解放出来,参加社队企业和植树造林、养猪积肥、农田基本建设等专业队。他们有一个规划,打算把其它田间作业和非田间作业的机具尽快配套。

搞农业机械化配套,在黑龙江,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成问题。省、市、县可以解决,问题是缺乏资金和材料特别是缺少方钢之类合格材料,省内无法解决。我认为,需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分散使用,到处撒胡椒面,到处都配不成套,如果选择一些机械化基础较好的地区,集中使用资金,帮助他们尽快配套成龙,收效可以更快,更显著。

搞好配套,可以大大提高工效,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产量。比如黑龙江无霜期短,及时播种就特别重要,绥化县过去春播要一个月,现在十几天就能播完,有的公社几天就播完了,这就等于为作物延长了二十天的生长期。再如,从美国进口的播种机,镇压器的保墒效果好,播后出苗齐全,这种镇压器,结构简单,如果应用到中国的播种,

对春旱地区也是一项重大增产措施。

因此,配套也要讲究质量,要赶超先进水平。中国地域广大,地形复杂,作物种类繁多。看来,从不同的发达国家,多引进一些先进农用机具作为研究和生产借鉴,是很有益的。

中国农业机械化具有很多有利条件。一是农业集体化令人鼓舞,中国的农民是组织起来进行相当规模的生产,归入这个生产单位管理下的耕地面积都相当大,可以有计划、有系统地推行机械化。同时,在集腋成裘的原则下,这个生产单位可以收集足够的基金,去购买各种农业机械。

其二是中国各地的农村都有不少专业人才,他们擅长于烧焊、装配、制造金属用具,基本上可以做出他们需要的农具,很多公社都有机械制造间,他们甚至可以自己造发电机,而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拥有自己的手艺精湛的电器工人。

同时,各地的工业都给予农业机械化很大的帮助,各地的公社如果要修理、设计制造某种农机,他们可以到附近的工厂求助,他们不是孤立的小村落。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大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解放了 30 多年,为什么机械化不能达到应有水平呢?是什么拖了机械化的后腿呢?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中国的人口多,劳动力便宜,因此,对机械的需求不那么迫切,不需要机器解决问题,一旦机械出了毛病,很容易便可以用劳动力代替,因

此发展农业机械化压力不足。

第二个矛盾是灌溉与机械化的矛盾。中国灌溉的传统方式要求每一片田地都要平整，然后用小田埂围绕起来。如果用拖拉机耕田，就会使田埂搞乱，把土地重新平整使它适合灌溉可能还要更长时间，所以人们宁愿不用拖拉机犁田，这就把机械化拖住了。因此，最近设计的一种新的绕圈喷水式系统，不必再筑小堤、小道，这就解决了机械化和灌溉之间的矛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械化和耕作制度的矛盾。

全中国的作物都是每年两造或三造以及套种、间作，这一切都使机械化作业复杂化，多造种植和间作，使收割机种植时间紧迫，往往小麦未干透就要收割，而世界上，目前尚没有一具机械能收割未干透的小麦。这是在其它国家未遇到过的问题。

在美国，他们并无那么长的雨季，可以让小麦在田上干透，然后集中收割。但应当看到，由于集体化以及农民本身科技水平不断提高，耕作制度也在逐步改善，为农业机械的开发设计不断提出新要求，整个中国农业正处于一个非常活跃的发展阶段，要尝试制造适合这种状况的农业机械确实难题很多，因此，往往拖住了机械化发展速度。

应该特别提起研究的一个问题，是领导认识问题：一些很先进的机械学校，还未能同普通劳动者有足够的联系，还没下到基层去，不能深入到农民中去，和他们一起研究开发出他们需要的机械，理论和实践有相当距离，有

很多非常先进的研究机构，却同周围的农业缺少足够的联系，交流很不够，乡村的农民不知道有什么机械。在山西省张庄的时候，农民要造一部脱粒机，他们问我懂不懂。我给他们设计了一些图纸，他们决定自己做。后来，我到太原，在一家研究院的农业机械陈列室里，就有一部类似的脱粒机，张庄的人们都不知道，而研究机构的人们也不去宣传、发动。

这还反映了一个信息问题。要使农民尽快了解有哪些机械可以使用，使供给部门把握农民需要些什么机械，双向交流，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信息传播系统，但还不够。

这只是目前中国农业机械化的粗略分析，概括起来说，在某些方面，中国可望于 1980 年达到高效农业机械化，但是，在农业操作方面，则难以达到一定水平。但是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理应很快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资本主义农业。

### **农业的主旋律：提高劳动生产率。**

1978 年，韩丁在中国农业部科学院，就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又一次发表长篇讲话。

中国 10 亿人口，8 亿农民，其中 3 亿农业劳动力直接从事粮食生产，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中国农民构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实体。仅仅这一点就决定了如果农村的事情办不好，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农民贫困，则国家贫困，农村停留在古代，中国就无法现代化。但

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农村的经济使命逐渐被简化为向城市和大工业提供农产品,农民则基本上被隔绝在城市化和现代化大门之外。这样一种功能划分,在结构上决定了农业发展的缓慢,从而造成目标的含糊不清,主攻方向不明。

目前,中国农民平均每人每年产粮食 1000 公斤,黑龙江省较高,在 2000 公斤。而我每年劳动 150 天,生产玉米 75 万公斤,每天生产 5000 公斤。当然,中国和美国不同,上述数字中,也包括一些不可比因素,但差距如此之大,不能不令人深思。

农业现代化问题,主要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反映现代化程度的综合指标。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

有些地方,二十多年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例如,黑龙江青冈县从 1949 年到现在,粮食产量增加了 40%,投入农业劳动生产的劳动力却增加了一倍。

按照规划,中国到 1985 年,要生产 4 亿公斤粮食,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变,农业劳动力就必须从 3 亿增加到 4 亿。如果保持现有农业劳动力不变,劳动生产率就至少必须提高三分之一,低于这个幅度,势必追加劳动力。因此,必须用很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说,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从现在的 1 千公斤提高到 2 千公斤,农业劳动力就可以从 3 亿减到 2 亿,抽出 1 亿人去干别的。显然,今后农业生产的提高,原则上应该依



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借口劳动力多,不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观点是不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粗略估算,如果中国的水稻、小麦、玉米的单产都能够达到目前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即使种植面积不变,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可以达到 4500 亿公斤。因此,提高单产十分重要。而单产和工效,正是构成劳动生产率的两个因素。提高劳动生产率,无非是要求:一、每个劳动力种更多的土地;二、每亩地出更多的产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高工效决不能以牺牲单产为前提,提高单产也决不能以牺牲工效为前提。精耕细作与用手工操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我在友谊农场看了从美国进口的播种机,八小时能播一千二百亩玉米,开沟、点种、施肥、下药、覆盖、镇压,一次完成,行距、株距、深度都好,下种量的精确度也很高。无论在速度上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手工操作。相形之下,手工劳动成了粗放耕作,现代化才是更高级的精耕细作。在小生产的条件下,工效和质量确实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是,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装备面前,手工作业是可以用更准确的机械作业来取代的,搞农业现代化的目的之一,正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把单产和工效对立起来,把精耕细作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立起来,是一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观点,不符合现代化生产的情况。

中国现在同发达国家在农业上的差距,不是几倍,甚至不是几十倍,而是几百倍。不抓住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点急起直追,赶超是无从谈起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

定要把劳动生产率问题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生产率,都要一年比一年高,农村中各项工作,如科学种田,农业机械化,以及社队经营管理等等,都要着眼于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最近从美国引进了六十台农业机具。我认为这些机器基本上可以代表美国七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比我自己使用的机器先进。我建议二队同我竞赛,比一比劳动生产率。现在这套机器由二十人操作,种两万亩地。其实有十五人就够了,可以种三、四万亩地。如果再加上采用良种,普遍使用灭草剂,实行更合理的种植制度,大力改进经营管理等等,那么,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很快就可以赶上和超过我。

从上面这个例子来看,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办现代化农业,同办现代化工业一样,要舍得花本钱。黑龙江省的自然条件,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仓,

### 系统观念及结构研究

韩丁认为:从现代观念来认识农业,仅仅把农业现代化视为增加机械含量,已经不够了。美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高,不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而应属于整个社会。从我的农场来讲,不仅有一批机器,而且有许多社会机构在为我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农业实质上又是美国最大的工业,一系列的企业都是为农业服务的,要良种,找种子公司,不管要哪种化肥,化肥公司都能迅速供给。

韩丁说：去年，我的烘干机坏了，第一天下午向一千里以外打电话，第二天就收到了空运来的配件；我要了解土壤成份，就找三十里外的一所大学农业系来分析；技术上有了困难，县里的农业科可以提供咨询。农民要盖房子，挖沟渠、运粮食、运饲料等都可以找有关企业承担。没有这些条件，即使有了土地、机器，生产过程也会中断。这一切，当然不是资本家对农民的福利，而是垄断资本的触角已经伸到四面八方，把农民紧紧地囊括在自己的手中。

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了把分散的个体农户抓到自己手中，尚且同农业建立起如此密切的联系，在社会主义中国难道不能把对农业的整个服务实现社会化吗？

生产的现代化要求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要求改变自给自足的社会生产结构，要求城乡之间，各专业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建立起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农业现代化需要全国上下齐努力，需要整个社会支持，科学和教育的支持，形成农业的大系统观念，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在大城市和大工业中心的周围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要更快一些。从黑龙江来说，在哈尔滨和大庆之间的地区，应该是首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地区。

英国、加拿大、荷兰等国的农牧业生产很发达，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很高，美国根据各地气候、土壤、劳动等条件以及市场供应要求，实行地区性专业化经营。在全国分有专门的玉米带、小麦带、棉花区、奶牛区等，哪个地方适于种棉花，就专种棉花，哪个地方适于种小麦，就种小麦，所需其它东西可以从其它地方买。前苏联也在全国划

分了若干个农业区,各农业区都不要求自给自足,而主要是生产商品。美国的商品化程度高,美国商品农产品的供应主要由二万多个商品农场提供,占全部农场的75%。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它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在不同地域,花同样的劳动种同样的作物,经济效果却相差很大。例如中国的浙江黄岩是国内闻名的蜜桔产地,这个县的桔园面积只占全省的1/4,而产量却占全省的一半以上。

中国长期以来在小生产的影响下,不管经济上合理不合理,什么东西都种一点,不是发展商品生产,而是习惯于自给自足,追求小而全,万事不求人,结果什么也种不好,生产水平上不去。

与生产专业化相应的是生产的社会化。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起着重要作用。

在美国,整个农牧业的生产过程中农户只需要完成某一阶段,或某一部分。如从事种植业的只需要在田间完成种植这一段时间的劳动,至于良种、化肥、农药等的供应,谷场干燥、储运,甚至农药、化肥的飞机喷施作业,都由专门公司完成。

美国从五十年代起,出现了高度集中化、专业化的“农工商联合企业”。这些机构把农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环节联结起来,建立了整体化的农业、工业、商业的垂直协作机构。1970年美国这种机构的经营业务占农业总产值的22%。

目前,中国农业社会化方面尚是一个空白。要提高机械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一套设施不行。

加强对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如何安排,如何建立大中小城镇的各种支农企业,如何试办如南斯拉夫的那种农产品加工联合企业,整个经济结构将起什么作用,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 **中国农业呼唤科学。**

韩丁谈到中国农业现代化时说:

纵观各国农业发展,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对科学技术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的阶段。中国农业要起飞,不仅要拥有强大的农业机械体系,同时要建立一系列农业科研机构和完整的农业教育体系。当前,首先必须把现有的农业科研力量组织起来,开展具有当地特点的农业科研工作。现在的问题是,地、县两级农业科研工作,存在着课题雷同,重复太多,“上下一般粗,左右皆兄弟”的问题,需要统一规划,各有重点,分工协作。

农业教育工作急待加强,中国不少农学院基础很好,这些年荒了学业。美国能建立高速度现代化农业,同他们重视农业教育是分不开的。中国应当抓紧把农业大学办好,并且大量发展农业中专。配备师资,购置设备,要优先考虑农业大学,那种只重视综合大学和理工科大学而轻视农业大学的观点,应当纠正。

现在听说要搞责任制,可是没有听说技术责任制,农

业方面,特别是在基层应当建立技术责任制,充分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我在一些地方听人们反映:“科学种田,越种越累,越种越贵。”这是对过去某些做法的批评。真正搞科学种田,农民一定欢迎。问题是一些并不科学的东西,在“科学种田”的名义下推行。比如一亩地要上几万斤土杂肥,其肥力往往只等于几百斤秸秆还田,而费工则就更以计算。黄土搬家,往往还把大量草籽以至碱土弄到地里,不仅徒劳,而且有害。有的地方要求倾斜度在五度以上的坡地都改成梯田,到底有没有必要,需要研究。

在农业科技人员中,很需要提倡讲究实效、讲究高效的工作作风。中国的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之中。传统的作物种植制度,土地耕作制度和积肥制度,其中合理部分应该继承发扬,落后部分应该淘汰。对各种技术措施,不管是传统的或是新兴的,都应从经济效益的方面研究,对农业科技工作者,应鼓励他们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积极开展农业科技经济问题研究。

韩丁在这里向我们阐述了一系列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问题。他所思考的不是要在某一年争取比上一年上一个什么样的新台阶问题,而是从总体和长期发展战略着眼考虑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促使我国农业长期稳定发展。

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已是再明了不过了,因为,近几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决了中国多年封闭的大门,许多先

进国家的经验、模式以及理论已广泛传播。1986年日本《东洋经济周刊》发表了日本国民经济协会理事长叶芳和的文章,其中谈到:目前发达国家农产品的40%—80%是为出口而生产的,“没有比农业更需要头脑,需要人才了!”他说到美国农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品种改良和栽培技术,特别是水的管理上的进步。目前,美国一个农户如果有两个儿子,就会让优秀的去学农,较差的去学经济。“非优秀人才不能成为农业的接班人,这就是美国现状。”

1992年,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谈到农业现代化时说:从二十世纪初到五十年代,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的知识、能力、以及健康等的提高对经济的增长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本重要得多,他将人的知识、能力、技术等因素称为人力资本。

舒尔茨认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而对农民和农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则是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一角度来讲,农业现代化,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是农业劳动力即农民的知识化、技能化。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要引进杂交种子、机械这些物的要素,还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这在我们这样一个无论是农业还是农民都具有典型的传统特征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

这一系列的观点和理论应该说较韩丁当年的阐述更深刻,更明确,但是作为对中国农业问题的研究,韩丁确

是走在他们之前了。

### 欣喜中的忧虑：

坦诚是韩丁个性的显著特点，也是他对中国权权之心和追求真理的自然流露。

1979年以来，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路，中国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韩丁紧紧追索这一改革的浪潮，多次来中国考察，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也许是韩丁具有中国和外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比的阅历，正当中国上下为农村改革出现的新景象而欢欣鼓舞，很少去研究新形势下出现新矛盾时，韩丁却在对中国农业进行着冷静的思考。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特征是城乡对立、工农对立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二元结构，而其经济起飞的过程，就是这种二元结构改善和消除的过程。从这一点出发，无疑邓小平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韩丁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曲折性。他说：“1984年，我在河北农村考察，看到一个男人拉车，孩子跟在后边推车，手里还牵着羊；看到拖拉机的左轮子压了这家的地，右轮子压了那家的地，从而发生争吵，许多农业机械不能使用，许多农田水利工程无法实施……”

韩丁说：实现农业现代化，归根结底是用几千万农业工人取代8亿农民。这一伟大进程必将对中国社会、经济



的各方面带来剧烈变动,分化、改组,这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伴随着而来的不仅是人们思想观念而且还有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

如何实现这一变革? 第一步无疑是机械化。按照我的农场推算,中国解决 170 万台 100 马力以上的拖拉机,75 万台联合收割机,100 套烘干设备,5000 架农用飞机,年产 1.5 亿吨化肥,75 万吨除草剂……就可以把 7 亿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会比现在提高很多倍。

要实现这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农业的经营规模必须相应扩大,土地也应不断集中,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无法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

韩丁认为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 1985 年应思考新的战略,应当提倡土地集中经营。当然,迅速把中国办成美国式的农场,存在很多困难,应当采取多种途径,多种模式逐步实现土地集中。

韩丁说:纵观一些农业发达国家的历史,基本上都有这样的经历。美国的农场数量越来越少,规模越来越大。1940 年农场 610 万个,到 1975 年减为 280 万个,经营规模从一个农场平均拥有耕地 1000 亩增加到 2300 亩。日本通过合并从过去平均一二十亩地的小农经济发展为水田以 200 亩、旱地以 400 亩为一个经营单位。法国 1955 年共有农场 300 万个,现在已合并为 50 多万个。

不仅农业,畜牧业也在不断向大型化发展,现在,年产几万只鸡的鸡场已屡见不鲜,美国已出现了年养 350

万只鸡的大型鸡场。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农牧业经营规模小,专业化水平低,就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生产组织,不可能采用新技术和现代化设备,向生产大规模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

笔者认为,应该看到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在改革中,农业生产因结构性变化而使效率提高的,一般不是靠小块田耕种的农户,而是那些没有分田到户进行集中化生产的地方。如山东省牟平县新关大队和西关队;陕西省礼泉县表家大队以及闻名的华西村。这些地方没有实行分田到户,而是90%的劳动力到乡镇企业做工,10%的劳动力对土地进行集中经营,在人力、科技,机械化水平得到结构性变革条件下使劳动生产率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地方的农业经营方式虽然在全国是少量的,但却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走向。

1987年9月,韩丁就中国农村改革问题,在美国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论述中国农村改革时说:

邓的农业改革常常被列为他所取得的最大成功。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恢复私有农业使农民不必再依靠集体单位,这使得人们有精力去从事各种各样的副业,给农村经济注入了活力。现在农村经济已变得更加多样化,小型工业、运输、家畜饲养和果园等各行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结果,农村收入增加了,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了,但是也带来了新的忧虑。

韩丁决非在杞人忧天，更不是危言耸听。他当时忧虑的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了我国众多的经济学家，高层领导者的关注。

九十年代伊始，党和政府把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作为重点国事。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90年代的主要任务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到本世纪末确保粮食总产量达5000亿公斤……农村改革要有新的进展，逐步建立完善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

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引下，农村改革的局面日趋生动，涌现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双层经营责任制、农村股份合作制等已超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范围，表现出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恩格斯说：用经济的进程逐渐刺激人们的醒悟。

在实践中，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在逐渐克服传统的固守不变的心态，去适应万事万物均在变化之中的哲学。人们已经认识到，过去固守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荒唐而愚昧；今天，固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同样带有刻舟求剑的意味。

这种习惯势必养成趋同稳定的惰性，养成固步自封的作风。

埃德加·斯诺说过：“我不能贸然自称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国却已承认我是她的一部分。”

韩丁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把整个身心融于中国人

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无论是在顺利之中,还是面临困境,他总是思中国之所思,念中国之所念,表现出了他那高度的责任感和忘我的奉献精神。

# 魂系彩虹

朋友们，朝着太阳奔去吧！  
为了人类的幸福之花快点开放！  
挡住太阳的树叶能怎么样？树枝  
能怎么样？——拨开它们，向着  
太阳，努力奋斗吧！……

——《黑格尔书信集》

有人把中美友谊比作色彩斑斓的彩虹，那么，韩丁应该是这彩虹的架设者之一。

1987年，正是百花争艳的仲夏，太行山以她的纯朴和热烈迎来了以韩丁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学教授、苏联问题专家朱伟尔·皮特博士为团长的美国特别旅行参观团。

这个参观团有37人，其中有教授、教师、工程师、作家、记者、律师、出版商、广告商、社会顾问、木材加工商等各方面人士。他们是结束了在苏联的参观旅行之后，取道蒙古到达山西，经大同、太原、大寨到达长治。

韩丁穿一条牛仔裤，白色上衣，1米82的个头在整个队伍中如鹤立鸡群。他满头银发，神采奕奕，步履矫健，无论如何也难以看出他已是68岁高龄的人了。

他向记者说：“我这次来特别高兴，因为我带了37位美国朋友，一齐来到张庄，我的第二故乡，让他们都亲眼看看这里的变化，真正接触到最基层的中国群众，了解中国国情，观赏大好河山，共同为中美友好而努力奋斗。”

韩丁激动地用英语向随行的朋友们说：“中国有句古语，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一句话说得朋友们都乐了。韩丁把张庄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把金红等张庄人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他用汉语说：“我来张庄，就象你们中国所说的走亲戚、回娘家。”他又对自己的美国朋友说：“我与中国的关系，可以用一句中国的比喻，就是‘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

第二天，韩丁一行开始了在长治市的参观，下午来到了位于市中心的英雄台集贸市场。对于这里，韩丁记忆犹新。1947年，太行区第一个群英会在长治召开，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专门在这里建立了一座主席台，当时在场的以《漳河水》闻名的作家阮章竞提议把主席台取名为英雄台。就在这座英雄台上，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领导人号召全区军民向来自各地的生产模范、支前英雄学习，宣布了给予一等模范李顺达一头黄牛的奖励。

几十个春秋过去了，韩丁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记忆中的景象了。他和他的朋友随着人流走进了市场。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集贸市场。中国朋友说，这里有上千个摊位，大多数是简易柜台，棚布遮日，早上出摊，晚上收货，从业人员大多是个体经营者。当韩丁一行来到时，尽管数以千计的买卖人正在忙于招呼自己的生意，人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对美国朋友的光临报以极大的热情。

一个卖黄瓜的小贩的富有韵律感的吆喝声吸引了来自夏威夷的美国老太太，她轻轻拿起一根黄瓜，仔细地端详着上面细绒绒的毛刺，金黄的花芯，连声称赞：“新鲜、新鲜。”

小贩通过翻译告诉美国朋友，黄瓜是半小时前刚从菜地里摘来的。

美国朋友说，这在美国很难做到。

韩丁和他的朋友来到卖凉粉的摊点前，农民个体户告诉韩丁，他家在附近的壶关县一个偏僻小村，以前很穷，从1984年以来，政策好了，他出来卖凉粉，每年收入

两千多元，自己家有了电视机、摩托车。

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韩丁和经营小百货的一位女商贩交谈起来，她告诉韩丁，她来自江苏省常州市，开始提个小包包摆地摊，卖针线，三年过去了，现在有资本上万元，自己开了个小商店，还担任了长治市个体劳动者协会主任。

韩丁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他的同行者说：“集贸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为农民走向富裕打开一条宽阔的道路。”

同行的艺术家帕米·兰西·艾德维娜女士在市场中心被一个卖提包的商贩吸引了，那商贩从上到下浑身挂满了提包，仿佛是个提包架子，五颜六色的提包形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柱体，只有从那露在上边的发辫上可以看出是个姑娘。

艾德维娜女士问那姑娘：“你的货是公家的，还是个人的？”

姑娘告诉她，这个市场所有摊点都是个体经营。

艾德维娜女士围着姑娘绕了两周，从中挑选了一个旅行包，付给姑娘 20 元钱。她对身边的丈夫说：“这里要啥有啥，比苏联的市场好得多，就是美国市场也难得如此的繁荣。”

傍晚，长治市政府设晚宴招待韩丁一行。当翻译把年轻的女副市长闫爱英介绍给美国朋友时，他们几乎都站了起来，有节奏地拍起手来。韩丁用汉语向他的朋友说：中国妇女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



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她们吃苦耐劳、勤奋，在中国各级政府中都有女官员，在美国还不行，只有两个州有女官员。

简·罗森纳夫人伸着大拇指连声说：“密斯闫，是这个！”

七十一岁的美籍华人刘玉昆女士，祖籍广东中山县，生长在夏威夷，做工会少年儿童工作。她说，我曾两次到中国，看到各地都有妇女当官掌权，很令人羡慕。在美国，妇女可以搞科研，当作家，但作官很难。

韩丁一行在长治市参观途中，到处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在张庄村妇联主任李巧灵为美国朋友设的家宴上，玛丽小姐问主人：妇联会做什么的？又问起她的恋爱、家庭，宾主说得火热，象拉家常一样，笑声不绝于耳。

置身于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浮想联翩。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朋友，这些纯朴而又好客的太行人是否想到为了能有这样的交往，这样的融洽，这样的和谐和欢乐，曾有多少人，付出了多少心血呢？

韩丁是其中的一个。

他始终把联结中美友谊的彩虹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不畏艰难，顽强斗争，用汗水和心血铺设通往成功之路。

如果我们要书写中美友谊之歌，难道不应当为他留下一页吗？

早在中美处于冰冻的岁月里，韩丁被列入了受监视者的名单，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以至于面临无安身

之地的威胁，仍不屈不挠地为中美友谊奔波。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韩丁年迈的母亲整日为儿子的处境惊惶不安，又为身在中国的女儿寒春担忧。

韩丁没有为高压所屈服，他到处发表演讲，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年多里，在全美巡回演讲 300 多场。

韩丁以生动感人的演讲吸引了众多听众，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人们纷纷向他捐物品，提供汽油，把一张张钞票投进他放在地上的帽子里……韩丁以演讲作武器，揭穿当局对中国宣传的不实之词，传播关于新中国的真实报告。他四处奔波，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人们称他是“街头演讲家。”

本世纪七十年代初，冻结达 20 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开始缓解。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大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从此，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前，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起来。

1972 年 2 月 27 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

上海公报的发表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周恩来总理就“上海公报”答记者问时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但是，今后的路还很漫长而曲折，需要中美两国人民继续做出艰苦的努力。”

韩丁像许多美国朋友一样自觉地致力于这一伟大的

事业。中国之行一结束，就投入了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工作中。

像十七年前那样，他充分发挥自己演讲的才能，向各界人士宣传介绍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为了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韩丁把周恩来与自己的谈话整理成书，以《与美国人的谈话》在全美发行。

为了使美国人全面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着手撰写《翻身》续篇《深翻——中国一个农庄的继续革命》。在这部书里，他计划通过张庄1945年到1971年的发展史，告诉人们中国农民进行合作化的成功和挫折、经验和教训……

为了促使中美友好事业的发展，1975年，他发起并积极组织成立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并被推选为协会主席。

在韩丁的努力下，美中人民友好协在短短五年内发展了数以千计的会员，建立起72个地方分会，创办了会刊《新中国》，并不断开展大量积极有效的活动。

周恩来总理指出“文化和经济交流是外交的两翼，派艺术团作为开路先锋出访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既容易使对方接受，又可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根据这一指示，1975年5月，中国艺术团决定出访美国。消息一公布，立即在纽约引起了轰动。按计划，该团在纽约只演四场，全部座位只有八千多个，一时间门票成了热门货，许多人望眼欲穿地盼望得到一张门票。

出乎所料，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官方取消了中国艺术团访美之行，理由是艺术团演出的节目中有一首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这一决定使那些对中国艺术抱有热切盼望的人们失望了，象一盆冷水浇在了红热的钢锭上，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反感和愤慨。中国艺术团被取消访美之行的次日，韩丁代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在华盛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从这首歌来讲，抒发的是中国人民怀念台湾同胞的感情，并未牵涉到美国，而美国当局却横加干涉，连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干涉起来，对此我们表示抗议。

就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韩丁当场宣读了拍给国务卿基辛格的质询电。

随后，韩丁以美中友协纽约分会的名义，举办专题演讲。演讲会于5月16日晚，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离预定开讲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礼堂里已座无虚席，不少人只好站在走道上或前厅里。在韩丁以往举行的多次演讲中，前来参加的多数是美国人，而今天却一反常规，许多中国人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听讲，而其中十分之九的中国人又都是从台湾来的，有年长的老者，也有青年男女，他们急匆匆地赶来，一进门就问开讲了没有，生怕误了似的。

演讲会的主持人之一是著名教授林达光，任加拿大麦其尔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他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分析台湾和美中关系后说：美国今年流年不利，基辛格斡旋中东问题一筹莫展，美国在东南亚各条战线上，又节节

败退，此次无理阻止中国艺术团，是他们方寸乱矣的一个例证。然而此举不仅没有争到面子，反而失去了威信，因为全世界都看到了他们在上海公报面前不守诺言。

演讲会沉浸在一派激昂的气氛之中，特别是那些台湾来的朋友神情专注，群情激愤，他们推举一名代表，真挚地向全场致词：我们都是从台湾来的，今天我们偏要高声演唱这首歌《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我们认为这首歌是唱给我们的，这首歌的感情，也就是我们的感情，而歌词所说的也正是我们所要说的……

接着，他们从心底里唱出了：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

1975年10月，韩丁率美中友协代表团访问中国。

10月10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丁一行。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宽敞的会客厅里荡漾着热烈和谐的气氛。邓小平，这位在中国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几经沉浮的巨人，迈着沉稳刚健的步伐向韩丁走来，就在两双手相握的一瞬间，韩丁隐隐觉察到这个伟人超凡的气势和内在的韧力。

邓小平总理高度评价美中友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说：“你们是中美友谊之桥的架设者。”

回国之后，韩丁在芝加哥主持召开美中友协第二届年会，600多名代表围绕怎样使美中友协成为一个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展开了热烈讨论，针对中美联合公报之后，美

国政府依然在台湾保留军事和政治力量,并允许台湾在美国增设五个领事馆等问题,大会决定就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展一个全国性宣传活动;针对美中友协主要是白人和中产阶级参与,大会提出建立新的南部地区分会,增加少数民族和工人阶级成员;降低会刊《新中国》的价格,以便使更多的贫穷人民可以较容易地购买。大会指出,为了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而斗争,是美国人民的友好愿望。

这次大会取得了重大成就,它标志着美中友协将深入到劳动人民中间,成为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群众性组织。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1月15日,韩丁带领全家从费城赶往华盛顿中国驻美联络处,参加吊唁活动。两位记者听了韩丁短暂而深情的谈话,感慨地说:“他和周恩来的感情太深了,也足以可见周的伟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了。10日,韩丁在费城接受了香港记者对他的电话采访,他说,毛泽东主席的去世对整个世界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他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不仅在中国范围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毛泽东是无人能及的。他说,毛泽东不仅创造了中国革命,而且把革命不断推进。发动一个革命困难,把它推向前进更难。但是,毛泽东完成了,这个成就不仅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可贵的。

10月,韩丁在美中友协纽约分会会刊《中国和美国》上发表《纪念毛泽东》长篇署名文章。文章生动地回顾了

他在 40 年代与毛泽东会面的场景。

文章写道：毛是一位专心致志地听别人谈话的人，我当时对此感到意外。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应该这样的。因为，毛早期就教导所有革命干部要进行调查研究，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本人在青年时代及往后一段时间里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各地转，同人们交谈。他每到一处，就召开调查会，通过这些会，他获得了能够据以进行分析和领导的广泛的实际知识。毛泽东乐于向所有的人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所具有的第一手知识。他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很明显。格里和我都不是什么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人物，而是美国的两名各有自己的社会经历的好心的青年。对毛来说，这就够了。他把我们看作是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的来源，用了大半个下午同我们友好地交谈。

韩丁在文章里写道：当毛指出，首要的目标是摧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不是侵犯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侵犯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使每户农民马上就富裕起来时，绝大多数人几乎立刻认识到，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他们强烈地感到如释重负，同样强烈地感到个人对毛的感激的心情，因为毛那样清楚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本质。

我了解其他干部的心情，因为我参加了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并且希望工作顺利，我有同样的感觉，好似毛从我们背上搬走了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我们能够直立起来了，远望整个地平线，追溯我们走过的曲折道路，接着的

是我们现在必须大踏步走的笔直的康庄大道。毛不是把我们看成不称职的人，不能进行有效工作的人而摒弃我们。他鞭策我们承担更大的任务和像他所能做到的那样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一种令人深受感动的体会，凡是经历过的人都无法忘怀。

毛决心献身于人民的事业，这种决心产生了使他能掌握现实的客观条件。此外，他是从一开始便参加有组织的改造世界的事业的，也首先是作为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一员，以后作为主要领导人，能够在实际斗争中集中亿万人民的经验，进行总结，得出结论作为行动的纲领，在实际斗争中检验这种纲领，使这种结论更加完善，然后再把它们付诸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斗争——团结，团结——斗争，这种过程贯穿他的一生。

毛当然具有伟大的天才，但是，不是单靠天才，而是天才同深入到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每条街道和村庄的伟大群众运动相结合，从亿万行动起来的群众的经验中吸取他们行动的教训。毛的思想是中国人民几十年革命经验的结晶。它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把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在著作中总结的世界工人阶级所有革命斗争的经验应用于中国。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对吸取经验和理解它的意义起了很大的作用。毛在这方面是能够精通地发挥和运用的。

在我看来最了不起的是，毛泽东生在上一世纪结束的前夕，他在理解世界和领导亿万人民改造世界方面，不只是在革命的一个阶段，不只是在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



而是在革命的几个阶段,在世界形势发生几次大变动的时期,经过本世纪中叶而直到今天,都起着如此关键性的作用。

毛不仅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而且立即投入社会主义革命。他使这场革命在经济上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从未取得过的成就。

中国高层领导者的离去,意味着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出现,美国政府着手研究新的对华政策。美国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对此见解纷纭,斗争也日益激烈。

爱德华兹委员会在50年代曾以“院外援华集团”闻名,实质上长期支持台湾政权,却又表现出一个不偏不倚、公正客观的假象来。1976年11月底,爱德华兹委员会召开会议,议题是“毛泽东逝世之后的美国和中国”,声称要对局势进行所谓客观研究,寻求最佳方案。

韩丁识破了爱德华兹委员会的实质,认为有必要对其揭露和斗争。他领导美中友协发起,联合全国黑人妇女会议、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等12个团体举行全国会议,表明了与爱德华兹截然不同的态度,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美国新政府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从台湾撤军,废除1954年签订的防御条约……

1977年2月28日,上海公报发表五周年。美中友协全国总会开展全国性群众活动以示纪念,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发展。

经过了近10年的风雨,无数中美人民前赴后继的努

力,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史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中美正式建交了。

在那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里,多少人高兴得彻夜难眠,奔走相告。韩丁和几位朋友喝醉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豪饮。

韩丁抓住一切时机开展中美之间的各种交往活动。此次率团来访就是其中一个项目。

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韩丁一行驱车前往距离长治市50公里的黎城县,游览闻名遐迩的黄崖洞。

黎城县是革命老区,早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左权、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领导军民与敌人浴血奋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出黎城县往北约20公里,有一座黄崖山,山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黄崖洞,1941年11月,就是在这里发生了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

韩丁透过车窗兴致勃勃地欣赏外面的山色,由近而远,先是青黛,后淡绿,再浅蓝,直至和远天的云翳融为一体。韩丁入神地观察着那山势,荡起联想的飞舟,那山势有的似倚天玉柱,有的如骏马昂首,有的像大鹏展翅……她展示了太行山的气度,是雄伟的,又是灵秀的,既有北方大汉的粗犷,又有南国少女的柔情。

沿着崎岖的山路,韩丁和朋友们奋力攀登。往前走,山越来越险,齐如刀削斧劈的峭壁,从南北两面夹挤过

来，遮天蔽日，威严峻逸，举目仰视，见蓝天似线，这就是进山的唯一通道——瓮圪廊。

陪同韩丁游览的中国朋友告诉韩丁，当年黄崖洞保卫战的第一道防线就设在这里。我们的小号手崔振芳同志一人把关，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八路军就是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地势，在这里创建了当时规模最大、最早的一个兵工厂，年产武器可以装备 16 个团。

从廊口涉溪而行，韩丁忽然听到水声哗然，转个急弯，只见一挂飞瀑银练，直泄而下。再往前走，山势豁然排开，环目四望，见山林泻翠，野花飞红，举目往北望去，迎面悬崖千仞，峭壁如削；山崖半腰，于云雾缭绕之中有一个天然崖窑赫然洞开，这就是黄崖洞。

韩丁一行被深深陶醉了，这不仅是因为这里有奇峰险岭，也不只是因为她有许多富于诗意的传说，更让他们陶醉的是那无数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在这里写下了朴实、壮美、博大精深的诗篇。

在这里，韩丁听到人们讲述的关于朱德、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件件往事；看到了左权将军结婚时的小石屋；寻觅到了朱德和战士们一齐打篮球的那块平台……韩丁思潮奔涌，势血沸腾，不觉哼起了他还记得的那首歌：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澧陵县，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

韩丁对同来的长治市外事办主任任志常说：“我曾在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鸟瞰巴黎，我曾在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上漫步……然而，可以说，没有一处能够使我如此激昂；置身在这里，我不由得记起了当年在太行山的日日夜夜。”

韩丁感慨万千地说，计划继续组织美国青年来这里参观，让他们也来这里了解一点中国革命史。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洒在万山丛中，韩丁依然游兴未尽。踏上归途，他欣然命笔，写下了《游黄崖洞》一诗：

云凝屏障似堡垒，  
风伫红旗若磐石。  
鬼斧神工，  
辟此峡谷小径，  
砍此峭壁平台。  
半山腰间，  
山涧淙淙。  
这是八路军兵工厂的旧址，  
这是藏在太行山深处的宝藏。  
如玉引入，  
比金珍贵，  
锤炼的炉火曾在这里燃烧。  
峭壁一端，  
石垒羊工小屋，  
几尺见方，高不过人，  
这是左权将军的指挥部，  
联络，开会，  
都在这方寸之地。

将军削瘦的身躯，  
穿着破旧而不合身的军装，  
他焦急地等待着，  
年轻战士血写的捷报。  
他们扼守着通往黄崖洞的峡谷，  
眼如利箭，  
逼视着远方的墙垒，  
警觉的耳朵，  
听得出每一块卵石滚动。

二十对五千，  
七天又七夜，  
潺流中号手倒下，  
号角声回荡天际，  
清泉冲刷敌尸，  
污血染红小溪。

脚步无声，  
尸塞峡谷。  
处于险境的兵工厂暂得拯救，  
陈旧的机床依然飞转，  
直到敌人从另一条被出卖的  
小径袭上来。  
饱尝战火的世界啊，  
数不清的亡灵，

战火延伸到珍珠港，  
在备受折磨的地球另一边，  
站在太行山上，  
岂不见人类理智失控后酿成的灾难。  
小溪渐渐变暖，  
莫不闻小号手那如啸的号角？

在左权将军遇难的小屋前，  
我默默肃立，  
脱帽，致敬，心在动荡。  
湖南兄弟，  
太行人民。

# 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

一个光荣的中国农民和一个美国农场主，没有顾及种族和文化的差异，一起走在大地上。

——美《读鹰报》“一个中国农民在美国”

韩丁拉着金红的手沿着那深红色的地毯走上那架北京飞往纽约的 918 次客机时，位于太行老区的《长治日报》发出一则新闻：农民王金红应他的美国朋友韩丁的邀请赴美观光考察。

金红仿佛步入梦境似的，怎样走出大山，来到北京，如何穿过候机室大门……一切都像云里雾里一般。

小时候，他放羊拾粪，正沿着田埂漫步，突然间听到一阵隆隆的轰鸣，猛抬头看到蓝天下飞机的影子，于是就追啊，跑啊。

那时候，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有朝一日坐上飞机也上天。

今天，却变成了现实。

要不是韩丁一再相劝，他无论如何下不了这个决心。“一个中国老百姓，有啥资格漂洋过海出国开眼？”

韩丁却不这么认为：“你应该去看看我们美国的耕作方法，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见多才能识广……”最后韩丁还加上一句：“这次你去美国的一切费用我全包了。”

王金红理解韩丁的心情。他也知道韩丁为了请他去美国费了多少周折。

韩丁为了此事曾多次向金红所在的省、市领导同志提议；给北京的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同志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临到办理手续，他亲自跑中国外交部、美国驻华大使馆。恰巧驻华使馆有个领事级外交人员是韩丁的学生，



老师找上门来，自然要顺畅得多，不用排队，一路畅通，很快为金红拿到了签证。

飞机在浩瀚的云海中穿行。

韩丁一只手轻轻搭在金红的臂膀上：“我们飞到纽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太平洋上空，下边已是日本海了。”

金红遥望窗外，见云涛滚滚，雾海茫茫。这世界太大了，而这世界又如此之小，几个小时就可以横穿半个地球，比当年从黄碾镇往长治城送一趟煤还快。

他仍然没有排除仿佛失重似的晕眩。他自己清楚，他不属于天空，他属于土地，那生于斯，长于斯，深深扎着他的根的土地，土地使他踏实，使他平静。而现在，置身在天空，他一时无从寻找平衡的基点。

韩丁的心也难以平静，不是因为升空飞行，这种旅行，对于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之所以不安，是因为这次回国请了他的中国朋友王金红，这是他多年期盼的一件事。在他看来，金红不仅是他个人的朋友，而且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典型代表，能带金红到美国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

韩丁不时地向金红讲解航空旅行常识，回忆他在以往的旅程中发生的故事，迫不急待地向金红谈论他们这次在美的活动计划。韩丁心里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尽一切力量驱赶金红心中的陌生感和寂寞，让他快活。

一阵强撼的振动。

918次班机到达纽约上空。

“各位旅客，本航班按预定时间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

机场，现在是纽约时间晚上 10 点 45 分，请各位做好入关准备，飞机正在下降，请系好安全带，谢谢合作。”

韩丁两只厚而大的手紧紧握住金红的手：“到了，到我们美国了。”

金红从那微微颤动的双手上感到了韩丁的兴奋。

就在飞机降落时刻，金红向窗外猛然一望，不由得“啊——”了一声。

脚下哪里是一座城市，分明像是一望无际的火海，而且是熊熊的烈火，把飞机的翅膀都映得通红，整个天地都是通红的，——那是灯的海洋。

“这……多么费电。”金红不解地转过头来望着韩丁。

巨大的波音 747 继续下降，像一只小小的飞蛾不顾一切地向那无边无际的火堆扑去。渐渐地，那火堆变成了晶莹的透明的光的世界，就像传说中的仙境一样。

金红目不转睛地向前望去，一排排通明透亮的巨大无比的楼群显现出来，像一座水晶宫似的；一条小道路显现出来，像黑色的缎巾上一串串精美的项链；纵横交错的道路闪烁着无以计数的亮点，就像夜空里的星光一样。

韩丁突然扶着金红的肩膀，用手指着窗外说：“自由女神！”

顺着韩丁的手势望去，远远的看见一尊高大无比的雕像，右手执着火把，高高地举向天空。她面向大西洋，身靠曼哈顿，像是在欢迎到来的人们。

飞机一个俯冲，发出一阵震颤，伴着刺耳的呼号，轮

胎与地面“吱”的一声接触在一起，落地了。

金红懵懵懂懂地跟着韩丁走下飞机，展现在面前的，是肯尼迪机场，大得叫人摸不着头脑。

韩丁告诉金红：这里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落。

然而，让金红奇怪的是，如此大的机场却井然有序，不知是什么办法。从世界各地涌来的人们，操着不同口音，说起话来都是那么和气。即使有人不小心发生碰撞，马上用各种不同的口音说：“I'm sorry”（对不起）。

金红随着韩丁走进候机大厅，里里外外灯火通明，电子指示，电梯纵横，电视密布。

“太费电了。”王金红不由自主地嘟囔着。

随着缓缓的人流，金红跟韩丁走出了大厅，上了一辆铮光瓦亮的轿车，向市区驰去……

第二天一早，王金红随韩丁向他的农场所在地宾夕法尼亚州出发。

出了纽约市，汽车奔驰在广阔的平坦的高速公路上，路面宽度大约可并排行驶8—10辆大汽车，黄白两色的标志线分外清晰，公路两旁的绿化带像是绿色的城墙，把公路夹在中间，茂密的树木下边是绿色的草地。

半个多钟头以后，公路两旁的景色渐渐变化，建筑物不再像纽约那样高矗入云，大多都不太高，特别是一些工厂的厂房盖得很矮，同纽约的摩天大楼比较，给人截然不同的印象。

韩丁告诉金红，现在正行驰在新泽西州，这个州是通

过独立战争，最初组成美利坚的 13 个州之一，目前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州，以炼油业为主，各炼油厂每天消化原油几百万桶，化工产品在全国各州居首。

汽车穿过新泽西州。

“前边就是宾西法尼亚州了，我的家乡。”韩丁透过车窗向外眺望，脸上跳动着愉快的光彩，他指着那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对金红说：“这是美国的一个大粮仓，有很多地，和中国的东北相似，但气候有区别。”

汽车奔驰，一座座工厂和小镇不断从两旁闪过。

汽车驰入哈里斯堡。

“这是一座小城，人口不过十万。”

出哈里斯堡，眼前一片清新爽目的自然景象，落了一夜的雨和雪，新造成的天然景观分外动人，雨和雪，溶化、冻结，树上、山上、房屋上、野草上，都披上一层散碎的冰花。远远地看见一片丘陵上闪出一片建筑群。韩丁兴奋地从车座上弹起来指着前方说：“金红，到家了！”

金红朝着韩丁手指的方向望去，丘陵半腰，有一座古老的、别墅式的小楼，周围有一些其它建筑物。

汽车刚刚驶近宅院，韩丁的家人可能是从窗子里发现了来人，一阵风似的涌出门来。

金红刚刚迈出车门，就被人们团团围住。

韩丁把金红介绍给自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的中国亲戚，王金红。”

他转身向金红介绍自己的母亲。

“这是我妈妈。”韩丁扶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老人

精神饱满，一双慈祥的眼睛闪着热情的光。

金红刚刚坐下，韩丁的妻子端上来已经煮好的咖啡，随后送上一些食品。

韩丁关切地问金红：“你是不是要喝茶？”金红摇摇头，憨实地说：“喝点开水就行。”

韩丁说：“要求太低了，低消费是你们的光荣传统，也是一种保守。”

金红却说：“我觉得还是习惯，人的习惯往往很难改变。”

交谈之中，餐桌上摆上了菜，韩丁的母亲取来一瓶酒正要开启，韩丁摆摆手：“不要喝这个，喝中国酒。”说着转身从厨柜里取出两瓶山西汾酒，打开盖子，房间里立即泛起一阵清香。

金红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随着一阵热流的涌起，金红心里激起一种强烈的感慨：转眼之间，自己已经坐在地球另一面的餐桌上，而自己却又端着家乡的酒，真是难以想象。

饭后，韩丁安排金红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地板和四壁都是木质装潢的卧室，简单而又方便，躺在松软而宽大的床垫上，金红却怎么也难以入睡，多少年来，韩丁的农场对金红来说一直是个谜，他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助手的情况下，经营着 120 公顷土地，合中国 1800 多亩，所种玉米，平均亩产 450 公斤，而他一年只劳动 150 天左右，每个劳动日平均生产玉米 5000 公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金红现在又考虑起这个问题，不由得起身下床，向门外走

去。

春光明媚，和风习习，住宅四周一片温柔的田园风光，绿树葱葱，田禾似浪，金红顺着一条宽敞的田间公路向前走去，爬上一座小山坡，举目四望，在边界林带之内，好大好大的一片土地，仿佛是漂在波浪上的一大块带有整齐条纹的丝巾，这丝巾又被雨雪点缀上漫散的白色冰花，是那样瑰丽动人。金红心里想：这恐怕就是韩丁的1800亩宝地。

突然一阵隆隆的马达声划破了旷野的沉寂，金红一转身，见韩丁驾驶着一辆庞大的机器向这里驶来，一会儿，便在金红的身边停了下来。

“怎么不休息了？”韩丁坐在上边仿佛坐在一座小山上。

“睡不着，你呢？刚到家就干活。”

“请你看看我的家当。”韩丁一伸手把金红拉上了驾驶室。

一阵轰鸣，拖拉机向田间驰去，韩丁用手一划：“从山顶朝南，边界林带之内，这1800亩土地，就是我的农场。”

“这么大片土地，就你一个人是怎么忙活的？”金红不解地问。

“春天，我就是这样，用这台大型播种机播种，所有土地顶多需要20多天，这是我一年的第一次劳动。”

韩丁说着停下机器，跳下来，指着播种机的各个运动位置给金红介绍它的性能。金红入神地听着，用手试着操作，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那么田间管理呢？”按照金红所理解的，播种后的劳动量很大，要间苗、锄草、施肥，还要防虫防病、防旱防涝，这些劳动比起播种要繁重得多。

韩丁弯下腰，从土里抓出一把刚刚播下去的种子说：“在播种的时候，我已经把适量的化肥、预防虫害的除虫剂、防止杂草丛生的除草剂，跟种子一起混播下去，这样就基本上不用田间管理了。”

金红明白了，他是把播种、施肥、除虫、除草一次完成。“可是总得浇水、排涝吧？”

韩丁说：“这一点，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雨量充沛，而且分布均匀，一般不用灌溉、排水，这一点和张庄大不一样。”

韩丁和金红两个人，坐在驾驶台上一边播种一边聊着，转眼间，夕阳西下，火红的晚霞把整个田野映得灿烂辉煌，韩丁拍着金红的肩膀说：“金红，怎么样，这样的农业生产是不是才叫现代化？”

“的确是高水平。”金红赞许得连连点头。

晚餐，地道的西式菜，金红感到很不是滋味。韩丁看出了问题，开玩笑地说：“这东西，开始吃起来不对味，越吃越爱吃。对于中国来说，西方的许多先进技术也是这样，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要适应就得敢于尝试。”

夜很深了，韩丁和金红还在交谈，他们的谈话是那样亲切，内容是那样广泛，从美国历史到现代衣食住行、风俗习惯……

金红一觉醒来，朝阳已透过窗户映在他的脸上，转身

找韩丁，已不见踪影，金红穿衣出门，远远地看见韩丁正在操纵一架大机器。金红走过去。

韩丁说：“金红，这就是我的最新型的收割机。”说着跳上去，一踩油门，轰隆一声，那庞大的机械运行起来。韩丁招呼金红跳上去，大声向他介绍着每个手柄的作用，随后把金红让到驾驶座上。

金红没想到这庞然大物操纵起来竟然如此灵巧，一会儿便得心应手了。

韩丁笑着说：“怎么样，保你不用一小时毕业，成为一名合格的收割机驾驶员。”随后又说：“越是先进的东西，操纵起来越简便，这是一种规律。”

韩丁给金红讲解这种收割机的运行程序，是怎样采下玉米棒，又是怎样脱粒。然后带金红走进一座筒状建筑物，说：“这是玉米烘干器，这烘干器仿佛一个储油罐。”韩丁又说：“收割机脱粒下来的玉米经过传送带进入烘干器，烘干后，经过螺旋型传送，自动送进仓库，这个全过程，只需开动一下电门就行。”

韩丁带金红看了他的粮仓，这里可以储存 800 多吨玉米。

金红现在终于明白了，韩丁是怎样实现平均每个劳动日生产 5000 多公斤玉米的。

午间的餐桌上，金红和韩丁谈的依然是关于农业生产的话题。

韩丁说：“美国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从农场的经营来看，多种经营的综合性农场逐渐



减少，生产某种单一产品的专业化农场迅速发展。因为专业化所需机械化简单，所需劳动力较少，经营管理比较方便。大量农场专种棉花，或者专种小麦、水稻，我主要种玉米。”

韩丁说：“在美国，1500亩以下的小农场几乎都被大农场吞并掉了，我的1800亩的小农场处在被吞并的边沿上。”

金红惊异地望着韩丁：“那么，像你这样的家庭在美国算一个什么水平？”

韩丁笑笑说：“根据阶级划分的方法，我应该算个下中农！”

说完，两个人相对笑了起来。

韩丁说：“不要只看到我的农场大，机械化程度高，风险也大，我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虽然强，但对市场风云难以对抗，一旦出现危机，我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彻底破产，变为一无所有。这是由美国的社会制度决定的，这一点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有好的社会制度，只要引进先进技术，农业的前景一定很宽广。”

韩丁告诉金红，美国农业机械化是在1910年到1940年期间基本实现的。目前全国农业生产，除烟草、上市的水果、蔬菜等项技术生产使用手工劳动较多以外，各种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如小麦、玉米、棉花、大豆、水稻等从播种到收获、入库的整个过程使用机械，没有多少手工劳动。农场的规模越大，机械化程度越高，手工劳动越少。

他说，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每个农业劳动力提供

的商品粮逐步增加，每个美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的产品，1930年供10个人需要，1959年供15个人，1970年供40人，现在可供100人。

韩丁说，美国农业机械化之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农场总数变化不大。194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给农村带来很大震动，1940年到1970年，30年间，一些资本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农场在城市银行资本的支撑下，根据弱肉强食的原则，一口吞并了300个农场。30年间，全国每个农场平均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以上，这就是竞争和兼并。

他说，美国农业，同工业一样，面临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荒谬的矛盾”。一方面，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人营养不良，衣食不济；另一方面，大量的农产品找不到市场，多次发生生产过剩，农产品大量积压，仓库里粮食堆积如山，卖不出去。从30年代起，美国政府农业部执行一项任务：强制性地压缩农作物种植面积，压缩农产品产量，压低农业生产。严格限制种植面积。从而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在很多地方，耕地一般一年只种一次，有些土地每隔二、三年才种一次。大量可耕地无人过问，畜牧场一般是地广牛稀，有些地方，二三十亩地才养一头牛。

金红从韩丁的讲述里，明显感到了韩丁对美国农业的一种悲观情调，站起来问道：“老韩，你每年只用100多天务农，那么其余时间都干什么呢？”

韩丁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仿佛一下子兴奋了起来：“搞副业！”

“副业？”金红不解地问。

“是的，我把其余的时间都用在了我感兴趣的问题上。”他说，他每年三分之二的的时间用于社会调查、写书、演讲、作报告、旅行参观。现在他又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聘请，还任中国农业部顾问，每年要走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下了近几年写作的几本书，《翻身》、《深翻》，还有一部正在写作中的书稿，他说计划叫作《分山》。

韩丁兴奋地说：“金红，这三部书都是以你们张庄为背景，张庄的乡亲们给了我丰富的素材，我非常感激你和张庄的百姓。”

韩丁沉思了一会儿说：“说老实话，我从事农场工作的目的，不在于玉米从450公斤提高到500公斤，我的追求是研究美国农业，把我从实践中认识到的，所想的，所做的，所要说的告诉大家，尤其是告诉中国朋友，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国问题关键是农业，农业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这一夜两人又谈了很久，谈话内容是那样广泛。临睡之前，金红问起了韩丁的家人。韩丁对他说，他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都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都有一个中国名字。大女儿韩琼就出生在北京，高中毕业后，1971年才回到美国上了州立大学，专攻绘画艺术，她喜欢编剧、拍电影，她曾跟随韩丁到中国住了几个月，拍摄了《高跷》、《中国乡村医生》等四部小电影，其中《高跷》在美国

获奖。二女儿韩立和三女儿韩娜，都曾在州立大学艺术系就读，儿子韩贵在州立大学医学专业毕业。

金红说：“四个孩子都上大学，你的负担可不轻啊。”

韩丁笑了：“金红，这一点，我们美国和你们不同，你们爱孩子是把他们捧为‘掌上明珠’，现在有个说法叫‘小皇帝’。我们不然，我对孩子的爱表现在注重培养其自主、自立的性格，使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来超过父母。我们这里的习惯，多数家庭，孩子从四五岁就和父母分床，七八岁与父母分房，给其独立的空间，养成不依赖大人的习惯，长到十二三岁，自己就开始在课余时间挣点钱零用，养成勤劳俭朴的良好习惯，从18岁生日那天，正式向父母宣布：我长大了。此后的生活，包括上大学的费用，都由自己负担，或至少负担一部分。我的孩子在大学期间就自己打工挣钱，韩贵课余时间在一家人一次可容纳1000多人的大餐馆跑堂，每天收入八九十美元。”

韩丁突然把话打住，沉思了稍许，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用中国的俗话说，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美国，我的生活不算富裕户，尤其是我爱人患病之后，每五个星期要把全身的血换一次，一次费用高达3000美元，我已贷了10万美元为她治病，在这里，平民百姓一旦生病，就是最大的灾难。

黎明把金红从梦中唤醒。他有些恍惚，现在是什么时候？美国的白天就是中国的黑夜，如果在家，现在刚刚入夜，可能正和老伴在家看《新闻联播》，也可能村委会开得

正红火……，几天时间，整个生活规律都改变了，韩丁说是生物钟要重新拨一下，说得轻松，金红总感到那么别扭，白天又困又累，怎么也过不来那股劲，晚上却毫无睡意。再就是饮食习惯，大冷天，喝冷水，还加冰块，简直是遭罪，还有那么一股特殊味道，说不清是香、是膻，到处有，韩丁说，那是香水味，更让他闷得慌的是语言不通，他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苦衷，一切都得看手势，用手势，自己活生生成成了个哑巴。

躺在床上，凝视着阳光透过窗口落在墙壁上一块金色的光点，金红脸上不自觉地泛起一丝微笑；美国人办法真绝！他想到昨天在韩丁奶牛场的所见所闻，奶牛场设在一个山坡下的一块空地上，不大的牛舍里圈了72头奶牛，看上去头头体大、背直、臀圆，毛发光亮。所有的牛一字排开，低着头不停地吃着饲料，这些牛何以如此守规矩？金红有些奇怪，向韩丁打听，韩丁指着牛头上部的一个装置说：这是低压电源，只要一抬头就触电，不让它们随便乱动，尽可能减少他们的运动量，另外在它的背后就是粪沟，牛粪顺着沟槽通过传送带一直送进山下边的地里。

72头牛，要在张庄得多少人忙乎！可是在这里只用两个人，一天生产2500公斤鲜奶。在这里，他们把饲料机械粉碎送入专贮塔，再通过搅拌机，输送带送到每个牛的嘴边，一切都是自动化。连挤奶也是把一排排挤奶器接在牛的肚子下，一按电钮就行了。

昨天上午韩丁自己开着小飞机去纽约，下午两点飞

回来，一下飞机就去牛奶场挤奶。真是马不停蹄。相比之下，金红生出一种自责感和紧迫感，我们张庄的每个成员如果都能像这样争分夺秒地奔忙，哪有不富裕的道理？

金红正思考得入神，韩丁走了进来，他兴致勃勃地说：“金红，我们今天去波士顿，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简单的早点之后，金红坐在韩丁驾驶的汽车里上路了。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波士顿，住在韩丁的外甥家。看得出，这里住房不太宽裕，晚上要睡觉了，韩丁安排金红睡在沙发上，自己睡在地板上。金红不依：“你比我年纪大，还能让你睡地板！”韩丁却说：“不，我个子大，睡沙发太委屈，这叫从实际出发。”说完，韩丁乐哈哈地躺下了。

第二天傍晚，韩丁带金红到户外散步。

韩丁就出生在这座历史名城。每当踏上这片土地，一种特殊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登上了这座城市的中心高地——灯塔山，山上有金色圆顶的州议会大厦，它始建于1795年，周围是可爱的老式红砖房子和像中国的故宫那样保存得很好的建筑瑰宝。

从灯塔山往下眺望，是景色宜人的宽广的波士顿墓地，蛙池附近的一棵榆树曾经用来吊死海盗、女巫和教友派信徒，近处是老谷仓墓地。

韩丁借着灯光指点着一处高矗的建筑说：“那是雅典娜的神庙，是波士顿旧时的文学圣地……”

韩丁越讲越兴奋，他的肚子里仿佛装着波士顿的整

个历史，讲到了老议会大厦前的波士顿惨案；讲到了在范纽尔堂，萨姆·亚当斯和詹姆斯·奥蒂斯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而导致革命爆发；又讲到了老北教堂，朗费罗写的关于黑维尔午夜驰马报信那不朽的诗句：“陆上来，点一盏灯，海上来，点两盏灯。”

波士顿昔日魅力永驻！

韩丁似乎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整个波士顿的辉煌都展示给金红。第二天一早，韩丁带金红去参观著名的科学博物馆和新英格兰水族馆。

科学博物馆的门面并不高大，里面却是那样恢宏，这里陈列着数万种农作物标本，从远古野生到人类培植，一直到现代最优良的品种，这里陈列的更多的是各式农业机械，农用化肥，除草剂等现代科学技术代表作，有的是模型，大多是实物。

金红仿佛走进了一个辉煌的宫殿，目不暇接，看什么也看不够。他们来到一架精巧的小型飞机前，金红正准备寻问它的用途，一位金发女郎飘然而至，短得难以再短的裙摆下裸露着两条雪白的腿，一张抹得鲜红的嘴向金红微微一笑，转身蹬上机座，随后招呼金红也上去，金红被韩丁扶着蹬上去，女郎轻轻一拉手柄，飞机轰地一声起动，向上升起，接着在空中旋了一圈，徐徐降下。金红走下飞机，女郎用英语向他解释什么，韩丁忙过来翻译，金红这才明白，这是农用飞机，可以用来播种、施肥、喷洒除草剂。

在另一个展区，韩丁指着一台奇形怪状的机械说：

“这叫摘棉机。”金红不由地在机器旁蹲了下来，仔细地察看。他发现这种机器有的装一排齿轮，有的装两排齿轮。

韩丁向他解释：装一排齿轮的一次摘一行，装两排齿轮的一次摘两行。

一位服务小姐走过来，把一份精致的印刷品递给金红，那是关于这种机械的说明书。

韩丁指着说明书上的图纸说，这种机械在开始摘棉花前，先向地里喷射一种药水，把棉枝上的叶子打掉，然后，摘棉机进地，机器在棉田里走过时，那个神奇的齿轮如同一双灵巧的手一样把棉花从壳里取出，据测算，一次摘一行的机器，每天每台机器可摘 15 英亩。

又一个展区，是水稻展区。

这里展出了水稻的整个耕作管理过程：拖拉机整地、机械灌溉、直播，就是不用插秧，直接把稻种播进地里。一种是用飞机播种，每英亩下种 110 磅到 125 磅；一种是用播种机播种。播种以后，通常把田里的水放掉，等种子发芽、长秧后再灌水。

田间管理，美国人的办法真绝，用除草剂除草，一种是在播种前把除草剂撒入土中，再一种办法是等草长出二、三片叶时，用飞机喷撒除草剂。

金红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绿莹莹的草叶在一瞬间枯黄败落，真像动画片似的。

展现在金红面前的收割过程，气势恢宏，康拜因仰头阔步开进田里，收割兼脱粒、烘干、进仓……

整个生产过程，在短短几十分钟尽收眼底。金红看得



目瞪口呆，连声称赞。

他们又走了几个展区，在优种培育区，通过现代化的电子模拟器，可以看到麦粒是怎样在适宜的条件下渐渐肿大，生出微细的毛根，形成胚芽……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金红入了迷似地从一个展区到另一个展区，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疲劳，直到韩丁提醒他应该回去休息时才发现天已经很晚了。

走出博物馆，韩丁问金红：“感觉怎么样？”

“你们美国人对农业生产新鲜点子是多，真开眼界。”

韩丁告诉金红：“这个博物馆已有 50 年历史，每天到这里来参观的人有来自各地的农民、工人，还有学生，大人孩子都有，美国人很注意了解实用技术发展史。”韩丁略一停顿，突然笑着说：“记得你们长治七月初一有个古庙会，人们在大街小巷拥挤得水泄不通，如果你们也办个农展馆，引得农民不要光是在街上转，叫他们到农展馆看一看新技术，能起多大作用啊！”

金红点点头：“这是个好主意。”

随后的时间里，金红又连续两次专程走进博物馆。波士顿当地的新闻记者闻讯而来，紧紧跟着金红问这问那，韩丁担任翻译，一一回答记者的问题，他向记者介绍说：金红是张庄的主任，是张庄的最高领导。

记者问：那他算不算是官呢？

韩丁说：不算，按中国传统还不够品位，八品才为官。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在随后的几天里，韩丁带金红走访了波士顿的五金

厂、面粉厂、印刷厂等企业。那么多新鲜东西，使他眼花缭乱，他的小本子记得满满的，还画了草图，他感兴趣的東西太多了。

近几年，村办企业发展很快，技术和设备问题越来越多，就说为太行锯条厂加工锯把这个项目，利润很不低，可是完全是手工操作，体力消耗太大，打磨工人每天要吸多少粉尘？这个问题一直是他思考解决的难题，今天，他一眼看中了这里的一种专用工具，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随后，他又发现了水泵扳手、木工曲线尺、磁铁探测器、木工打眼器、饲料水份测定仪、木工锯……这些多少年来他朝思暮想的東西，应有尽有，他真想把所有这些有用的東西都买下来带回家，无奈手中美元有限，也不便携带，只好挑选那些最急需的東西买，其它索取资料带回去。

第二天，波士顿的地方报纸《读鹰报》头版头条刊出金红与韩丁的大幅照片，并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农民来美访问”的文章。文章说：

“王金红是一个特殊的农民，他是应韩丁的邀请，带着张庄人民的祝福来美国访问的。他们到过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许多地方，其中有东部和西部的学校、五金店，农夫布朗的农场、砖场、水泥厂。

陪王金红一齐参观的韩丁告诉记者，王金红看见对张庄有用的東西就要买，这是中国一般干部不愿做的。

在布朗的砖厂，金红迷上了这里的烘干工艺，因为在张庄的砖场里，没有烧砖之前的坯是用太阳晒，一遇下雨

就很难正常生产，金红花费了很长时间，把这里的工艺图绘出来，带在身上。

文章最后说：韩丁在中国有四十年经历，在1971年以后的几次访问中国过程中结识了王金红。王说，他在认识韩丁之前，就听说过关于一个大高个子美国人的许多传闻。1971年韩丁去张庄看望王时，王被撤销主任职务，他们的友谊经历了不平凡的道路。

说到这一段故事，韩丁和王两个人都笑了，王说，那不是某个人的过错，是一段历史。

文章结尾写到：“一个光荣的中国农民和一个美国农场主，没有顾及种族和文化的差别一起走在大地上。”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金红，我们今天去滑雪，好吗？”韩丁考虑几天来过于疲劳，计划为金红调节一下生活的节奏。

“我只在电视上见过滑雪，从来没摸过。金红为难了。”

“凡事都是从不会到会，只要有信心。”韩丁鼓动金红。

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了滑雪场，韩丁帮金红穿好滑雪板，扶着他站起来，手拉着手慢慢往前滑动。

“这样，往左拐，右脚使劲，往右拐，左腿使劲，保持平衡。”韩丁一边比划，一边喊着。

金红摔了一跤又一跤，韩丁生怕他摔着，一左一右地紧紧跟随着。这情景引起了滑雪场上人们的好奇，人们关

切地注视着这两个亲密的朋友，猜测着他们的来历。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金红还真的能独自滑行了。

韩丁擦了一把汗，望着金红在雪地上缓缓移动的身影，脸上泛起欣慰的微笑。

夕阳把最后一缕晚霞沉入遥远的天际，璀灿的灯火燃起了又一个不夜天。

波士顿大学以简朴、热烈、坦诚欢迎这位来自中国的农民朋友。校长虽然年逾花甲，但是精神矍铄。韩丁向金红介绍说，这是一位著作颇丰，治学严谨，属于美国有突出成就的教育家之一。在他的带领下，波士顿大学在国内外影响越来越大。

校长对金红的到来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他认真地倾听金红的每一句问话，详细地给以讲解，尽管他们在思维方式，知识视野存在着那么大的差异。校长还不时地在黑板上用板书补充他的回答。从介绍中金红了解到，该校由科研部、推广部和教学部三大部分组成。他们办学的原则是坚持两个3：7，一是学校里搞推广和搞教学的教师3：7；二是每个教师搞教学和搞推广的时间是3：7，这样，教师既可以把最新的科研成果直接推广给社会，又可以把生产中新出现的问题带回来，作为学校新的研究课题和教学内容。

“看来，美国人很讲究学以致用。”金红赞赏地向韩丁伸起大拇指。

简短的座谈之后，学校专门为金红安排观看话剧《翻身》。

韩丁告诉金红，许多来美访问的中国朋友曾在这里看过这个剧，受到他们很高的评价。

这次演出由哈曼顿戏剧俱乐部承担，依然采用的是美国著名剧作家大卫·哈利根据韩丁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

9名演员分别扮演37个不同角色。

美国人干什么都考虑用最少的人办最多的事。

舞台高出地面约一尺，可以移动，面积不大，舞台下面的地板也被视为舞台的一部分。

舞台上没有帷幕，也没有布景，只有高举的几束灯光。

全剧25场戏，每场转换时，根据剧情用摇铃、打钟、切光，或呼唤等方式完成。

金红从记事起，在乡村谷场上，庙院里，城里的剧场里看过不少戏，那大多是中国的古装戏，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演法。

韩丁坐在金红身边注意到了金红的不解，笑着说：“金红，1947年我在张庄野地里的戏台上看过你们的戏，舞台比这复杂。”

正说着，一阵铃声，戏开演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舞台正中的那张中国地图。接着是画外音。

“故事发生在中国北京西南方向六百多公里的太行

山的一个山庄里，这个村庄叫张庄。”

金红的心激烈地跳荡，远在天涯，猛然听到对张庄的呼唤，不由涌起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

一个个金红所熟知的人物登场了。那些头戴毡帽或扎一条白毛巾，腰里系着草绳，脚上穿着圆口布鞋，背上背着褡裢的人是他的父辈；那些腰系皮带，头顶红星的是土改工作队的同志；那些扛着“三八”式步枪的是村里的民兵……猛一看，真想不到是外国人扮演的。

说理斗争，穿长袍的地主，手里握着长长的烟袋，开始还趾高气扬，说是他养活了穷人。后来在人们愤怒的呼喊声中，地主终于低下了头。

诉苦、斗争、分粮、挖浮财、地主收买不坚定分子，斗争趋于复杂化、扩大化、纠偏，工作队员、镇压坏人、宣布土地法大纲、发动青年参军、整党、犯错误干部做检查，一场接着一场，一环扣着一环，把全场观众紧紧地吸引住了。

全剧告终时，舞台上飘扬起巨幅红旗，一片欢呼声……，韩丁推了一把金红，他猛然从剧情中清醒过来。

就在这时掌声雷动，几乎把天花板震得幌动起来。长达两小时的演出，竟然没有一个人离席。

美国人竟然对中国革命也能有如此深的理解，对中国农民也有着如此深刻的关注。金红想到这里，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热浪。

演出结束，韩丁和金红一个作为原著作者，一个作为故事发生地的主人被介绍给在座的人们。剧场里立即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

人们欢迎金红讲话。他被掌声的浪涛推上了舞台，韩丁作为翻译站在了他的身边。有几秒钟的紧张，等掌声停息下来，他看到了从下边传来的一束束友好的目光，到美国以来，无论在街上、商店里，所到之处人们向他投来的都是这样的目光，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说什么呢？从哪说起呢？当了几十年的干部，站在张庄那块土地上从来没感到讲话还是个事情，无论开什么会，无论多少人坐在下边，他说讲就讲，胸有成竹。今天不一样，是在美国，讲好讲坏不是个人一个人的事，是中国农民形象问题，他略微思索了一下，清了清嗓子：

“我叫王金红，从中国山西的张庄来的，特地来看《翻身》”，他的声音沉稳、气很足。

“刚才剧情里所展现的生活就是我们张庄四十年前翻身闹土改的情景。它记录了我们张庄的一段真实历史，也是整个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缩影。韩丁先生为了完成这部作品，长时间深入到我们张庄，和乡亲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成为我们张庄农民的知心朋友。在那艰苦的年代，韩丁先生经过了母亲孕育孩子般的痛苦才完成了这部作品。”

“什么什么？”韩丁在一旁轻声问：“母亲孕育……痛苦？”

“我是说你写《翻身》的艰苦，就像母亲怀小孩一样痛苦。”

韩丁连连点头：“OK，往下说、往下说。”

金红似乎越说越流畅了。“今天在波士顿大学能看到反映我的家乡的话剧，重现中国革命历史的生动一幕，使我终身难忘。

从《翻身》到现在已经过去40多年了。40多年来，张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翻身》中所展现的那些落后的生产方式、贫穷与愚昧已经彻底被埋葬了，现在的张庄已经展现出一派崭新的景象。欢迎各位到我们张庄去领略一下当代中国新农村的风光。”

韩丁翻译之后，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开上了快车道。1976年，我们村人均收入127元，去年达到580元，盖起许多新房，添置了新家俱，中国有句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信你们可以向问老韩！”

金红停顿下来，望着韩丁。

“你不是带着张庄的照片吗，叫大家都亲眼见识一下。”

韩丁提醒了金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照片：村史馆里的照片，临去美国前专门洗了一套。他走下台去，把照片发给大家。

“这就是张庄，女士们、先生们请传看。”

人们争相看着，啧啧称赞：“真了不起！”“中国发生了奇迹！”

一阵哄动之后，全场静了下来。韩丁告诉他有人开始提问题。

金红说：“可以，随便问。”他很坦然。仿佛“答记者问”



似的。

“在中国男女平等吗？”

“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怎样？”

“你认为吃集体大锅饭好，还是责任制好？”

“张庄的农民是怎样安排自己的闲遐时间的？”

.....

对每一个问题，金红都一一作了回答。尽管对这些问题，事先他没有专门准备，但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作为一名党的基层干部，凭着一种责任感和基本的觉悟，他回答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富有说服力。

站在一旁的韩丁不住地把大拇指高高竖起，连声说：“OK,OK。”

如果不是主持人出面制止，讲话还要继续下去，甚至到深夜。

金红走下舞台，转身走进后台，向正在卸妆的演员一一告别。韩丁向他介绍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说：“她是台湾来的留学生。”金红认出来了，在刚才的演出中，她扮演女工作队员。她说：“我的祖父在大陆时曾是地主。我演工作队员，不知演得像不像？”

“很好，你演得很像。”金红认真地回答着，他又记住了，也正是这位姑娘提出了为什么国民党领导不了中国的问题。

临别时，主持人把50美元交给金红。韩丁告诉他，这是他讲演应得的报酬。

“讲这么几句话还要报酬？”金红不理解。

“你付出了劳动，付出了时间，理所当然要有报酬。”

归途的汽车里。金红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因为他竟然在美国一个大学的讲台上做了宣传工作，而且这宣传竟然被理解，被欢迎。看来，是金子总要闪光，是真理总要被认识和接受，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世界才有希望。

这是一个非常新鲜幽丽的早晨，阳光晒得大地镀上金色，空气清冷而甜蜜。韩丁与金红乘坐的汽车在广袤的大平原上奔驰，透过车窗，见到处处一派勃勃生机。

金红久久地注视着窗外，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这里的农村显然不像山西的家乡那样，三里一村，五里一庄，而是四五十里才见一片住宅，多是独居户。

韩丁带金红来到哈里斯堡一家农场。主人柯拉克 60 多岁，高大结实，开朗爽快，热情好客。他陪着金红参观了自己的农场之后，拿出自己家做的糕点招待客人。

随后，韩丁又带金红参观了农民杰西经营的牧场，这是全州 25 家牧场之一。

韩丁对金红说，从这两户农民可以看出美国农业目前的发展走向，那就是在不断兼并、扩大的形势下，追求规模效应。柯拉克经营耕地 2000 英亩，折合中国 12000 多亩，杰西 1961 年才经营 21 英亩，现在经营的耕地比柯拉克还多 500 英亩。美国农民从前几年占总人口的 5% 降到 2%，说明这种兼并的趋势还在扩大，就是以规模求效益、求生存、求发展。其次是高度机械化，雇工越来越少，两个农场经营规模接近，农机具也差不多一样多，都有六七部

汽车，六七台康拜因，三四个储粮筒仓、几百平方米的农机具仓库和修理车间，由于机械多，节省了大量人力，他们只在春种秋收的农忙季节才雇几名短工。

再就是应用现代信息传递手段，实现了农业信息化。柯拉克家里有一台电脑，每月出资三十美元参加联网，随时可以了解全美各地以及欧洲等国农副产品市场行情，长、中、短气象预报，广告等商品信息。杰西家中由于有一套现代化通信系统，俨然成了一个管理指挥中心，他的太太可以随时统计农场三四十公里范围内操作机械的雇工完成定额情况，随时核算并发出指令。

看了这一切，金红感慨无比。他猛然联想到了自己的张庄，这些年，光景好了，农民手里有了钱，却又不知往哪花，尤其是不懂得扩大再生产，从而开始了一种“竞争”：一阵风似地买摩托车、盖新房子，摩托车要日本的，房子越盖越豪华，后边的总要超过前边的，楼房空着用来养鸡，红白喜事办起来互相攀比，一摆几十桌酒席，一桌几十个菜，全村一年红白喜事七八十起，每起平均三千元开销，一年下来，支出二十多万元，相当于花掉几辆“解放牌”汽车。

上次，韩丁到张庄考察，看到这番景象，焦虑地对金红说，这样不行，应当改一改这种旧风俗，引导大家把这些钱花在发展生产上。他在北京见到中国对外友协的章文晋同志又说起此事；过分强调高标准居住和饮食条件，我觉得不好，应该把钱花在发展生产上，不然，生产就会失去后劲。

乘火车去纽约。

韩丁特意安排让金红领略美国的铁路运输情况。

看惯了挤车的现象，金红对美国人上下车从从容容很不理解，即使偶尔出现乘车人多，人们也是不慌不忙，井然有序，而在国内时，即使人少，人们也是争先恐后。

韩丁告诉金红，现在全美已完全实现了机车电力化，平均时速在一百公里以上。

金红看到车厢里的座位都是一个向前的方向，可躺可坐，宽敞舒适。列车运行十分平稳，噪音很小。韩丁告诉金红，这是因为铁轨长、接缝少，车厢里装有隔音装置。

然而，令金红不解的是，乘客一直很少。谈起这一现象，韩丁说，这是因为美国综合运力很高，人们的旅行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有多种选择。

纽约是美国豪华、气派的代表作。

清晨的薄雾里流淌着又一天的忙碌。韩丁带金红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建筑群前。

“这就是联合国大厦。”韩丁告诉金红。

举目望去，见楼前的广场上飘扬着许多五颜六色的旗帜，金红一眼就从中找到了那面五星红旗，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顿时涌上心头。

“这是我们的国旗！”金红无限感慨地自言自语。是啊，一个中国人，在异地他乡还有什么能比看到自己的国旗更令人振奋呢？

在那高大的会议厅里，韩丁带金红找到了中国代表的席位。韩丁说，中国代表就是在这个席位上一次又一次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进步而呼唤，斗争，很多人称这个席位为正义之席。

走进休息厅，韩丁和金红被那幅巨大的锦绣《万里长城》挂毯吸引住了，他们久久地凝望着。那恢宏的气势，凝重的色调，精美的工艺使人们赞不绝口。

转眼之间，金红来美国两个多月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就要到了。金红的睡眠越来越少，常常半夜起来写信，第二天早上交给韩丁代发。

韩丁掂着信封，微笑着：“中国有句古话，每逢佳节倍思亲，是想老婆孩子了吧？”

春节那天，韩丁为了让金红不致于寂寞，特意吩咐女婿高富贵带金红去唐人街“翠香苑”吃中国菜，喝茅台酒……

韩丁带着他的中国朋友，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大半个美国。他对金红此行寄予深深的期望，相信他带回去的不仅仅有图纸、工具、经验，更重要的是新的观念，新的思路。

2月17日，美国费拉德尔菲亚《询问者报》发表了题为《在美国农场——中国农民访问费城》的报道。

记者萨拉·索罗菲奇报道：

中国山西省张庄村主任王金红抓起一把正以每分钟十磅速度从机槽里吐出的苜蓿，弯下身子，用鼻子对着香甜的绿叶，深深地吸了几口。

在随后的两个小时里，王在韩丁的陪同下巡视了齐默海威机械化奶牛场，这是一个拥有一万头霍尔斯坦奶牛的奶牛场，位于兰开斯特，被视为美国效率的榜样。

齐默海威奶牛场有五个贮青窖，厩棚里有成套的通讯设备，一部直流填料车以及滚筒式粉碎机。

王不远万里来此，看到了这一切，感到很惊奇，王的村子里有一个小奶牛场，养 12 头奶牛。他仔细地观察，一一记在本子上。

在参观哈里斯堡的一家农场时，美国 4—H 俱乐部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该俱乐部年轻成员进行竞争出售自己饲养的牲畜。

王的朋友韩丁说：“中国非常需要这种观念。”

韩丁还说：“我在中国提倡这种观念多年了，但是，接受的人很少，王不同，他很勇敢，他回去后，会在乡村里推行这种观念。”

2 月 19 日，《读鹰报》发表一篇专访。题目是《中国农民，富有生机的使命》。

文章说：在华盛顿，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所服务协会的中国农业专家费郎西斯·图安和美国农业中国服务部部长丹东尼尔·波门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会见了韩丁和他的中国朋友王金红。

传统这样认为：穿长衫的老太太一定是中国人，他们有那么多的孩子，每次来到碗橱前，打开一看，里面总是空的。于是愁眉不展地坐在那里。这样的老太太是神话中

的故事，但历史记载中国的饥荒却是真有其事的。

美国农业部发言人说，中国的饥荒已经变为过去，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因为中国农业要养活十亿多人口。

费郎西斯·图安说，在今后的七八年里，中国农业会有革命性变化。

丹东尼尔·波门说，今天，农业在中国是件大事情，十亿多中国人自给自足是个奇迹。

农业专家们认为，不论受到怎样的阻碍，在这片土地上，饥荒的老龙难以再抬起头来。

中国人是怎样把它赶走的呢？

那就是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图安认为，在新的制度下，农民有了自主权和约束力。就是合同制代替了集体农耕制。波门认为是收获刺激鼓励了生产者，他们可以自行决定种什么，怎样种，耕作真正成了自己的事。

中国农业社会科学协会会长卢良书在1985年向美国费城农业促进会的致词中曾写道：我们要继续发展和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走集中生产，规模效益的发展道路。

美国的一些农业专家和观察家认为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国农业改革面临下一次飞跃。

波门谈到中国人目前的消费，认为还是以粮食为主，肉类很少，中国应努力使传统的食物结构发生变革，将来的趋势是增加动物蛋白。减少植物蛋白，

波门说，美国将受益于中国食物结构的变革，我们不

能把肉卖给中国，因为我们的价格太高了，但是，我们可以把玉米和大豆卖给中国人养猪。

记者请波门比较一下过去十年中国农业和美国农业的发展情况。他认为不好比较，我们地多人少，他们地少人多，中国75%的人专心于农业耕作，而美国只有3%，衡量中国农业的尺度只有产量。现在的情况对中国农业发展很有利，但也会出一些新问题，那就是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

谈到养猪，图安说，中国农民养猪有很长历史，但是缺乏科学方法，猪的成熟太慢，市场上的猪一般都是160磅到180磅，但要喂一年才能长成。在美国养猪大约五六个月就可以达到210磅到230磅。其中主要原因是科学养猪。

文章最后说：当穿长衫的母亲又走到碗橱前的时候，里面已经放满了面包和肉。

金红就要回国了。

哥伦比亚机场上，韩丁紧紧拥抱着金红，两个人眼眶里都涌起了泪花，韩丁摇动着金红的肩头说：“多保重，一路顺风！”

金红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老韩，别送了，明年来张庄再见。”

飞机腾起一阵云雾，直上蓝天。

韩丁久久地凝望着长空，他记起了中国一句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当天的《读鹰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农业的希望》。

# 踏着韩丁的路……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对我们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我就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果戈里

1993年仲夏,74岁的韩丁又一次来到中国,来到张庄。

这次他亲自驾车从北京到张庄,长途跋涉一千多公里,依然毫无倦意。他兴冲冲地走下车,迈开大步走进村委大院。

正是6月流火季节,金红特意为韩丁准备了绿豆水、小米汤。

跟随韩丁一起来的还有韩丁的妹妹寒春、妹夫阳早两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以及陪同人员。

对于韩丁和金红以及张庄的农民来说,每一次相逢都是一个愉快的节日,叙不完的关切之情,谈不尽的所见所闻,友情的激流把人们带进一个幸福的世界。

短暂的午休之后,韩丁要求金红陪他去看他们的长弓玛钢工业公司。这是韩丁与张庄联合兴办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催化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七十年代初,张庄只有两个小厂,1988年一下子发展到12家,全村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10万元。韩丁从张庄的变迁中看到了中国农村的一束瑰丽的曙光,他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一条与美国有着重大区别的途径,其中一点是乡村工业应运而生。

早在三年前,韩丁就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张庄的村办企业,为张庄水泥厂、农机厂、建材厂等企业提供技术咨询,解决技术难题,传播产品信息……

1990年春，韩丁带给金红一条信息：玛钢件在国际市场有广阔前景。金红又对国内市场作了调查，确认玛钢件生产的可行性。可是没有资金，怎么办？韩丁闻风赶到张庄，通过周密测算，进一步完善了投产玛钢件的设计方案，最后决定为张庄投资十万美元，联合开办长弓玛钢工业公司。

在生产办公室里，韩丁详细询问了生产情况，对提高产品质量谈了很多自己的意见。

“我们长弓玛钢工业公司要有大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国内市场，要把着眼点放到国际市场上，去挣美元。”

“农民办企业，这是一场变革，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学起，这是中国农民自身的又一次解放。”

韩丁迈开大步向生产车间走去。他那高大的身躯依然是那样挺拔，步伐矫健有力，谈笑风生，很难让人想象到他的实际年龄。

在铸造车间，韩丁向技术人员要来配料卡片，一项一项地检查，随后，又到电炉前对操作人员进行现场指导，继而检查了化验、加工、包装等一系列生产工艺。

工人们不解地问韩丁：“老韩，这些具体问题由厂长们处理好了，你何必考虑这么多呢？”

韩丁摆摆手：“不对，这个企业有我的投资，有我的名义，又是张庄农民的一个希望，我们只能办好，不能出任何差错。”

从玛钢工业公司出来，金红提议请韩丁去参观张庄刚刚投资兴建的铁路专用线。韩丁高兴地说：“好啊！真想

不到，一年下来，张庄也有了自己的铁路线，真可谓鸟枪换炮了！”

韩丁在人们的簇拥下，说说笑笑地沿着田间大道向铁路线走去。

我向韩丁谈起计划写篇关于他在中国的文章。韩丁摆摆手说：“我很平常，没什么可写的。”

“你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交往，用汗水和心血谱写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应该把它们写出来，回顾过去，意在鼓舞后人。”我坚持个人的意见。

韩丁深思了稍许后说：“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很多，他们起初对中国抱有一种好奇，继而是研究，随后就是热爱，而且一爱上就难舍难分。”

韩丁说到这里，指了指身边的两位老人说：“他们就是其中的一对。”

韩丁的话音未落，随同他们一起来的几位在北京工作的同志异口同声地说：“是的，他们确实了不起。”

我不由得把钦佩的目光转向两位老人——寒春和阳早。

寒春背已稍弯，但精神矍铄，一双湛蓝的眼睛依然明洵似水；阳早双鬓雪染，走起路来却很精神利索。

关于他们的故事，前些年我就在《人民日报》社记者金凤的文章《在中国农村三十年》和《情深意切》中看到过。

三十年代末，韩丁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和他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一位年轻人就是阳早，两人趣味相投，志同

道合，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文学和历史问题，分析国际形势，畅谈理想、追求和人生。他们不满意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立志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进步事业。

就在这个时期，刚出版的美国记者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强烈地吸引了他们，他们面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他们约定到中国去，到延安去。

1946年，韩丁第二次从中国归来，把在重庆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印象讲给阳早听。阳早再也坐不住了，他卖掉了在家乡刚刚筹办起的奶牛场，准备到中国解放区去。

恰在这时，联合国救济总署要把一批奶牛运往中国，需派养牛专家前往，阳早闻讯报名参加。

1946年春天，27岁的阳早到上海。十月到延安。

这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最艰难的岁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美帝国主义主子的援助下，不顾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强烈要求，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自然成了他们进攻的重点。国民党反动政府指挥其嫡系、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投入34个旅，共23万兵力，分五路向陕甘宁边区压来。同时在西安集结了一支伞兵部队，企图袭击延安。

阳早到达延安那天，一万多名军民正聚集在宝塔山下的商会大会堂举行保卫边区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大会上讲话。会场上，红旗翻卷，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口号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

“团结起来，保卫延安！”

“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也就在这个时候，根据《双十协定》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正在匆匆忙忙地撤离延安，跑往国统区。

周恩来紧紧握住阳早的手说：“欢迎你，在这样严峻的时刻你来到延安，太可贵了！”

根据党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部署，1947年3月，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会见在延安的几位外国朋友：斯特朗、马德海、阳早、李敦白等。

回忆起这次会见，阳早说，最深的印象是毛泽东那种临危不惧，稳操胜券的大家气势。外边不时地响起防空警报；敌机的马达声震耳欲聋，时而有落地的枪弹爆炸声，震得窑洞嗡嗡作响。毛泽东却从容不迫，谈笑风生，并提议和大家共进午餐。吃饭当中，周恩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分析了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指出国民党政府已到了穷途末路，妄图以摧垮延安来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党中央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将来解放延安、南京、北平、上海，进而解放全中国。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尽管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但是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患难见人心”，在这样艰难的时刻，你们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阳早回忆说，我们几个美国人，包括年近六旬的斯特朗在内都要求留下来参加解放斗争。周恩来耐心地向我

们解释，用了很多话，说了很长时间，才说服斯特朗含泪离开延安，我们被批准留了下来，随中央机关一起转移。

斗争非常激烈，党中央以2万兵力抗击国民党20万大军。在枪林弹雨中，阳早和他的工作单位光华农场的几十名职工，在崎岖的山道上行军，还带着几十头荷兰奶牛，那是红军东征时从阎锡山那里缴获的。农场的同志告诉阳早，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就是这些奶牛喂养了延安的许多干部和战士的子女。

在行军途中，有一天，周恩来遇到阳早说，等战争结束了，你帮助我们大力发展奶牛，使中国的儿童都能喝上鲜牛奶。

阳早听了，心里久久难以平静。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也正是这种远大而光荣的目标，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从而造就了不可战胜的信念，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寒春作为韩丁的妹妹，从州立女子中学毕业以后，进入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学习，取得硕士学位以后，参加了原子弹研究制造工作。

1945年8月，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打破了寒春献身科学研究的梦幻，她和许多有正义感的科学家奋起反对美国政府的原子讹诈政策。

在大学期间，寒春就结识了哥哥的朋友阳早。她喜欢这位热情、向上、思想丰富的青年。但是，并没有决定要把整个人生和他结合在一起。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学高能物理的，研究加速器，而阳早学习农业，研究奶牛，加速



器和奶牛怎样结合？”

然而，共同的追求往往会使爱情在一瞬间闪出灿烂的火花。

那是1946年春的一天，寒春和哥哥韩丁一起送阳早赴中国。望着远去的海轮，寒春的心头突然卷起一阵激情的风云，她为这位青年朋友的大胆选择而骄傲、钦佩、自豪。但是，她舍不得她的加速器，因为她已经进入芝加哥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她和杨振宁同在一个研究小组，导师是意大利物理学家费明教授。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了解到这个研究所的奖学金来自美国海军部队，她渐渐不安起来，她明白，不论研究所怎样标榜，这里的一切研究，归根到底是为美国政府的扩张野心服务的。作为科学家，热爱科学是她的天职，但她更是一个正直的人，更热爱真理。

深沉的思考之后，她决定走哥哥韩丁和阳早的道路。

就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阳早来自延安的信。那是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从信里，她了解到在遥远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决定人类四分之一人们命运的伟大斗争，与这样神圣的事业相比，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和所追求的学位又算什么呢？

寒春决心去中国。

1949年3月的一天，一辆美式卡车从北京开出，奔驰在通往陕北的大道上。一路风尘到延安，到达时已是四月天气。

在这个难忘的春天里，30岁的阳早和27岁的寒春在

革命圣地延安结成了伴侣。

他们的足迹踏遍陕甘宁。

他们曾在瓦窑堡农具厂，卷起袖子和工人一起抡锤打铁，用被解放军缴获的美制炮弹壳为陕北农民打制铁镐，犁头，镢头。

阳早在这里设计制造出了毛驴拉的水车和四轮马车。研究原子物理的寒春为农民设计制造了翻斗车和风车。

这一切，对于那些不理解他们的人来说，确实难以思议。

在偏僻的靠近内蒙的陕西定边县域川寨的三边农场，阳早和寒春培育奶牛和细毛羊新品种。塞外的风沙多而猛烈，风沙起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他们经常冒着风沙奔波，他们和当地的牧民一样，用牛粪取暖，用粗羊毛线自己编织大衣和袜子。

阳早似乎已经忘记了美国雪茄的味道，已经习惯了陕北老乡那冒着浓烈气息的旱烟；寒春和许多蒙族姑娘成了知心朋友，她从这些姑娘们那里学会了制作黄油和奶制品，学会了许多当地流行的民歌。她永远难忘，在那些日子里，她和姑娘们一起骑马奔驰在大草原上，随着悠闲的马蹄声放声高歌的情景……

阳早和光华农场的职工在炮火中千辛万苦保留下的荷兰奶牛，随着他们来到了三边农场，在他们和职工的努力下，奶牛从不到一百头发展到一千多头，向全国输送了许多优良牛种。多少新中国的儿童一落地就喝到了这些

奶牛的鲜牛奶，可是谁能想到其中有这样两位美国朋友为此付出的心血呢？

在这里，他们改良了许多农具，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农民和职工们都热情地称他们为“老阳”、“老寒”。有人开玩笑地说：“是水土关系吧，你们的鼻子好像也不那么高了。”

自从解放战争结束，有多少革命战士走进了大城市。上级也曾多次动员阳早和寒春进北京工作，然而一次次都被他们谢绝了。从1946年到1966年，整整20年，他们在中国最落后的西北高原，默默无闻地工作，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青春献给了这方土地和人民，为改善中国农牧业生产环境，发展中国农牧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那段被扭曲的岁月，也是阳早和寒春最不愉快的日子。他们被有关方面调往北京，做一些文字工作，虽然生活条件优越了，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因为他们与自己从事的事业分离了，与那情同手足的群众隔离了。用寒春的话说，仿佛鱼儿离开了水，花儿离开了秧。后来实在忍受不住，他们想方设法到附近的农村去参加劳动。

一个偶然的时机，他们遇到了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向黄华同志谈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从事实际工作的要求。不久，上级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1972年2月，阳早和寒春到了北京红星公社奶牛场。

这里的人们不理解这两位“老外”为什么放着北京的优越生活条件不要，而要到这里受苦：做饭要生炉子，出

门骑自行车，常常双脚沾满牛粪，双手沾满泥巴，而他们又总是乐呵呵的。

白发已经爬上了他们的双鬓，岁月增添了额头的皱纹，但是，青春的火焰依然在他们的目光里闪烁，他们依然对所从事的工作保持着旺盛的热情，饱满的精力，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们骑自行车上下班，穿着工人一样的服装忙碌在牛棚里，车间里。职工们说：“俺们中国工人身上有多少土，他们身上也有多少土。”在滴水成冰的隆冬，北风呼号，寒气袭人，寒春抢修机器，衣服穿多了不能干活，穿少了冻得受不了，带手套不好操作，不带手套，手指又冻得发麻。就这样，寒春这个富有特殊个性的女性经受住了所有艰难的考验。

听了这些平凡而动人的故事，我情不自禁地问：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呢？

寒春若有所思，那湛蓝的眼睛闪烁着坚毅的光芒：“这个问题，很多人曾向我提起过，不少美国朋友来到北京，总要专程来看望我们，他们也曾直率地提出：‘是什么力量吸引了你们，在中国工作 40 多年？’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坦率地回答，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吸引了我们。”

老人略微停顿了一下，深沉地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来中国，一到解放区，首先接触的就是延安精神，应该说是延安精神把我们培育成人。延安精神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无国界的，我们爱中国人民，也爱美国人民，爱所有的人

民群众，我们的一切都应属于人民。”

寒春和阳早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精神，始终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

阳早和寒春像韩丁一样，始终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是农民问题，因此他们长期坚持深入基层，为改变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兢兢业业地工作。在红星公社，阳早利用一台报废的拖拉机发动机和一些旧零件，改装了一台真空泵，从而组装成了机械化挤奶器；寒春试制成功青饲料联合收割机，当时，这样的收割机在中国尚无先例，她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广告图片，和一些有经验的设计人员和操作人员一起研究，为此，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病中也不休息，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收割机的试制任务。

1979年，阳早和寒春组织了北京和西安奶牛场的十多名科技人员和工人，横贯美国东西部，考察美国几十个奶牛场和几家著名的奶牛机械设备厂，带回了许多机械设备和资料。

他们帮助北京红星公社奶牛场改造了旧式牛棚，在棚内安装了管式输奶器，提高了工效，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牛奶清洁度。

1980年，寒春到上海，在她的指导下，上海机械局组织了十一个单位协作攻关，在青浦县农具厂试制成功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冷冻奶罐。她还帮助西安草滩奶牛场安装了鱼骨式挤奶台，二十头奶牛可以同时挤奶，大幅度提高工效。

1982年底，阳早和寒春来到了昌平区小王庄中国农机研究院试验站，负责机械化奶牛场设计工作。他们领导着北京、上海、天津和中国农机研究院的几十名科技人员组成的奶牛机械化成套设备课题组，对奶牛喂养、挤奶、清粪等一系列生产环节的机械化进行全面更新。

这几乎是我国奶牛业一次重大变革的起点。按照他们新型构思建成的奶牛场，布局紧凑，排水通畅，机械化水平高，喂料和清粪都有机械装置，奶牛可以在场内安闲地散步，挤奶时，60多头奶牛排成一行，开动挤奶器，鲜奶立即注入玻璃管道，然后经过奶泵打入冷冻罐，装车后直接送往昌平牛奶公司。

阳早说，当时这是个挤奶中心可供一千头奶牛挤奶，生产效率提高近10倍。

八十年代初，北美、西欧牛奶和奶制品过剩，1983年，美国大约宰杀了150多万头奶牛，牛奶不景气，一些生产奶牛机械设备的企业竭力挤进中国市场。当时，一些国内奶牛场纷纷引进美国、瑞典、荷兰的设备。阳早和寒春发现了这一不正常的势头，他们上书中国有关部门，大声疾呼：中国这样的大国，四个现代化是买不来的，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去创造！

阳早和寒春带领中国科技人员埋头苦干了三年，一套中国式的全新的奶牛机械化成套设备终于问世了。

多少人为这两位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的火热的心所感动，他们奉献给中国人民的不仅是科技、智慧，而且还有高尚的精神，无价的友谊。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涌现出了一股“奶牛热”。阳早、寒春大胆创新，大胆试验，把美国高产奶牛胚胎移植到中国黄牛腹中，改良中国奶牛品质。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陕西省的重视，两名科技人员专程来到北京请阳早、寒春。

韩丁闻讯后，又从美国请了一位专家，四人一起到了西安。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实验，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当时的省委书记白纪年高兴地说：“你们为陕西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希望能大面积推广，搞出更多的新品种。”

在阳早、寒春、韩丁的倡导下，成立了陕西胚胎移植开发公司。那一年国庆节，他们一起应邀出席陕西省政府举行的国庆宴会，一位主管财政的副省长专门走到阳早、寒春、韩丁面前，高举起酒杯说：“谢谢你们的卓越贡献，谢谢你们的拼搏精神！”

三位老人回顾起这段往事，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奶牛胚胎移植技术并不深奥和复杂，复杂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一些技术人员互相挖墙角，拆台，垄断技术资料，争夺个人名字的排列位置，不愿做艰苦具体的工作；一些领导人员争权不干事，互相扯皮，不负责任，遇事总是“研究研究”，真是急死人。

他们深有所感地说：在中国多少年来，许多精力不是用在了科研上，而是用在了和人打交道上，这样的作风不改变，实在是误国误民。

随同韩丁一起来的阳早、寒春现在所在的工作单位的同事告诉我，按照国务院规定，阳早、寒春应当享受外国专家待遇，理应领一份补贴工资，但他们坚持拿中国普

通干部的工资，无论谁动员，他们总是说：“我们不能特殊。”于是，那份工资只好一直在单位寄存着。每到国庆节、春节，国务院举行招待会，领导同志亲自登门请他们，往往被他们谢绝。他们生活俭朴，经常是中国式的家常便饭，他们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女儿阳及平高中毕业后主动要求到安徽农村劳动锻炼了四年，然后考入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

听着这些故事，我不由地陷入一种深沉的思考。韩丁、阳早、寒春的人生轨迹为我们画了一个硕大的问号：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这是个长久以来为许多哲人所注目，所争论不休的课题。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就探索这个问题。美国作家毛姆以 19 世纪著名印象派画家高庚为原型写过一篇很出名的传记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书中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位普通的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结婚 16 年，有一个温顺而有教养的妻子和两个懂事可爱的孩子，和谐温暖，安定平淡，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本来，思特里克兰德先生可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消磨掉自己的后半生，但他却不知受了什么感召突然离家出走，去画画，去追求艺术，到处流浪，受尽穷苦。为了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他跑到非洲野蛮、荒凉的地区，最后客死异乡。在思特里克兰德先生一人身上，竟发生了判若两人的选择，这就是由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决定的。“月亮”和“六便士”在他心中是两个不同的人生追求，当“便士”在他心中贬值，“月亮”在他心中升华时，精神价值



取代了物质价值，理想价值战胜了现实价值，思特里克兰德便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当前，中国青年的热门话题之一是人生价值。应当肯定的是时代的进步为人们自身价值的追求和实现创造了更为宽广的空间，但是确立怎样的价值观，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这样的阐述：“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然而，我们的青年人当中确有一部分人视人生价值为个人的满足，于是便有人信奉“钱能通神”，有人高唱“潇洒走一回”，有人扬言“过把瘾就死”……

就这个问题，我曾请韩丁谈谈看法。

他说，价值观问题，在中国和西方有着各自的源和流，也都有各自的长与短，推开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不算，西方社会自五百年前文艺复兴时代就推出了个人独立观念，强调个人至上和自力更生，强调人的自强，自立，自助，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这种观念推向自私的极端，推向堕落。

韩丁说，现在一些中国青年不了解美国社会的本质，好像那里是人间天堂，黄金铺地。其实，美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较高，但其固有的社会矛盾无法克服，贫富悬殊，金钱万能，无钱寸步难行，美国老人和妇女的日子最艰难，我的母亲五十年代末退休时，每年五千美元退休金，当时还可以，但是，不断发生的通货膨胀，到了七八十年代，这些钱已难以维持生活。只好靠我和寒春以及几个孩子们共同凑钱维持。

我们谈话中间，金红从外边走了进来：“老韩，到外边看看吧，今天是张庄每年一度的古庙会。”

韩丁一听，大手一挥：“好！难得的好机会。”

外面满街满巷都是人，有卖小吃的，卖猪的，卖小百货的，要把戏变魔术的……韩丁随着人流向前涌动，人群中不时投来一束束热情亲切的目光，传来阵阵高声问候。

“老韩来了？”

“老韩赶会来了？”

几位老人远远地挤过来，拉住韩丁的手，亲切地端详着韩丁：“胖了，头发也全白了。”

韩丁微笑着：“老了，七十多了，中国有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

韩丁来到一个卖小吃的摊点前，向阳早、寒春介绍说：“这叫潞城甩饼，里边卷牛肉，很有风味！”说着买了几张叫他们品尝。

在一个卖草编工艺品的小摊前，韩丁挑选了几件坐垫，那是临来时，孩子们委托他买的。

穿过人流，韩丁向村东走去，他似乎在寻找什么，是的，这里曾留下他很多梦，很多记忆，可是，一切都难以寻觅了，张庄已旧貌变新颜。

韩丁信步来到村中公园，青砖花墙里，亭台楼阁，红墙绿瓦，满园百花争艳……

金红告诉韩丁，这几年，张庄把很大一笔资金用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因为大家认识到，要想真正改变农村面貌，根本的一点是提高文化科技水平，无论如何要把我们

的后代培养成有文化的一代新人。

来到张庄幼儿园，韩丁看到这里窗明几净，各种教学用具应有尽有，一位年轻的阿姨正在弹琴带着孩子们练唱，那悠扬的奏鸣曲和孩子们稚气的童声令人陶醉。

韩丁望着这些新一代的张庄人，感慨万千，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了，这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一簇簇花朵般的笑容同他描写的四十年代的张庄人那黑瘦干黄的面孔，分明是两个全然不同时代的写照。

张庄的变迁就是中国的变迁。

夜幕降临了，金红约韩丁一行来到村委小礼堂，在欢快的气氛中，小型电影放映机发出均匀的响声，画面一出现，韩丁就笑了：“啊，是我女儿拍的电影。”

是的，这是韩丁的女儿韩琼 1975 年来张庄拍摄的彩色纪录片《高跷》。画面上，一队队踩高跷的演员边走边舞，边舞边唱，伴着那富有中国北方气息的粗犷豪放的旋律，越舞越激昂，越舞越欢畅……

韩丁的脸上不时泛起幸福的笑意。

# 后 记

## 人生的支点

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真情、思想和行为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

——爱因斯坦

要写韩丁的计划是在五年前萌生的。但是，采访太艰难了，这不单是语言上的障碍，主要是时间。韩丁每次到中国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即使来了，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考察、座谈、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他惜时如金，工作起来拼命，不愿让别人干扰他的工作，所以关于他的采访，或是在乘车赶路中的“道听途说”，或是在饭桌上的席间插话，很难得到专门的答记者问。多亏了有一些见诸于国内外的文字资料。正因如此，几年来，我就像在茫茫海滩上寻觅五光十色的彩贝一样，不断地追寻着。

那是1993年仲夏的一个下午，在金红的带领下，我们随同韩丁走在张庄的大田里。夕阳西下，仿佛排起了一面瑰丽艳美的天幕，从辽阔的苍穹一直垂到地面，在大地上撒出一层花粉似的光辉，远远望去，韩丁那高大魁伟的身影像是天幕上的一尊雕塑，那肩膀宽厚逼真，那卷曲的短发像是一缕缕燃烧的火焰……

“请问，老韩，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你对中国如此地执着？”

这是许多人曾经问起的一个问题。按照传统的推理方式，伟大的作为必有非凡的心理支柱，想必定会有一通洋洋洒洒的宏论。然而韩丁的回答却是那样简单：“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社会主义。”

我期待下文，却再也没有了。

为此，我思考了很久。我记起了本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周刊》的一位著名评论员写下的一段话：无论

你是国会议员、金融家或将军，甚至是美国总统，只要你到中国西部去一趟，到红色政权的区域里观察一番。那么，你就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拥戴者，甚至信徒。

这位评论员并不是夸大其词，三十年代后期，一批西欧及北美青年知识分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其中有我们熟知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德国医生马海德……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甚至不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诗章。韩丁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认识中国，认识中国革命的。

当回顾人生之路时，埃德加·斯诺说：“我几乎一生都与中国相联着，我之所以为此奋斗不息，是因为这里有人类的希望。”

斯特朗在回忆延安的文章中写道：“那里没有奢侈豪华的东西，也很少安逸舒适的生活……有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思维敏捷，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把根子深深地植于民众之中。我感到我的胸襟在不断开阔……我仿佛终于找到了人类在艰难困苦中前进的航向。”

韩丁常说：“中国不搞社会主义，我就不来了。”

从这里，我悟出了答案。是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宏伟事业所具有的巨大的感召力，吸引着他们，是他们对人类正义事业的追求，这也正是他们人生价值观的体现。

韩丁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人为什么活着？”这个历

来为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如果说韩丁是一面镜子，那么我们就清晰地看到了我们生活中那令人忧虑的阴影。众所周知，一个社会需要有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相应机制，但是更需要有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恩格斯把这种动力称作为“理想的力量”。

从韩丁的足迹中闪烁出的是一种奉献精神，在这一精神面前，一切轻狂者都将重新感知人生价值的意义；一切贪婪者的黄金梦都会变得苍白无力；一切柔弱者都将挺起直面人生的脊梁；一切迷惘者都将发现前方新的曙光……

我赞赏韩丁的精神，其伟大之处在于对人类进步事业的不倦追求，并把这追求化作脚踏实地的行动，时时处处体现了舍己奉献的品格，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中国的富强，即使个人失去的再多也有价值。”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节！试想，没有这种精神，他又怎能在近半个世纪里为中国的事业，为中美人民友谊在漫漫长途跋涉？

在我采写关于韩丁的这部人物传记时，我时常记起著名诗人流沙河的诗句：人生的追求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之火，它点燃前进路上的灯，把你永远引向光明……

需要说明的是，著名作家焦祖尧、李锐、成一、青年作家李丁分别采写过韩丁的事迹，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在此表示感谢。

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王金红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给了热情支持,在此表示感谢。感谢我的朋友程家良、刘国钦、侯永贵、郭瑞平的支持,感谢所有审阅此书而给以关心的专家和领导。

1995年元月20日于北京